



欧元必死

揭开欧债危机的真相

余治国 叶楚华 著

EURO IS GOING TO THE DEATH

Reveal the Secret of European Debt Crisis

总顾问：刘纪鹏 马光远

总主编：毛增余

叶檀、仲大军、陈思进 推荐阅读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欧元必死

揭开欧债危机的真相

EURO IS GOING TO THE DEATH

Reveal the Secret of European Debt Crisis

★ 欧元和欧元区的创建更多是一种政治考虑，而不符合经济规律。

★ 欧元区单一货币制造并加剧了欧元区内部的严重失衡。

★ 欧元区决策效率低下，本国利益导向表明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欧洲市场。寄望由统一的超主权信用货币，来推动欧盟一体化甚至国家化进程，是逻辑颠倒。

★ “三位一体”的美国对欧金融战推动了欧债危机的爆发。

上架建议：经 济



定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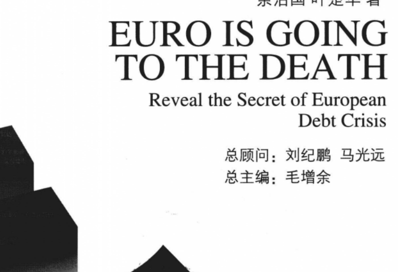
欧元必死

揭开欧债危机的真相

余治国 叶楚华 著

EURO IS GOING TO THE DEATH

Reveal the Secret of European Debt Crisis



总顾问：刘纪鹏 马光远
总主编：毛增余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元必死:揭开欧债危机的真相/余治国,叶楚华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136-1531-0
Ⅰ.①欧… Ⅱ.①余… ②叶… Ⅲ.①欧元—研究 Ⅳ.①F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082392号

责任编辑 彭彩霞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久品轩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63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136-1531-0/F·9301
定 价 36.00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19116)



多元 · 理性 · 建设性

《百万庄财经评论》丛书编委会

总 序 Preface

写在《百万庄财经评论》丛书出版之前

（一）

大约是在6年前，我曾与某门户网站财经频道的财经评论栏目商讨合作出版的事宜，因为版权问题不好解决，遂萌生了自主策划出版《百万庄财经评论》丛书的想法，并写了一份简单的策划案。想不起来是什么原因，这份策划案居然尘封至今。

想到用"百万庄"来命名丛书，起因无非是中国经济出版社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但潜意识里，"百万庄"这个名字中应该蕴含有值得期待的东西。于是查阅了百万庄这个地名的来历。这一查不要紧，先把自己吓一跳。

原来，新中国成立之前，"百万庄"属于北京城外的郊区，是城里人埋葬死人的地方，名为"百万坟"。后来逃荒的人在坟岗荒地上搭建窝棚形成小村庄，被城里人称为"百庄子"。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万坟"被选为政府公务员居住区之一。既然成了公务员的居所，更换地名就顺理成章，"百万庄"的名字从此就一直延续下来了。根据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提议，由建筑设计师张开济设计，百万庄区域，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十二地支中的概念划分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九个子区。据

说，这样的命名是考虑到小区建立在原有坟地之上，阴宅变阳宅必须要压住原有的阴气。所以前八个区含有八卦之意。很快，一、二、三机部在此建成大型住宅区，全是红砖小高楼，楼层高大房间宽敞，居住起来非常舒适，颇为时人称羡。北京奥运会前，风传这片区域要拆迁，但一批老干部很是留恋百万庄小区，坚决不从。也许是社会文明进步了，也许是小区中藏龙卧虎、老干部余威不减，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拆迁的事再也无人提起。

从一个普通的地名变迁史中，我们也看到了新中国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经意间一句老话重新闪回：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想到此，心里就释然了。

狭义的百万庄是指二里沟以西、三里河以东、车公庄以南、百万庄大街以北这片地方，广义的则指百万庄大街沿线。几年前，我曾想给西城区人民政府写个“提案”，建议将广义的百万庄区域建成出版文化或出版产业一条街，以与东南方的金融一条街相映成趣。由于本人既不是人大代表，又不是政协委员，更没有做深入细致的调研，仅凭这个区域有几家文化出版单位（百万庄大街上集中了外文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百万庄图书大厦等单位，再往西延伸，还有中国财经出版社和经济科学出版社……）就提交如此事关重大的“提案”，感觉不太靠谱，也就不了了之。

用现在的眼光来衡量，百万庄小区相当老旧了。我也曾对那些甘当“钉子户”的老干部耿耿于怀，如果他们不阻挠，也许我们出版社现在已经搬进新的写字楼了。前不久，一位多年不见的老作者来访，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抱怨：你们这里停车实在太费劲，不过这么一个闹中取静之所，现在也不好找了。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闹中取静”，多难得的意境！这不正是《百万庄财经评论》所应该追求的吗？

（二）

我们处于一个喧嚣的时代。当下的经济理论界、媒体、舆论，用喧闹、浮躁来形容毫不为过。有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顾识，只为博眼球；有的是笃信“理论的力量在于彻底”，坚持一条道要走到黑；有的声称无法忍受当下的种种不公、不正、不平，为变而变，不知顶层设计为何物；有的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的只讲世界观不讲方法论，最终只能流于纸上谈兵……

在这样的喧闹中，如何让人冷静下来，用理性思维，用建设性的对策，对转型社会提出可操作性的指导，做到闹中取静，为改革、发展和社会的民主进步、平稳转型作出贡献，这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经济学家、媒体人的共同追求。

当然，首先政府要带好头，科学执政，理性执政。治大国若烹小鲜。社会越是喧闹、杂音越多，越需要政府保持理性，在出台牵涉面广、事关国计民生的宏观政策时，不能闻风就动，不能出手过快，要冷静应对。比如，当前我们已经把调结构转方式作为一个既定战略，那就必须心无旁骛，若干年不动摇，正如马光远教授在其博文中所说的，“抗外界干扰的能力可能更是中国财经决策当局最需要的”。否则，昨天是次贷危机，今天又有欧债危机，明天国内的月度经济数据又不好，决策当局岂不将应接不暇、无所适从？凡是目标明确的、社会有共识的改革领域，应做好顶层设计，不再拖延；凡是看不太清、社会还没有达成共识的需要改革的领域，可以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其次，知识界、理论界也要理性献策。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洗礼，知识界和理论界也成熟起来了，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未来走向进行理性思考，提出了很多宝贵的理论指导和对

策建议。这些声音是多元的，对提高政府执政水平、进一步开启民智，有很大的帮助。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这样的进步既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又是推动社会经济前行的一种动力。它可以提高决策当局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更对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希望这样的理性思考越来越多。我们注意到，近期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讨论热点是“注重顶层设计还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争论就很有意义。遗憾的是，当前，口水仗多而理性论战少，我们看到的论争，不少是炒作，是泡沫，是舆论的虚假繁荣。一些著名学者，高调地为明显不合情理或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行为和现象作辩护，有的甚至明显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这也是滥用权利的一种表现，是喧闹，是噪音。

（三）

在建设民主、富强、稳定、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崭新时代，作为文化产业的主阵地和主力军，出版界不但要自觉自律，还要有所作为，我们出版人更是义不容辞。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也是一个糟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又恰逢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观点和声音的交锋与激荡将是一个常态，出版人的职责就是要用多元、理性的观点和声音来丰满人们的书包和屏幕，让功利主义和浪漫主义离我们远一些。我们推出《百万庄财经评论》就将遵循理性与建设性的原则。作为以出版经济类图书为主要特色的出版社，《百万庄财经评论》将立足于经济理论探索、宏观经济调控、微观经济管理等财经领域，当然也不排斥与此相关的社会管理、政治改革等重大课题；丛书的作者主要面向中青年经济学家、财经评论专家，通过认真筛选，将那些学术素养高、治学严谨、社会责任感强的专家学者的富有建设性、观点鲜明、注重操作性的观点和声音放大，让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声音更加集中，更有冲击力，发挥更大的

作用。

要达到以上要求,仅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让我们欣慰的是,已经有一批专家学者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他们或者愿意直接提供高水平的专著和文集,或者是愿意给我们出主意、提建议、当顾问,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能有更多一流、一线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在严谨治学之余来理性献策。

我们立足于百万庄——一个闹中取静之所,希望通过《百万庄财经评论》给广大读者传递一份喧嚣中的宁静。

毛增余

2012年5月18日于百万庄

序言 Preface

欧元的选择只有早死或迟死

2011年11月1日，“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表示，欧元区国家面对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不能像欧元区成立之前那样用货币贬值来应对，只能不断增加公共债务，这是欧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欧债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有关。蒙代尔认为，应进一步推进欧洲的财政一体化。他建议，应建立有管理的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货币”(INTOR)，这种货币非黄金也非美元，而是由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等几种主要货币按照比例组成的“一揽子货币”。“一揽子货币”按照一定比例组合统一与黄金挂钩，其他币种则根据INTOR制定自己的汇率空间。

但蒙代尔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未免有些书生气。其实，早在19世纪中叶，恩格斯就预言说，欧洲大陆必然衰弱，美国与俄国将成为20世纪的超级强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便梦想着统一欧洲大陆，这个大陆使用统一的货币，并以此对抗当时首屈一指的大英帝国与美苏强权。拙作《世界金融五百年》一书指出，希特勒战争的目的不在于战争本身的攻城略地，而在于：“自始至终，希特勒的胜利秘诀是政治智慧，而不是军事征服。希特勒并不认为德国有同英美苏三大国的联盟发

生长期战争的可能,他自信自己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若不行则通过一系列小规模战争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在他看来,在政治手段和进攻波兰的小规模战争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线。希特勒本人也知道,一旦国家综合实力与军事力量成为决定因素时德国便会完蛋。希特勒……说过,'一个国家并不靠货币的表面价值来维持生活,而是要靠真正的生产,而生产才能使货币获得价值。生产才是货币的真正准备,银行保险箱中存满了黄金并无意义'。依靠华尔街德国重建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此时的希特勒意欲在这个基础之上打破英美主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建立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经济新秩序。"

意图武力整合欧洲的希特勒失败了,现在的德法两国意欲通过欧元来整合欧洲大陆的努力也必将失败。众所周知,现代货币基础都是背后的国家信用,现代法定货币与国家财政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政府支出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融资,政府税收创造了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同时回收货币。政府税收与货币币值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早在几百年前的中国古代,政府便"通过提高税率,来大量回收纸币,缩小纸币流通量,提高民众对纸币的需求量,从而保证纸币的价值"。因此,与过去的金银货币不同的是,现代法定货币无法脱离国家而存在。换而言之,政府及其发行的货币,其目的在于维护一国资本的整体利益。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国家而由市场调节的乌托邦思想只是建立在理论经济学家的纯粹理想之中,根本缺乏实证支持。

欧元的基础名义上是多个国家的信用,个体的理性导致机体的非理性,从根本上缺乏牢固而稳定的信用基础。欧洲各国由于历史、文化、语言与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差异,难以形成一个整体。从政治意义上讲,超国家主权的统一的欧洲并不存在,只有各国政府才拥有合法权力。从社会

经济意义上讲,欧洲更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欧盟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英国、德国和法国是其中最为发达的国家,其次是荷兰、瑞典、西班牙和意大利北部,而东欧和部分南欧地区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关系类似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有趣的是,即便是在欧盟一些成员国内部,民众期望的是分裂而不是统一。例如在意大利,意大利北部是发达的工商业地区,而意大利南部则是落后的农业地区,当地黑手党横行,意大利北部民众早就想丢掉南部这个包袱,寻求独立的途径了。

欧元恰恰是在尚不存在"欧洲"这么一个国家时诞生的。表面上看,欧元是一种像蒙代尔这样的理论经济学家心目中独立于国家的理想货币。但是,欧元诞生本身就极为荒谬。欧洲缺乏在整个欧洲大陆范围内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也没有防止在欧洲落后地区出现失业率高企的欧洲一盘棋的财政机制。因此,欧元区内部各成员国必然存在着差别巨大的工资水平、社保和财政税收体制,而这些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欧元一旦发生危机,由于各国财政的不统一,整个欧洲必将陷入一种无力施救的不断衰退的状态。书生蒙代尔所建议的统一欧洲财政无异于闭门造车,是书斋中的幻想。

此外,欧元自诞生以来,便对美元形成严重威胁与巨大挑战。这是因为,一旦欧洲形成一个整体,欧元获得了坚实的信用基础,欧洲与美国就取得了平等的地位,欧元区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元必将崩溃,美元及其之上的美国霸权将付诸东流。

美国作为当代世界的超级强权帝国,和历史上的诸多帝国都不太相同,它以金融霸权作为其强权的基础。金融霸权的核心则是美元。自1971年,美元挣脱黄金的枷锁后,美国以枪杆子支撑美元的世界货币地

位，然后再以美元为世界货币来控制全球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元的石油本位体制。美国通过地缘政治活动和军事部署，保证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单位。

美国通过掌控世界货币体系来控制他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税收制度，从而控制其产业发展，迫使其走上美国所希望的路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便是美国实行其金融霸权的两大工具。以 IMF 的标准，美国早就应该执行紧缩政策来保住汇率，并优先向中国还债同时开放金融与高科技市场，甚至该宣布国家破产了。弱国只能按照 IMF 强制性的荒谬建议自吞苦果，而美国却潇洒如故，对国家核心技术与战略产业严密保护，同时肆无忌惮地继续大规模举借外债。IMF 的双重政策可见一斑。世贸组织的所谓自由贸易，同样执行双重标准，美国设置一系列的贸易障碍，而他国却只能完全开放市场给美国。

结果，美国通过军事与金融霸权以天文数目的债务和贸易赤字来吸收全球资源。美国以不到全球人口的 5%，消耗了 20% 的全球能源、16% 的淡水、15% 的木材，制造了 10% 的人类垃圾和 25% 的二氧化碳。因此，美国人无法容忍欧元对美元的挑战，必将采用一系列的组合拳击垮欧元。只要有美国这样的强权存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就不太可能完成，欧元的信用基础就无法夯实。

美国人在 21 世纪初所发动的几场战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针对欧元。自 2007 年以来，美国本身已陷入危机之中，急需让国际资本流向美国来维持其庞大的金融体系。搞垮欧元正为这一目的。按理讲，希腊这样的一个小国发生危机根本不会动摇欧元目前的地位。但美国只不过以希腊作为一个楔子，利用其控制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蓄意放大“欧猪五国”（PIIGS）的主权信用危机，迫使诸如希腊这样的国家退出欧元区，从

而引起欧元区其他弱国的链式反应。所谓攻其一点,动摇全线,从而造成欧元全面崩溃从而收编欧元区经济。

据瑞士银行的分析,德国这样的较强成员国退出欧元区后,第一年的人均成本约为6000~8000欧元,此后为3500~4500欧元/年,这相当于第一年GDP的20%~25%。更为严重的是,欧元瓦解后,欧洲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将不复存在。较弱成员国退出欧元区后,第一年的人均成本约为9500~11500欧元。随后几年的人均成本可能为3000~4000欧元/年,这相当于第一年GDP的40%~50%。此外,现代法定货币联盟的瓦解几乎都会导致某种形式的独裁、军人政府甚或内战,欧洲也不会例外。

欧元崩溃之后,不仅欧洲要承受巨大打击,而且与之有紧密的政治与经济联系的其他地区也将受到牵连。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是几十个过去殖民地国家的金融中心,比如西班牙、葡萄牙是南美巴西、阿根廷等国的金融中心。随着欧元的崩溃,大量欧元资产将变成坏账,欧洲银行必然采取紧缩策略,南美这些国家的金融与经济必将遭到严重打击。美国在打击欧洲的同时,顺手还能收编这些国家。策略之高令人叹服!

欧洲唯一可以幸免于难的国家只有英国。英国从来就有对欧洲大陆分而治之的策略,英国人的崛起与此不无相关。英国凭借其高超的战略眼光与手段游离于欧美之外,却两边讨到好处,从而可以保证英镑与英国目前的国际地位。

至于中国,虽然力挺欧元,但也只是以欧元为手段来消耗美国实力,并不能保证欧元不死。总而言之,只要欧洲大陆无法统一成一个国家,形成统一的财政政策,欧元就不可能具备坚实的信用基础。这个过程现在来看仍然遥遥无期,而美国才是欧元命运的掌控者。因此,欧元的早死或迟死无非要看美国人愿意怎么做了!

最后，要特别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的彭彩霞主任对本书撰写与最终出版的鼎力支持和持续关注。感谢新法家网站站长、北京龙芯智见公司董事长徐光宇先生，《托普检讨》作者、成都紫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志宏先生，中国新法家领军人物、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翟玉忠先生，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先生，知名财经评论家、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解放日报》经济评论员叶檀女士，加拿大皇家银行风险管理部资深顾问、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华尔街》顾问陈思进先生，中国社科院曹建海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余斌研究员，前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机械工业联合会国际合作部蒋晓健先生，中国移动安徽分公司洪敦杰先生，他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给予了大量的关心与帮助。还要感谢吴世佳女士与黄顺霞女士的鼓励与督促，没有她们的激励，本书也无法如约完稿。

余治国　叶楚华
2012.3

目录
CONTENTS

引子 Introduction

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受到严重的冲击，爆发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所谓主权债务，是一国以国家主权为担保，通过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债券向国际机构、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机构借来的债务。如果国家信用评级被调低，国债发行的利率随之上涨，借新债还旧债的过程必然难以持续。这就会引发主权债务危机，通俗地讲就是国家破产。

欧债危机便是这么一个诸多国家濒临破产的演进过程。欧债危机从 2009 年底首先在希腊爆发，到现在逐渐蔓延至整个欧元区。这个过程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先让我们看一下欧债危机迄今为止发展演变的简要过程。

2009 年 12 月 8 日，惠誉将希腊信贷评级由 A－下调至 BBB＋，前景展望为负面。

2009 年 12 月 11 日，希腊政府表示，国家负债高达 3000 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

2009 年 12 月 15 日，希腊发售 20 亿欧元国债。次日，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 A－下调为 BBB＋。

2009 年 12 月 22 日，穆迪宣布将希腊主权评级从 A1 下调至 A2，评级

展望为负面。

到了2010年初，希腊债务危机逐渐蔓延至其他国家，整个欧元区都受到债务危机困扰。

2010年1月11日，穆迪警告葡萄牙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赤字将调降该国债信评级。

2010年2月4日，西班牙财政部指出，西班牙2010年整体公共预算赤字恐将占GDP的9.8%。次日，西班牙股市急跌6%，创下15个月以来最大跌幅。

2010年4月9日，惠誉下调希腊政府债务信用评级至BBB-。

2010年4月23日，穆迪将希腊主权债务评级下调至A3，希腊正式向欧盟与IMF申请援助。

2010年4月27日，标普下调希腊评级至BB+，这一级别属于垃圾级别。

2010年5月2日，希腊救助机制启动，欧盟与IMF提供总额达1100亿欧元的救助资金。次日，德国批准224亿欧元援希计划，这是欧盟、IMF等主导的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2010年5月10日，欧盟批准7500亿欧元希腊援助计划，IMF可能提供2500亿欧元资金救助希腊，以避免危机蔓延。

2010年9月7日，欧元区财长批准为希腊提供第二笔贷款，总额65亿欧元。

2010年11月24日，标准普尔宣布将爱尔兰长期主权债务评级从AA-调降至A，短期评级由A-1+调降至A-1，将该国短期和长期债信评级纳入负面观察名单。标普称，评级下调归咎于爱尔兰政府借款将增加且规模高于预期，国际援助不会消除爱尔兰政府的负面宏观经济压力，

爱尔兰内需在2012年前不可能复苏。

2011年1月14日，惠誉将希腊主权信贷评级由BBB-级下调至BB+级，评级展望为负面。

2011年3月7日，穆迪将希腊国债评级从Ba1下调至B1，评级前景为负面。

2011年3月16日，穆迪调降葡萄牙主权债信评级两个等级至A3。穆迪称调降葡萄牙主权信用评级是因为其不断高涨的融资成本同时政府削减公共债务力度不足。

2011年3月24日，惠誉宣布将葡萄牙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2级，从A+下调至A-。葡萄牙国债的预期收益率一再攀高，10年期国债的预期收益率已经达到7.6%，5年期国债预期收益率达到8.2%。

2011年3月29日，标普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BB+下调至BB-。

2011年6月29日，希腊议会通过了为期5年的财政紧缩方案，这为欧元区出台新一轮救助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1年7月4日，标普将希腊长期评级下调至CCC，指出以新债换旧债计划或令希腊处于选择性违约境地。

2011年7月21日，欧元区通过紧急峰会再向希腊提供1090亿欧元贷款的第二次援助。贷款到期时间从7年半延长到15年至30年，利率从4.5%降低至3.5%。银行等私营机构同意在2014年前经由回购希腊债券等方式出资大约500亿欧元援助希腊。

2011年7月27日，标普下调希腊评级至CC，展望为负面。标普认为欧盟的希腊债务重组计划是廉价交换，看似希腊债务交换和展期选项对投资者不利，希腊债务重组相当于选择性违约。

2011年9月19日，标准普尔近5年以来首次下调意大利的主权信用

评级，从 A + 下调至 A，理由是该国经济增长疲软以及政局不稳的情况将增大其应对欧元区危机的难度。意大利 2.6 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规模比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四国债务之和还要大。

2011 年 10 月 4 日，穆迪将近 20 年以来首次下调意大利评级，从 Aa2 下调至 A2。

2011 年 10 月 7 日，惠誉评级下调西班牙评级至 AA -，下调意大利评级至 A +。

2011 年 10 月 26 - 27 日，欧盟各国领导人召开了 21 月内的第 14 次危机峰会，延长一项价值 1300 亿欧元的希腊最新援助计划。

2011 年 11 月 2 日，欧盟各国领导人切断向希腊提供的援助付款，称希腊必须很快决定是否想要继续留在欧元区中。

2011 年 11 月 9 日，意大利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 7% 大关，意大利破产风险急剧上升。

2011 年 11 月 17 日，西班牙 36 亿欧元 2022 年到期的 10 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飙升至 6.975%，创 1997 年以来新高。

2011 年 11 月 19 日，西班牙财政部发行的新一轮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 7% 的警戒线，拉响西班牙债务危机警报。

2011 年 11 月 21 日，匈牙利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提出金融援助的申请。穆迪表示，法国国债收益率上扬且经济增长前景更趋疲弱，这将可能对法国主权评级构成负面影响。

2011 年 11 月 23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鉴于欧洲各国领导未能终止债务混乱状况，决定修改其信贷计划，鼓励面对外部风险的国家寻求只附带少数条件的 IMF 资金。德国拍卖 60 亿欧元 10 年期国债，最终只出售六成，德国债券遭市场抛售，10 年期国债利息急剧攀升，两年多来首次超

越英债。

2011 年 11 月 24 日，惠誉表示，由于葡萄牙债务高企以及经济前景不佳，惠誉将葡萄牙主权信用评级降至垃圾级。

2011 年 11 月 25 日，穆迪下调匈牙利债券评级一个级别至 Ba1，是垃圾级中最高一级，前景展望负面。该国目前在标准普尔和惠誉的评级均是投资级别中最低一级。葡萄牙主权评级遭惠誉降至垃圾级别，即由 BBB - 降至 BB +，前景展望为负面。

2011 年 11 月 28 日，穆迪称，欧洲的债务危机正在威胁全部欧洲主权国家的信贷情况，意味着即使最高评级的德国、法国、奥地利和荷兰都有危险。

2012 年 1 月 13 日，标普公司集体下调欧元区 9 国主权信用评级，法国、奥地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马耳他的信用评级被下调一档，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的信用评级被下调二档，其中法国和奥地利失去了最高的 AAA 评级。1 月 16 日，标普又将欧洲肩负救援任务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信用评级从最高的 AAA 级下调一档至 AA +。

2012 年 2 月 14 日，标普下调了 34 家意大利银行的信用等级，其中奥地利银行的母公司意大利裕信银行长期信用等级从 A 降为 BBB +，短期信用等级为A - 1，前景展望为负面。标普认为，受到国家高额债务以及欧洲银行监管机构严格监管政策的影响，意大利银行将面临更大的融资困难，其长期赢利能力将不断减弱，可能影响银行系统的稳定性。

2012 年 2 月 15 日，穆迪宣布下调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马耳他、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等 6 国评级，并将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 AAA 最高信用评级前景置于负面。其中，西班牙主权信用评级已从 A1 下调至 A3，葡萄牙主权信用评级已由 Ba2 调降至 Ba3。穆迪认为，欧元区金融和宏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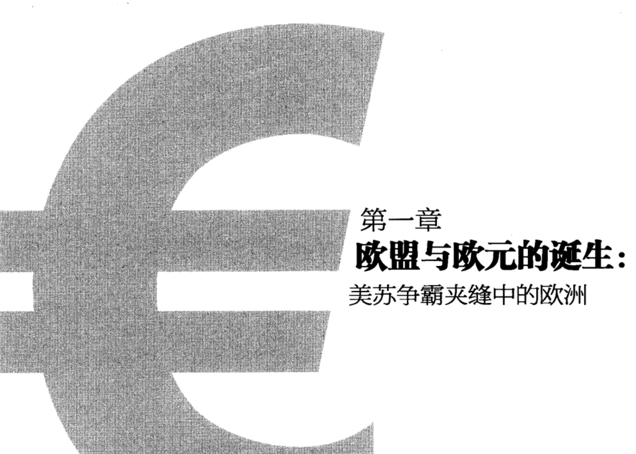
经济的风险正在扩大，该地区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2012年2月28日，标普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评级前景下调至负面。由此，继该基金于1月份AAA级不保之后，其在未来两年内有进一步遭降级的可能。标普称，此次降级的理由是，法国和奥地利经济发展局势不明朗，且其信用评级AA+前景为负面。

2012年3月2日，穆迪宣布，将希腊债券评级从Ca下调至最低级C。穆迪称，降级主要是因为近期宣布的希腊债券置换计划将使私人投资者损失70%以上。

最近，欧洲央行行长表示，“欧债危机最糟时刻已经过去，但仍有风险。欧元区情况趋向稳定，像通胀、经常账户还有重要的预算赤字，要比美国好得多。”但这实际上是掩耳盗铃，欧债危机正日趋严重，而欧元也岌岌可危，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正遭受严重挫折。

当然，欧债危机与欧元演变的趋势不仅对欧洲，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与金融都将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对欧债危机及欧元全面分析与趋势预测显得极为必要。如果就事论事地讨论欧债与欧元，将有管中窥豹之嫌。要全面系统地了解欧元与欧债危机，就必须要让我们回到许多年前欧洲独霸世界的那个帝国主义时代……



第一章
欧盟与欧元的诞生：
美苏争霸夹缝中的欧洲



一、独霸世界数百年的西欧国家

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一统中国截然不同，欧洲的历史总是分多合少。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分裂为众多国家。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统一欧洲大部地区，建立法兰克帝国。但好景不长，公元843年，查理曼大帝死后，帝国分裂为三个部分，即后来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雏形。此后，尽管出现过拿破仑、希特勒等试图以武力统一欧洲的大人物，但欧洲却始终未被统一为一个政治与经济上的共同体。

在18世纪之前，中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亚洲的中华帝国是国际权势和影响力相当的竞争对手，而欧洲国家却处于不间断的战乱之中。正是因为一直处于持续战争或战争准备的状态，欧洲国家就得发展出为发动战争而集中军事力量和征税的中央管理机构。在整个17世纪，欧洲各国已经成功地演化出一套系统化的现代政府管理体系。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国家竞争的方式，要赢得战争必然需要拥有领先于他国的有效的战略和先进的军事装备。因此，欧洲的四分五裂造成战争绵延不断，但同时也推动了欧洲科技与文化的进步，大大增强了欧洲的综合实力。到18世纪末，欧洲军队的武器装备已远远领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的军队。

18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英国成了当时世界最尖端产业——纺织业的国际中心，随后又成为世界工厂。法国与德国则紧追其后。1870年，仅英国一国就占当时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2%，法国为10%，德国为13%。英法德三国占了世界工业总产值的55%。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天平倾向于欧洲。日本NHK电视台2009年大河剧《坂上之云》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19世纪的国家，要么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要么沦为列强的附庸，没有第三个选择。而19世纪世界舞台上争夺国际政治与经济霸权的无非是欧洲内部的英、法、德等国家，而其他地区则逐渐沦为欧洲国家的附庸。

那时的美国不过是欧洲国家的经济附庸国。美国人进行着食品、木材及其他初级产品的生产与转口贸易活动，却进口着欧洲的工业成品。除了北美的地理位置不同外，美国人的经济活动与欧洲国家没有多大区别，而美国则完全是从属于以欧洲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那时的俄国亦然。19世纪的俄国尽管是欧洲领土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却是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1860年，俄国铁产量为29万吨，而德国铁产量在1850年就有40.2万吨，俄国的铁路有1500公里，而英国有1.5万公里。俄国出口的是农产品进口的是工业品，成为西欧各国的原料供应地。俄国最为重要的工业——石油工业的控制者不是俄国人，而是瑞典的诺贝尔家族与如雷贯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连美俄两国都只能甘拜西欧国家之下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那些落后国家更是只能沦为西欧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这样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与货币体制体现了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的主导地位。

19世纪初，英国率先确立了金本位制度，从1871年德国开始以采纳

金本位制到1900年美国采用了金本位制，最终形成了的国际金本位体系。国际金本位体系实质上是以英镑为结算通货和准备通货，以英国伦敦为国际金融中心，以英格兰银行的政策运营为统括的英镑体制。英国通过这一体制支配了世界金融体系，并凭借自己的金融霸权在货币发展、海外贸易与投资领域获得了巨大的霸权利益。

在英国占据了世界贸易的压倒性比重，并作为国际贸易结算、海上保险以及海运等贸易关联业务国际结算、国际资本供给中心发挥贸易金融机能之时，英国成为国际货币发行国，而英镑也自然成为事实上的国际交易和结算所使用的国际货币。利用伦敦世界金融中心和英镑国际货币的地位，英格兰银行扮演了世界央行的角色。同时，由于部分准备金制度，英镑的数量远远超过黄金准备量，因此英国的黄金准备只要有些微变化，就可以通过英镑的成倍扩张和收缩，成倍地吞吐黄金，从而控制世界市场的黄金和英镑供应，以谋求英国利益的最大化。

英国对黄金的操纵方法很多，其中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用英镑买卖黄金。当世界市场上的黄金供应过多导致英镑有升值压力时，英格兰银行用英镑购买黄金，于是市场上英镑扩张，黄金紧缩，从而维持英镑和黄金比价。反之则反向操作。英格兰银行还可以通过利率即银行贴现率调整来控制英镑和黄金的比价。当英镑贬值被换成黄金外流时，英格兰银行提高贴现率，从而提高伦敦货币市场利率使黄金回流购买英镑，增加英镑纸币黄金储备，使英镑币值保持坚挺。当英镑升值时，英格兰银行降低银行贴现率防止英镑纸币升值，稳定英镑与黄金的比价。

在确保英镑与黄金固定比价的同时，英格兰银行通过黄金买卖造成其他主权货币与黄金之间兑换率的波动，人为制造套利空间牟取暴利。比如，英格兰银行可以卖出黄金回收英镑纸币，同时扩张信贷，保持固定

的黄金与英镑兑换率。此时，世界黄金市场供大于求，其他主权货币与黄金或英镑的兑换率上升。反向操作则能抬高其他主权货币的汇率。这样就可以造成英镑与其他货币汇率的波动，有波动就创造了套利空间。因此，国际金本位建立后，英镑的货币力量已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维持大英帝国政治与经济霸权的权力资源。

此外，黄金不能生息，只具有保值作用。而英镑却能生息，并且可以随时兑换成黄金。那时，英国殖民地、英联邦国家（美国独立后，英国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不断对各殖民的自治要求作出让步。1867 年，加拿大成为英国的第一个自治领，即与英国享有自由联合的自治领地。随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联邦都成为自治领地。“一战”后，英国元气大伤，自治领力量却大涨。1931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案，正式成立了英联邦，从法律形式上承认了自治领的独立与平等地位。当时的英联邦国家包括加拿大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和纽芬兰）以及和英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往往都将英镑作为他们本国货币的储备。因此，英镑有时候比黄金还要好用。

世界在英国人的掌握之中。英国人用英镑购买了大量海外资产，比如阿根廷的铁路、美国的农场、印度的黄麻加工厂和非洲的椰子园。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洋洋得意地写道：“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是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就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洋洋得意，充满信心，极为愉快地注视着帝国的威风！”

西欧诸国均追随英国，自发自愿地融入到与黄金固定的英镑本位制度之下。在国际金本位制制度下，除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国际金融，还有巴黎、柏林等次一级的国际金融中心，其与英国伦敦共同形成了以英国作为塔尖的针对国际金本位体制的多元化的金字塔型的共同管理体系。以英国为核心国，以西欧其他国家为中心国，当时的西欧国家正享受着独霸世界的荣光。

二、两次世界大战促使欧洲衰落，美苏崛起

（一）恩格斯的预言

就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独领全球风骚之时，却有一位伟人以其敏锐的目光、深远的洞察力预测到欧洲的衰败与美苏的崛起，尤其是美国的崛起。这个伟人便是与马克思并肩的革命导师恩格斯。

1882 年，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评述美国："一个二十年之后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的国家……二十年之后，它就会完全以另一种语言来讲话了。"

1888 年，恩格斯准确地预言道："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就发现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美国人也总是竭力使我们相信这种看法。他们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迟疑的、带有各种陈腐偏见的、害怕一切新事物的不切实际的人；而他们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

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跟我们不同……在各种工业发明方面，美国已经肯定地起着主导作用，而德国正在同英国争夺第二位。”

几年后，恩格斯又预言道：“一旦美国人开始做了，他们就会以巨大的力量和飞快的速度做下去，使我们欧洲人相形之下显得十分幼小……当英国迅速丧失它在工业上的垄断地位的时候，法国和德国正在接近英国的工业水平，而美国正要不但在工业品方面，而且在农产品方面把它们统统赶出世界市场。”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伟人终归是伟人。早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预言，德国吞并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已经埋下了一次具有欧洲规模的战争祸根。到19世纪末，恩格斯在诸多文章中预言到世界大战的到来。他写道：“整个欧洲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进行武装，已经有25年了，每一个大国都力求在军事威力和战争准备方面超过另一个大国，德国、法国、俄国在竭尽全力要彼此超过……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1000万到1500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规模和剧烈程度空前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战争的严重后果将会遍及欧洲大陆，那时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机构将陷入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则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

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到街上而无人拾取。”

历史的演变果不出恩格斯所料。硝烟弥漫、战火纷飞，两次世界大战埋葬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的世界霸权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欧洲霸权的严重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标志着欧洲世界中心地位的彻底丧失。随着普鲁士对德国的统一，在欧洲大陆上，各国之间的均势被打破，欧洲各大国纷纷争夺世界霸权。于是，作为欧洲内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开打了。这场战争大伤欧洲国家的元气。仅英国的战费就占国民财富的32%，法国占30%，德国占22%。在“一战”之前，欧洲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些投资每年产生大量的利润回流欧洲。“一战”后，英国失去了其对外投资的1/4，法国失去了1/3，德国则失去了全部对外投资。到1938年，英、法、德三国工业总产值下降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5%，其中英国为9%，法国为5%，德国为11%。从此，欧洲开始逐渐丧失国际经济与金融主导权。

（二）美苏的崛起

美国却坐收渔翁之利。“一战”前，美国靠欧洲提供其所需的资本。在1914年，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约为40亿美元，当时美国国债总额才不过十几亿美元而已。协约国政府为了支付战争物资款，先被迫出售了它们在美国的投资，后又向美国借款。1919年，美国已成为一个借出款项达37亿美元的债权国，到1930年时，这个数字已上升到88亿美元。此外，欧洲许多工业区在战时遭到严重破坏，美国工业大发战争财，开始迅速扩张。到1938年，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2%。

苏联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借助外国资本而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例子。苏联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十年间的工业增长速

度，在西欧国家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从1928年到1938年十年间，苏联铁和钢的产量增长了3倍，煤增长了2.5倍。1938年，苏联成为世界上农用拖拉机和铁路火车头的最大制造者。它的全部工业产量的80%都来自两个五年计划中建设的工厂。到1938年，苏联工业产值接近英法德三国总和，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9%。

欧洲世界中心地位的丧失只需要最后的临门一脚。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是这最后一脚。“二战”之后，欧洲的英法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财富，德国战败，欧洲普遍衰落；美国经济军事实力极度扩张，成为头号强国；苏联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世界上唯一稍稍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1945年初，罗斯福、斯大林与作为陪衬的丘吉尔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重新划分世界版图和势力范围，建立以美国和苏联两极为中心的世界新体系。西欧人把美国当成救世主，而东欧人则唯苏联马首是瞻。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实力强劲的美苏两大国掌控了欧洲，欧洲人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结局。

“二战”尚未结束的1944年，美国召集各国代表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会议，会议上最终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世界银行（又称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由此诞生。在这两个组织中，各国的投票权取决于其所贡献的资金多少。显而易见，美国人占有最多的股份，能够有效控制这两个国际组织。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本位制正式加冕，美元登上王者宝座。各国的货币与美元以固定汇率挂钩，在平价1%的范围浮动；美元则与黄金挂钩，各国政府可以以35美元1盎司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国保留黄金所体现的经济与政治权力，保住作为国际金融基础的美国黄金，并在此基础上奠定美国的金融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是建立以美元为

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又称美元—黄金本位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内不流通金币，只流通银行券。银行券可以兑换外汇，但这种外汇只能到国外才能兑换黄金。这种制度，是把本国货币同另一金本位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比价，并在该国存放大量黄金或外汇基金，以备随时出售外汇。

战后的美国最初是将英国视作对手，而将苏联看成自己的左膀右臂。美国政府认为，苏联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于保证战后的美国霸权是极为必要的，因此他们打算将苏联纳入布雷顿森林体系。1943 年，美国财政部准备给予苏联 10% 的 IMF 份额。苏联想从世界银行获取长期贷款，并从美国那里以租借形式获得信贷来尽快进行战后重建。美国答应给苏联 35 年期、利率 2% 的 100 亿美元的长期贷款。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可以保证美国获得苏联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并将苏联变成美国商品的出口市场。美国人认为，苏联为了获取足够数量的贷款最终一定会忍气吞声，接受美国的条件。苏联也知道，尽管美国打着自由贸易、门户开放的幌子，实际上是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考虑，无非是想把苏联也纳入到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之中。

几个世纪以来，俄国多次遭受欧洲国家的侵略。十月革命后的 1917—1920 年，欧美日甚至波兰都派遣了成千上万的军队入侵苏联。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不承认苏联政府的合法性。1938 年，欧美国家又试图将德国纳粹的祸水东引苏联。即使在“二战”中苏联与西方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之后，美国还多次食言，有意推迟第二战场的开辟，意图让德国与苏联互相残杀，相互消耗元气。1941 年，后来的美国总统、当时的密苏里州参议员杜鲁门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快要胜利了，我们就该帮助俄国；如果我们看到俄国将要取胜，我们就该帮助德国。要用这种办法让它们两国相互厮杀，杀得越多越好。”

这让苏联不仅感到自身的弱小与不安全,还将西方国家看成不可靠的盟友。

结果,尽管苏联勉强在"布雷顿森林协定"签了字,却于1945年12月29日拒绝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退出布雷顿森林协议。在1947年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代表指责说,"布雷顿森林机构只不过是'华尔街的分店',世行从属于政治目的,这让它成为了一个大国的工具。"这个"大国"指的就是美国。

美苏冷战成了历史演变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其实,美苏冷战的本质并非意识形态之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国家利益。美俄之争早在20世纪初便在中国的华北与东北开始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美国要求把东北的奉天、安东、哈尔滨开辟为商埠。东北是美国在华的主要市场,美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有2/3是通过天津、烟台和牛庄三个港口进入东北和华北的。而俄国一向视东北为禁脔,不许他国染指。美国的要求主要针对俄国,其目的是反对俄国对东北三省的独占。到日俄战争爆发时,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的一封家书中幸灾乐祸地写道:"我对日本的胜利特别高兴,因为日本在为我们打仗"。美国还从财政和外交上支持日本进行战争,美国希望俄国和日本相互牵制,相互削弱。

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扩张逻辑,即为保护统治核心区,需要不断向外扩张,新的势力范围不仅增加了可以提高战争潜力的财富,也可以作为应对外部进攻的缓冲地带。苏联希望收获"二战"胜利的果实,建立三道安全屏障。第一道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波兰、东普鲁士部分地区在内的历史上便隶属于东斯拉夫民族的核心统治区,第二道是东欧卫星国,第三道是奥地利、芬兰等力量较弱的中立国。

但苏联的实力相对弱小,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地理位置优越,

其本土自1814年英属的加拿大军队焚毁华盛顿白宫以来，再未受到外来武力的侵袭。苏联地处欧洲，“二战”中人口损失2500万，工农业遭受严重打击。“二战”后，美国钢产量增加了50%，苏联却下降了50%。美国年产汽车70万辆，苏联才区区6.5万辆。1950年，苏联工业产值仅为美国的1/3。广岛上空爆炸的原子弹更是让美国对苏联在战略上拥有了压倒性优势。因此，从战略上讲，美国力图压制苏联，保证自己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换而言之，美国力图压缩苏联的战争果实，要将苏联纳入自己的世界新体系之中。这便是冷战的真正起因。至于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无非是马后炮而已。

三、德国劫后余生的经济复兴

（一）希特勒摧毁了德国的霸权梦

俾斯麦的出现是德国人的幸福。俾斯麦以其深邃而又宏大的战略构思，灵活而又辩证的路线筹划，让德国一跃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自他死后，德国再也没有一位运筹帷幄的战略大师。无论是威廉皇帝还是希特勒，在战略上都非常短视。尤其是希特勒，将德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希望彻底毁灭。

对于希特勒，英国历史学家泰勒曾这样说过：“在主权国家的世界中，每个国家都尽最大的努力谋求它自己的利益，至多由于错误而不是由于罪行受到批评。像往常一样，俾斯麦在谈到1866年奥普战争时发表的意见是正确的：‘奥地利反对我们的要求和我们提出要求一样不是什么错误’……希特勒的目的是使德国成为欧洲的支配性大国，或许更久以

后成为世界的支配性大国。其他强国过去追求相似的目的,现在仍然如此。其他强国也把小国看作他们的仆从国。其他强国也试图用武力保卫他们的重大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希特勒除了是一个德国人之外,他没有什么过错。"

自始至终,希特勒的胜利秘诀是政治智慧,而不是军事征服。希特勒并不认为德国有同英美苏三大国的联盟发生长期战争的可能,他刚愎自用地认为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若不成功则可以通过一系列小规模战争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在他看来,在政治手段和进攻波兰的小规模战争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线。希特勒本人也知道,一旦国家综合实力与军事力量成为决定因素,德国便会完蛋。

希特勒意欲在这个基础之上打破英美主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建立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经济新秩序。新经济秩序是将欧洲组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共同体,在德国的指导下进行运作。德国将成为欧洲大陆的工业中心,周围是一批组织起来供应它所缺少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国家:东南欧将增加农业生产,放弃军备及辅助工业;丹麦将减少养牛和乳类生产,增加谷类和饲料的产量;挪威将致力于在农业上自给自足;甚至法国也将被看作是一个农业国和粮食输出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国必须要成为欧洲金融体系的核心,欧洲的货币将与黄金完全脱离,成员国之间的交易将在固定兑换率的基础上进行。德国将双边清算协议扩展为多边贸易制度。按照这种制度,所有的欧洲国家将通过设在柏林的一个中央票据交换所,用德国马克来结算其贸易账目。柏林将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

"二战"期间,德国便根据既定方针在欧洲打造起新经济秩序的雏形。到1941年底,德国已同欧洲大陆所有其他的国家谈判了清算协定,

这些国家彼此之间也进行了很多这样的谈判。后一类协定中有些是通过设在柏林的中央票据交换所结算的。在那段时间，柏林成了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马克成了居统治地位的货币，许多国家开始通过柏林以马克来结算它们的全部国际贸易。

但是，德国人所建立的脆弱的欧洲新秩序随着战争的失利土崩瓦解，厄运即将降临到德国人的头上。罗斯福总统曾坚决认为，德国的侵略性和破坏性不是希特勒等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问题，因此他多次表示必须把所有德国人全部阉割，使之无法产生好战的下一代。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提出了一个战后处置德国的计划：将德国分割为南北两个国家；将德国的机器拆卸后运往盟国，使德国的经济退回到100年前德国农民的水平；采取及时、仔细、有控制地驱除出境和移民到北美、南美和澳洲的方法，将德国的人口控制在2000万人以下，从而使其丧失威胁欧洲安全的可能性。幸运的是，苏美冷战的开始给德国（联邦德国）走上复兴之路提供了机会。

1945年的欧洲已经被战争摧残得奄奄一息。城市中遍地瓦砾，乡村变成焦土，道路、铁轨和桥梁大多被毁。法国战前1.2万辆火车头战后仅有2800个能用，2/3的商船被毁；荷兰战前的铁路、公路和运河交通线仅存40%；希腊2/3的远洋海轮沉没，1/3的森林被烧毁；波兰3/4的铁路无法使用，1/6的农田被毁；南斯拉夫损失了战前50%的家畜，60%的道路，30%的工业和75%的农田。情况最严重便是德国首都柏林，该城75%的建筑物被彻底摧毁。如果没有1943年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援，欧洲在战后还会饿死、病死上千万人。

为了恢复经济繁荣，欧洲各国压制消费，将资源优先投入到工业部门，同时普及福利制度。福利制度本质上就是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制度，

将资源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从而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社会稳定。但这还远远不够。要想让欧洲经济恢复元气，必须要让德国保持经济繁荣。长期以来，德国是整个欧洲经济的核心与发动机。中东欧国家、荷兰、比利时以及希腊、意大利等地中海国家的商品出口市场主要在德国。法国钢铁业需要的主要能源——煤，产自德国。德国则生产各种高技术产品卖给其他欧洲国家。

1947年的德国与整个欧洲都一贫如洗，他们需要用美元购买大量美国的制成品与原料，却不能生产出足够多的商品卖到美国换回美元。法国与美国的贸易赤字每年达到20亿美元，罗马尼亚、匈牙利发生了超级恶性通胀，德国干脆不再流通货币，转而用香烟作为交易媒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完全无法应付欧洲的大额贸易赤字。危机在欧洲大陆四处蔓延，欧洲的大崩溃即将降临。

美国人是奉行实用主义的。当他们实力低微、无力主导世界时，便成为所谓的孤立主义者，不干涉国外事务；当他们实力强大时，摇身一变则成了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对于美国人来说，欧洲的衰落与危机只要不影响到美国利益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但欧洲危机的前景是再一次的欧洲内战与苏联势力的扩张。1947年，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的共产党夺权在即。杜鲁门总统曾密令驻德美军，一旦法国共产党掌权便开进法国。在凄雨冷风之中的英国政坛上，左翼力量亦将上台。如果内战发生，美国将不得不再一次耗费巨额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干涉欧洲。如果欧洲完全被共产党掌握，苏联将会把美国势力驱出欧洲，美国人只能独守北美孤岛，变成地区性大国，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只能成为梦幻泡影。

（二）马歇尔计划＋良好的经济基础＝德国经济复兴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既要促进西欧的经济复

兴，又要控制西欧的政治体系，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马歇尔计划，又称为欧洲复兴计划。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持续了4年。西欧各国总共接受了美国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2010亿美元。

正如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所阐述的："马歇尔计划的先决条件是，我们希望帮助欧洲的恢复，欧洲要能够而且愿意在世界市场上同我们竞争，正是为了这一原因，欧洲将有能力大量购买我们的产品。"欧洲人获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资金大多用来购买美国的商品，欧洲逐渐成为美国产品的输出市场，从而又拉动了美国的经济繁荣。在计划实行的初期，欧洲国家将援助大多用于进口急需的生活必需品，如食品和燃料，随后又用于重建的原料和产品。在援助的总资金中，有34亿美元用于输入原料和半成品，32亿美元用于购买粮食、饲料及肥料等，19亿美元用于进口机器、车辆和重型设备。

按照马歇尔计划的要求，需要解除一切对德国经济发展的限制，不能再执行罗斯福或摩根索的构想。正如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所言："欧洲的重建包括德国的重建。没有德国生产能力的恢复便没有欧洲经济的恢复。"

尽管德国是战败国，但仍具有经济复兴的坚实基础。在希特勒时代，大量投资的一些光学、化学、轻型机械、汽车、有色金属业已经让德国工业设备全面更新换代。这些设备绝大部分都在战后保存了下来。就德国最为发达的机床工业来说，完好无损保留下来的高达93.5%。再如著名的大众汽车公司91%的机器设备战后都能正常运行。因此，只要重建个人住宅，修复战前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德国工厂就能正常运转，产品就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只要有足够的食物与原材料的供给，德国这个武装到牙齿的工业战车便会大踏步前进。

德国一恢复经济繁荣，必然带动整个西欧经济的复兴。其实，马歇尔计划并未直接推动西欧经济的恢复，而是通过恢复德国经济的活力来拉动整个欧洲经济。同时，马歇尔计划在西欧经济即将陷入全面崩溃之时帮助西欧度过了危险，增强了欧洲人的信心。当计划临近结束时，西欧各国经济都逐渐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联邦德国在1950年，工业生产已超过了战前1936年的水平，农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的2%。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1.4%，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4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1倍。联邦德国经济的繁荣，开启了整个西欧20年经济腾飞的进程。在美国扶植下，羽翼渐丰的联邦德国也逐渐成为美国压制苏联防御性扩张的桥头堡和西欧的安全屏障。

1949年，美国为了遏制苏联，控制西欧，联合西欧国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北约规定，若某成员国受到攻击，其他成员国可以及时作出反应，联合进行反击。这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对于美国来说，通过北约和马歇尔计划的大西洋联盟政策全方位控制了西欧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将西欧变成遏制苏联的辅助力量和工具，同时也可使美国更方便地控制和占领欧洲市场，从而保持美国的经济繁荣。

四、从欧共体到欧盟的艰险历程

（一）德法世仇催生煤钢共同体

德法在欧洲大陆是世仇。自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来，法国多次被德国入侵。“二战”后，法国强烈要求肢解德国，意图将德国的军事威胁彻

底解决掉。德国的经济复兴引起法国人的不安。朝鲜战争开打后,西方国家误以为苏联将策动对西欧的进攻,而苏联情报部门截取的美国军备迅速升级的信息让斯大林也以为美国有进攻东欧国家的计划。双方的误会造成美苏在欧洲的军备竞赛。美国为了应对苏联,开始重启德国的军工业。这让法国人如坐针毡。

法国人极其害怕德国的复兴对法国构成潜在的威胁。法国人的担心不无道理。无论是在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希特勒时代的800万纳粹分子仍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无非摇身一变成了名义上的联邦德国反纳粹分子与民主德国共产党。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企业界与政治界的规划者与管理者都起步于希特勒时代,与当年的纳粹当局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因此,德国虽然战败,但纳粹复仇主义的威胁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法国来说,只有通过实行德法联合政策,将德国纳入到一个欧洲联合体中,才能降低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

自拿破仑战败以来,法国与俄国一向都是同盟国,两国之间在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关系。法国在"二战"后曾尝试与苏联结盟,摆脱美国的束缚,但遭到斯大林的拒绝,法国迫于无奈只能归顺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阵营。对于法国人来说,苏联乃是朋友,而德国才是真正的威胁。与法国一样,苏联对德国的潜在威胁非常关注。毕竟德国与俄国曾发生过多次战争,而美国与俄国并未发生过直接冲突。因此,苏联也十分乐意于美军驻扎在德国,苏联人认为,驻德美军是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兴的可靠保证。但苏联与法国一样,极其反对重新武装德国,并将美国重新武装德国的企图视作对苏联的直接威胁。

美国希望将联邦德国纳入到西欧共同体中来加强西欧遏制苏联的能力。这需要给德国以平等的地位,从战败国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同时又要

防止联邦德国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扩张之路。只有通过欧洲一体化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此外,欧洲联合有助于消除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财政壁垒,促进欧洲的经济恢复并保证政治的稳定。美国日益把欧洲联合当成加强西方阵营遏制苏联的手段。通过欧洲联合可以推进法德和解,并牢牢地控制住联邦德国。美国担心联邦德国如果脱离西方阵营,将在美苏之间寻求走中间路线,从而削弱美国在欧洲对苏联的遏制势力。但对于美国来说,任何一个大国控制欧洲都将损害美国利益,美国支持欧洲联合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即西欧联合必须要服务于美国控制西欧、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

内有法国的推动,外有美国的支持,西欧联合水到渠成。1945 年,法国人莫内在美国《财富》杂志发文提出煤钢共同体计划,他建议把法德两国的煤和钢的全部生产置于一个超国家机构的领导之下,该机构向其他欧洲国家开放加入之门,其所作出的决定具有强制性,加入国必须遵守执行。钢铁是军备生产的基本原料,控制住钢铁就可以限制住德国的军工业与军事重整。这样,煤钢共同体既消除了法国的疑虑,又为德国走出战败国的阴影、恢复政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莫内的设想由法国外长舒曼付诸实践。1951 年 4 月 18 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六国在巴黎签订了《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该条约于 1952 年生效。1957 年 3 月 25 日,六国在罗马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这两个条约统称《罗马条约》,于 1958 年生效。从此,欧洲共同市场诞生了。

(二)法德共同利益又催生了欧洲共同体

这对美国有利有弊。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贸易限制减少,对外关税

统一,在促进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贸易发展的同时,必然降低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尤其是美国。但是,欧洲经济一体化可以提高欧洲生产率与消费水平,从而使欧洲成为美国的一个更大的出口市场。换言之,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不仅能促进西欧内部的贸易,也能促进美欧贸易,只是前者速度要高于后者而已。此外,欧洲经济的繁荣可以降低美国对西欧援助的财政负担。尤其在军事上,美国可以让西欧分担部分经费。欧洲共同市场诞生后,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签署了军备补偿协议,即美国在联邦德国驻军的所有开销都必须由联邦德国政府用于采购美国生产的军事装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苏、欧之间的政治与经济格局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了变化。由于战后落后国家出口的原材料、能源和粮食价格持续下跌,工业制成品价格持续上涨,同时因为欧洲共同市场的建成,西欧工业化国家连续保持了 20 多年的繁荣。西欧各国经济高增长,出口贸易扩大,国际收支由逆差转为顺差,美元和黄金储备增加。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美国经济陷入贸易与财政的双赤字,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1960 年,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下降到 30%。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尤其是其军事力量与核战略力量逐渐赶上美国。

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的矛盾开始逐渐扩大,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便反映了这一点。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的一条国际通航运河,沟通了地中海和红海,能将翻过好望角至南安普敦的近 1.8 万公里航程缩短到 1 万公里。欧洲 2/3 的石油供应都要经过该运河,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运河自开通以来,一直为英法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所控。但在纳塞尔上台后,英国军队全部撤离埃及,不过苏伊士运河仍为英法控制。1956 年 7 月 26 日,纳塞尔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全部财产移

交埃及。英法为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联合以色列向埃及发动军事进攻。但它们的行为遭到了美苏的打压。苏联声称,如英法不停火,苏将对英实施核攻击。美国为把英法势力挤出运河区,命令全球美军进入戒备状态,威胁英法。最终,英、法、以被迫宣布停火并撤出全部军队。

苏伊士运河危机深刻地改变了英法对美的态度与策略。英国人认识到,大英帝国的辉煌如明日黄花已一去不复返,世界执牛耳者乃是美国,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今后只有做美国人的贴心小跟班才是英国的正确选择。法国人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法国必须要站在自己独立的立场上来制定政策,比如独立的核武器政策。今后只有拉拢欧洲国家,推动以法国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才能形成美苏之外的第三股力量,从而维持法国的大国地位。

1963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冷战逐渐走向缓和。这促使联邦德国也改变了完全依附于美国的政策。联邦德国人认为,自己无非是美国遏制苏联的一枚棋子,尽管美国承诺保卫联邦德国不受苏联进犯,但这种承诺不可信,美国只要能维护其本土不受进攻,完全可能牺牲联邦德国。因此,德国有必要和法国达成和解与联合,构建第三方势力来抗衡苏联,德国需要支持法国建设自己独立的核威慑力量。

(三)从欧共体到欧盟

法德之间的共同利益促使法德结成同盟,形成了逐渐脱离美国控制的西欧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力量。1967 年,在法德同盟的推动下,根据 1965 年 4 月 8 日六国签订的《布鲁塞尔条约》,煤钢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合并,组建了欧洲共同体。欧共体由法国与德国主宰,法国掌管其政治政策,德国则控制其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控制的世界新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却摇摇欲坠。当人们对美元充分信任,美元相对短缺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可以维持。当人们对美元产生信任危机,美元太多而黄金储备不足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将难以维持。因此,要维持金汇兑制度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必须要保证美元兑换黄金的价值。1949 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为 246 亿美元,占当时西方国家黄金储备总量的 73.4%。随着美国的衰落,国际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国资金大量外流,美元急剧过剩。以法国领头的很多国家不断用美元从美国的金库中兑换出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外流,到 1960 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 178 亿美元,不足以抵补当时 210.3 亿美元的短期债务。美元危机随之出现。美国政府只好通过种种政治与经济手段,勉强维系住美元价值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但长期维持已力不从心。

现在,美国不仅要继续遏制苏联,还要狙击法德同盟。美国人手中的牌便是英国。欧共体的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发展,而英国经济却每况愈下。1950 年,英国出口产值占世界总量的 25%,到 1970 年下降到 10.8%。随着殖民地的独立与英联邦的瓦解,英国逐渐回归为传统的欧洲国家。如果英国一直被欧共体排斥在外,只能成为欧洲大陆外的孤岛。于是,英国从 1961 年便开始申请加入欧共体。美国极为支持英国的决定。因为美国人知道,英国人对欧洲大陆搞了 400 多年的均势政策,弄得欧陆国家纷争不断,只有让英国人加入欧共体,才能搅了德法的局。

法国总统戴高乐非等闲之辈,他看出来英国是一匹“潜伏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它始终向往辽阔海域,而不是欧洲大陆”。戴高乐认为,英国加入欧共体只能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结果,英国几次申请加入欧共体,都因法国的阻挠而未得逞。直到戴高乐下台后,欧洲格局发生了变化,英国才有了机会。当时联邦德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

济大国。德国人不仅要做经济大国,还要做政治大国。联邦德国不愿意再继续在欧共体内做法国的政治小跟班,而是想通过独立的外交政策提升政治地位。美国为了制约法国,阻止欧共体独立于美国的趋势,极力笼络联邦德国。苏联为了抗衡美国,也向联邦德国抛起外交绣球。结果,欧共体内部法德矛盾开始凸显。法国只有同意英国加入欧共体来制约德国的野心。1973 年,英国和丹麦、爱尔兰一起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

英国 20 世纪 80 年代拍摄的经典政治喜剧《是,大臣》中有这么一段谈英国对欧共体外交政策的台词:

行政部常务秘书汉弗莱:"外交部亲欧洲,实际是为了反欧洲。公务员团结在这一理念下,保证共同市场不能形成,所以我们打进去。"

行政部大臣哈克:"你在说什么?"

行政部常务秘书汉弗莱:"大臣,英国的外交目标500 年来没有变过:创造一个分裂的欧洲。因此,我们联荷兰制西班牙,联德国制法国,联法国和意大利制德国,联法国制德国和意大利。分而治之一贯效果很好,为什么要改变?我们施加过外力,没有成效,现在可以从里面把它搅成一锅粥了。挑德国反法国,挑法国反意大利,挑意大利反荷兰,外交部高兴坏了,光辉岁月又回来了。"

行政部大臣哈克:"但我们都忠于大欧洲理念吧?不然为什么要增加成员国呢?"

行政部常务秘书汉弗莱:"跟联合国一个道理,群龙无首,人多嘴杂,它就越发鸡毛蒜皮。"

行政部大臣哈克:"这也太世故了吧?"

行政部常务秘书汉弗莱:"是的。我们一般称之为外交。"

艺术来源于生活。事实证明戴高乐的判断十分准确。英国加入欧共

体后,往往都扮演着反对派的角色,经常与其他欧共体成员国意见相左。原本欧共体在1973年准备制定欧洲政治合作的协议草案,谋取与美国平等的政治地位。但因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加入后,欧共体国家内部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欧洲被迫于1974年在德国波恩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无论何时,只要欧共体行为对美国利益有影响,美国都能够参与到欧共体的决策过程之中,如果必要,美国可以否决欧共体的决策。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重大挫折,美国仍然牢牢控制住了西欧国家。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有意向欧共体发难。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其所缴纳的摊款额高于从欧共体获得的收益。撒切尔夫人在这一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直到1984年经过千难万险才让问题得到解决。但这却使欧共体陷入了长达5年的喋喋不休的争论之中,给欧共体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甚至影响到欧共体的正常运转。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在里根总统时代,四面出击,咄咄逼人。苏联经济开始陷入困顿,其全球战略处于收缩态势。西欧原本需要仰仗美国的军事保护来预防苏联的军事侵袭,美国则能以随时撤军作为欧共体国家服从其淫威的威胁工具。现在,随着苏联的衰退,西欧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分歧日趋扩大。尤其法德两国,更加希望早日摆脱美国的控制。

在这一格局下,法德希望修改《罗马条约》,促进欧洲的联合。《罗马条约》规定,任何决议都必须要全体一致赞同才能通过,换言之,欧共体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否决权。在欧共体国家数量较少时,这还算不上是一个问题。但随着欧共体的扩大,要通过一个决议就非常困难。即使是在处理极为紧迫的事情时,一些重要的决议也因各国意见不一而被延误。大多数欧共体成员国均同意修改《罗马条约》,而英国再次搅局,坚

决反对欧共体改革。由于英国的反对，直到 1986 年，在法德两国的驱动下，《罗马条约》终于修改为《单一欧洲文件》。从此以后，欧共体决议放弃了一票否决权，只遵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欧洲一体化进程得到突破性发展。

文件修改没多久，整个国际形势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德国统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美苏主导世界的雅尔塔体系宣告崩溃。苏联解体意味着西欧国家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性大大降低，欧共体必须要进一步进行政治与军事上的一体化来掌控欧洲内部事务的主导权。欧共体与美国愈行愈远。德国统一引起欧洲很多国家的恐慌与担忧，他们希望能把德国欧洲化，利用欧洲联合体的合作机制来制约强大的德国。1991 年 12 月 11 日，在法德两国的推动下，欧共体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也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1992 年 2 月 7 日，《马约》由各成员国外长正式签署，并经各成员国政府批准后于 1993 年 11 月 1 日正式生效，欧洲联盟正式成立，又称欧盟。

五、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巅峰：欧元的诞生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后，美元成为实际上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但“二战”后，欧洲普遍缺乏美元，各国之间的贸易严重倒退，有些贸易甚至要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0 年 7 月，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 17 国建立了欧洲支付同盟(EPU)。欧洲支付同盟规定，不需要每一笔贸易都用货币支付，只需要每月月底结算一次。通过这种

方法，大大降低了对流通美元的需求量。

随着欧洲获得的美元越来越多，欧洲货币支付同盟于1958年被《欧洲货币协议》(EMA)替代。协议规定，欧洲各国货币可直接进行自由兑换，但要以美元为各国货币之锚，也就是说，美元是各国货币藉以定值的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前提是美元要能稳定保值。只有美元的价值稳定，才能实现以美元为锚定货币的其他国家的货币币值的稳定。由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在贸易赤字大幅上升的时候仍然持续采用货币宽松政策，持续向国外输出美元，不仅攫取了铸币税收入，还收购了大量西欧企业与资产。

美国的货币政策与其他国家的政策目标存在严重的冲突。美国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饱受失业之苦，其政策偏好于充分就业。对于国际收支逆差的美国来说，只能依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防止失业率的提高，结果美元泛滥成灾。而西欧国家却相反，比如贸易顺差的德国，它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超级恶性通胀，其政策偏好于价格稳定。因此，德国既要维持对美顺差，又要保持马克的币值，只能通过卖出马克、买入美元的手段来进行干预。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严重失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也给国际投机者提供了巨大的套利空间。如果没有国际游资的攻击，布雷顿森林体系仍能延续一段较长的时间。但资本的本性是逐利，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巨额游资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漏洞展开大规模攻击，美国黄金储备迅速流失。1965年，为了应对美元危机，美国政府立法取消了商业银行至少需要25%的黄金证券做法定准备金的规定，该规定制定于1913年。1968年，美国政府规定黄金双轨制，即自由市场黄金价格自由化，美国没有义务在自由市场维持在35美

元兑1盎司黄金的价位，而政府间的黄金兑换继续维持在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各国政府承诺不在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获取差价。原来规定每发行1美元必须有25%的黄金准备的规定也被取消。

在经济衰退时，为了保证美国的充分就业，美国采取低利率的廉价美元政策，美元资本汹涌流出美国，流向欧洲。随着越南战争的进行，美国的金融状况更为恶化。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逆差，达23亿美元。美国陷入贸易与短期资本流动双逆差的困境，而德国与日本却是贸易与短期资本流动双顺差。结果，美元兑换日元、美元兑换马克，均出现了贬值预期。换言之，即马克面临升值压力。市场出现了看多马克、看跌美元的预期，国际游资发动了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大规模攻击。德国不得不采用浮动汇率制，欧洲各国纷纷跟随德国采用浮动汇率制，而美元对黄金贬值，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名存实亡。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短期资本流动的数量与速度都急剧增加，结果汇率波动极为频繁，严重影响到欧共体内部的贸易。由于市场对美元缺乏信心，国际投机者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马克。结果导致马克过度升值，欧共体其他成员国的货币相对马克过度贬值，严重影响共同市场作用的发挥。为了缓解影响，欧共体于1972年建立了货币蛇形浮动机制。该机制规定，欧共体各国货币联合一致对美元浮动的幅度在±2.25%之内，欧共体内部各国货币汇率浮动的幅度被限制在±1.125%以内，并且各国在干预外汇市场时，只使用欧共体成员国货币，而不使用美元，从而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削弱美元在欧共体的作用。该机制成员国创立了欧洲货币合作基金，董事会成员由各国央行行长组成，可以向成员国提供信贷。

实际上，蛇形浮动机制是将西欧各国的货币从与美元挂钩转变为与马克挂钩。但这一机制是一种国家间自由结合的货币制度，随着西欧经济滞胀的到来，各国货币政策之间难以协调，到1978年，参加蛇形机制的国家只剩下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和卢森堡六国，已经宣告失败。

（二）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建立

法国极为反对美元霸权，希望欧洲能够摆脱美元的桎梏，建立欧洲自己的货币体系。德国也支持法国的意见。美元贬值给给德国经济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首先，由于美元贬值引起国际投机热潮，马克便首先受到冲击，影响到德国经济的稳定性。其次，美元贬值使美国产品相对德国产品来说更加便宜，大大损害了德国的出口利益。再次，马克升值又会导致德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进一步下降。因此，德国也希望在欧共体内建立一个各国货币汇率固定的体系，来抵消美国货币政策对欧洲尤其对德国的影响。

1979年，在德法两国的推动下，欧共体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EMS），将成员货币之间的汇率固定，并共同对美元浮动。欧洲货币体系创造了以各国黄金与美元储备为准备金的欧洲货币单位（ECU）。欧洲货币单位是当时欧共体12个成员国货币共同组成的一揽子货币，各成员国货币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大小由各自的经济实力决定。成员国把黄金和美元储备的20%交给欧洲货币合作基金，换回相应数量的欧洲货币单位。

从理论上来说，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制度以欧洲货币单位为中心，让成员国的货币与欧洲货币单位挂钩，然后再通过欧洲货币单位使成员国的货币确定双边固定汇率。成员国货币都与欧洲货币单位定出一个中心

汇率，这个汇率在市场上的上下波动幅度为±2.5%，英镑是±6%。根据规定，成员国之间任何两种货币的汇率波动超出规定范围的话，这两国的中央银行都有义务进行干预。但由于马克是欧洲货币体系中最强的货币，在实际操作中，当某成员国货币与马克的汇率接近上限或下限时，该国中央银行就要进行干预，而德国则无义务进行干预。因此，欧洲货币体系本质上是以德国马克为核心的金融体系，马克在欧共体内部的地位相当于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地位。因此，欧洲货币体系对美国的美元霸权与国际经济主导权构成了潜在威胁。

（三）欧洲货币体系的缺陷

但欧洲货币体系掩盖不了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深层矛盾。法国等实力较弱的国家始终希望能在各国政府间合作框架下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与金融环境。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相对德国经济较弱，法郎相对马克较弱，其经济受到该国货币弱币地位的限制。而德国等富国经济发达，像马克这样的货币地位稳定而坚挺，德国等富国希望能够加强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协调，而不是通过对汇率的干预来帮助其他国家。因此，在欧共体经济平稳发展时，欧洲货币体系尚能维持运转，可一旦经济萧条，欧洲货币体系就难以保全了。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欧洲很多国家普遍陷入低增长、高通胀的经济衰退中。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均发展缓慢。为了降低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刺激不断下降的经济增长率，这些国家希望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德国在1989年统一之后，大大高估了民主德国马克的价值，让民主德国马克与联邦德国马克以1∶1的比价进行兑换。德国货币供给量大幅上升，造成严重的通胀。对于一贯将保持物价

稳定为政策首要目标的德国来说，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必然之事。于是，欧洲货币体系各成员国之间的政策严重失调，给国际游资带来投机的机会，最终导致欧洲货币体系的崩溃。

（四）欧元的诞生

对于德国来说，欧洲货币体系实质上是一个马克区，德国央行已成为事实上的欧洲央行，其他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跟随德国央行的的决定。因此，欧洲货币体系崩溃对德国来说完全是一个噩耗。对于法国来说，在欧洲货币体系下，法国就像德国的经济附庸国，完全听命于德国的经济政策，但欧洲货币体系崩溃会让统一的强大的德国脱离欧洲联合体，对法国造成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威胁。因此，必须要将德国束缚在欧洲联合体中，同时又不能降低法国在联合体中的地位。法国人倡议，创造新货币来代替马克，创建欧洲央行来代替德国央行。

最终，在各国政治家尤其是法德政治家以各自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不断讨价还价、谈判和妥协之后，在 1992 年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同意创建欧洲货币联盟。《马约》规定，1999 年 1 月 1 日起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芬兰、荷兰、卢森堡、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 11 个国家正式使用欧元。欧元以 1:1的比例取代欧洲货币计算单位成为欧洲货币联盟的法定货币，并以一定的汇率与欧元区成员国货币进行兑换。根据规定，欧元现钞于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流通，欧元区的各成员国原货币从 2002 年 3 月 1 日起停止流通。欧元由欧洲中央银行和各欧元区国家的中央银行组成的欧洲中央银行系统负责管理。欧洲中央银行位于德国法兰克福，有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欧元区国家的央行则是欧洲央行在各国的执行机构。

美国艺术科学学院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里·埃森格林在《美元悖论》一文中说得特别明确:“欧元创生的第一动机,就是以欧洲货币取代美元。”欧元的诞生无疑对美元形成强有力的挑战。欧元将取代德法等欧元区成员国货币的国际结算货币与储备货币的职能,成为唯一能与美元相抗衡的国际货币。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还会提高欧盟地位,加强欧盟内部的一体化的进程,有利于摆脱美国对欧洲内部的干涉。就像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讲的:欧洲货币联盟能“有效地抗击美国的霸权”。但是,美国人是讲究策略的,从来都不会束手待毙,欧元这些年来走过的道路极为坎坷,未来之路也将漫长而艰辛。



第二章
美国军事与美元
双重霸权胁迫下的欧元



一、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霸权

（一）牙买加体系的形成

随着美元与黄金的脱钩，美元价值失去了稳定之锚。1976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加勒比海西北部的牙买加达成“牙买加协议”，通过了《IMF 协定第二修正案》，从而形成牙买加体系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牙买加（Jamaica）源自印第安语，意为林水之乡。不无巧合的是，买加协议规定废除黄金条款，取消黄金官价，成员国央行可按市价自由买卖黄金，正式将黄金逐出国际货币的地位，宣告了美元“放水”时代的到来。协议还要求逐渐降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减少各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比例，而以特别提款权来逐渐代替美元作为各国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与外汇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又称纸黄金，其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特别提款权最初发行时每一单位等于 0.888 克黄金，与当时的美元等值。1974 年，国际基金组织正式宣布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钩，改用一揽子货币作为定值标准。

表面上看，牙买加体系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但事实却相反。特别提款权在世界储备资产总额中的比例不仅没有提高，反而

逐年下降,1971 年尚占 4.9%,1980 年下降到 3.3%,1990 年下降到 3.1%,到2002 年下降到无足轻重的 1.05%。与之相反的是,外汇储备在世界储备资产总额中的比例由 80 年代初的下降趋势自 1985 年以来转变为逐渐上升,从 1980 年的 82.6% 下降到 1985 年的 79.4%,又上升到 1990 年的 88.1%,到2002 年上升到 93.7%。其中美元在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在 1990 年降至最低点 50.1% 以后呈回升之势,恢复至 64% 左右的水平。2005 年,国际收支结算中美元的比例占 66.4%,欧元占 24.3%,日元占 3.7%;在国际储备的比例中,美元储备始终稳占 66% 的比例。

因此,尽管马克和日元等强势货币在世界储备资产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美元仍保持国际计价单位、交易媒介、价值储藏手段的特殊地位。牙买加体系实质上无非是美元本位制。

牙买加协议严重削弱了黄金的货币职能。黄金占世界储备资产总额的比例一直都在缓慢下降,由 1949 年的 73.5% 下降到 1975 年的 18.1%。在牙买加体系下,该比例到 1985 年迅速下降到 7.6%,到 1990 年降为 5%,2002 年时仅为区区 1.73%。在黄金丧失货币职能、采用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各国之间的交易若不采用美元计价,交易成本将会大幅上涨。

假设世界经济中有 n 个国家,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那么在交易中需要有 $n(n-1)/2$ 种计算方式才能完全表现出某一国货币与商品的价值,因此也就必须有 $n(n-1)/2$ 个外汇市场。但是,如果选择第 n 种货币作为媒介货币,所有外汇报价都能以第 n 种货币报价,市场数量就能减少到 $(n-1)$ 个。简单地讲,如果市场上有 2 种货币进行交换,2 种货币可以互相作为对方的价值表现,那么用来评估货币价值的计算数量为 1。如果有 3 种货币进行交换,同样的道理可以得到计算数量为 3。如果有 4 种货

币，计算数量为6。如果市场有1000种货币，则有499500种计算方式。如果货币的数量有上万种，计算的数量更是高得骇人。当采用某个固定的货币，比如美元来计价时，有1000种货币的市场只需要有999种价格就可以了。

在黄金丧失货币职能，又没有其他更好的货币可以替代美元时，美元在国际交易中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当成报价、支付和清算工具。因此，美元不仅没有丧失世界货币的职能，反而大为增强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从正面意义来看，美元本位制起到提高国际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但由于黄金的非货币化，美元摆脱了黄金的束缚，美国不再承担美元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其货币政策也不需要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那样考虑本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和债务成本。

从理论上讲，某国经济对另一国出现贸易逆差时，即进口多于出口，某国就产生了经常项目赤字。在这种情况下，贸易逆差的国家要么减少进口，要么提高生产率来增加出口，从而实现贸易均衡甚至是贸易顺差。如果该国不能作出改变，长期持续的大规模国际收支逆差会导致国民收入下降，失业增加，国际储备减少，主权信用降低，进而导致信用危机与经济危机。

（二）牙买加体系强化了美元霸权

然而，美国却是例外。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开始出现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这几十年来，经常项目逆差的规模更是不断扩大。换作其他国家，只能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来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同时以极高的利息率来吸收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巴西等南美国家为此不得不为美元债务支付45%的利息率。为了还债，这些国

家不得不出口更多数量的本国商品来换取还债的美元，外债负担迅速膨胀。而拥有美元霸权的美国却是另一番景象。

贸易盈余国持有的巨额美元储备理论上可以投资到任何地方，但由于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最安全、流动性最强的资本市场，这些美元储备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流回到美国，而这些美元储备不能在美国兑换成为黄金。与此同时，美国极力阻止外国人收购其银行、航空公司、军事和技术公司等具有战略价值或市场价值的各类资产。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只允许欧佩克成员国政府以石油美元购买美国主要公司极少量的股份。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只被允许投资于估价过高的房地产、电影公司或经营困难的公司，而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出卖其关键部门的最高控制权。美国坚持要他国对美国出口商开放市场，让美国资本购买他们的企业，美国却不给他国同等的待遇。

结果，国际收支盈余国只能购买回报率很低的美国财政部发行的政府债券。这些国家的央行被迫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和美国政府的国内预算赤字融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大，各国央行结余的美元就越多，因而不得不再循环回美国购买其财政部债券的钱也就越来越多。

在美元信用膨胀的同时，美国国内储蓄与投资缺口迅速扩大，经常项目逆差也随之扩大。美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得几乎无限的美元信贷。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大量借债，意味着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向美国转移实际资源。在没有国内通胀的情况下，美国几乎可以无休止地从国外借款，弥补其巨额财政赤字。与此同时，美国还能大肆收购其他国家的资产以获取超额利润，而这些国家又会把这些美元以低利率回流给华盛顿和华尔街，并且为美国承担私人投资的损失。华尔街的银行可以像美国

财政部那样，在计算机上创造无中生有的信用。因此，美国通过向银行收税来制造信用，然后再将其贷出，让外国政府买单，即把外国政府绑在美国政府的信用上。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基本上可以视为美元外流，其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对外提供美元，最终引起全球流动性扩张。经常项目下 1 美元国际货币的流出往往带给世界的流动性扩张是 2 美元以上的基础货币增加。除去正常的各国不等的银行乘数造成的货币现金增加之外，由于新增美元大多流入货币与资本市场、石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因此每 1 美元的现金增加导致的流动性扩张大约可以有 3 ~ 5 倍。在杠杆交易中，放大倍数则更大得惊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机构持有大量美元资金，各国外汇储备机构也管理着大量的美元资产。这些资金必然要在全球寻找投机或投资机会，在各国间大规模流动，从而造成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动荡。

随着美元信用的不断膨胀，美元持续贬值，这样既刺激美国出口，又可以减轻美国的债务负担，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债权却相应缩水。1985 年 9 月 22 日，美、英、法、联邦德国和日本在纽约广场旅馆签署协议，强令美元相对于日元和马克贬值，以求平衡美国的贸易赤字，增加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从协议签订到 1987 年初的短短一年半内，美元相对日元贬值 51% 并仍保持下滑趋势。随着美元价值相对于欧元、英镑和日元的下降，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元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美国财政部的美元债券相对于这些国家的货币以百分之几十的下降速度大幅贬值，而这些国家持有的美元债券却只有 4% ~ 5% 的利息回报。

因此，美国可以通过单方面扩张美元信用或者说放水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国际收支状况。这样，美元特殊的地位不仅体现了美国独一无二的霸权，而且美元本身也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撑。美元的通货膨胀和贬值

问题就可能外溢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并输出美元来征收国际铸币税，无偿占有境外美元持有者的资源。为了平衡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美国利用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美国的世界信用，通过发行国债和国库券的形式，鼓励外国资本来购买美国的国家资产，并提高回报利率，力求吸引其他国家贸易中盈余的美元再次投入到美国的国家债券中，以此利用外国美元资本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来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不平衡。要达到这个目的，美联储就必须在低利率与高利率之间不断摇摆，以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让外国投资者感到投资于美国资本市场有利可图，从而使得国际收支盈余国家的美元储备源源不断地流进美国。因此，美国只需要维持较少的外汇储备，就能保证自己在经济政策上超然独立。

二、美元石油体制维护了美国利益

（一）美元傍上了石油

与黄金脱钩后的美元要保证自己的地位稳如磐石，最优策略是与最重要的大宗商品挂钩。国际石油贸易是世界上最大宗的商品交易，石油便是最好的选择。石油与煤炭是现代文明得以存在的基础。尤其在军事上，石油是军队维持作战能力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构筑石油美元体制对确保美元作为交易媒介的垄断地位，稳定美元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和形象，以及维持美国的全球货币霸权至关重要。

“二战”前，美国和苏联是当时石油生产的两大国，一直由英国控制的中东的石油生产量较小。“二战”后，美国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与军事

实力驱逐英国势力，逐渐控制了中东地区。其中最为巧妙的策略就是扶植犹太人在伊斯兰文化地区建立以色列这样的附庸国。早期中东各国均拒绝美国建立军事基地，以色列的建立，中东的门户便被美国打开了。美国将以色列当成自己在中东的经济与军事基地，可以威慑、离间、控制中东各国，最终达到支配中东石油的目的。同时还能让以色列为美国的霸道背黑锅，而美国自己却充当起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调解人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二）石油美元的形成

随着美国对全球石油资源控制的加强，美国石油公司主导了战后市场。从“一战”到 20 世纪 70 年代，标准石油解散后形成的公司中最大的 3 家，即新泽西州埃克森、纽约美孚和加利福尼亚州雪佛龙，与美国海湾、美国德士古、英国石油公司（BP）和壳牌石油组成了石油垄断同盟，人称“七姊妹”。这 7 家公司占有全球石油储量的大部分，控制着各国的经济命脉。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必然成为世界石油贸易尤其是中东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当石油交易与美元挂钩时，美元信用也就牢牢地与全球能源需求挂钩起来。这种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贸易计价和结算的货币体制称之为石油美元机制。

对于美国来说，中东作为世界上石油储量和产量最大的地区，其石油交易必须以美元为流通货币，以确保美元体制带来的巨大利益，这是美国追逐中东石油霸权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其全球霸权的基础。因此，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的重点便是保证美元石油体制的稳定。为了维护和巩固中东石油霸权，美国政府往往通过经济、政治、外交甚至军事等多种手段交替或联合使用，以确保美国霸权意义上的石油安全。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欧洲与日本都力图挣脱美元的枷锁,获得经济独立的地位。甚至有很多国家开始将手中的外汇储备从美元换成德国马克。美国精英开始采用一些巧妙的策略,来保持美元独霸天下地位。美国胡佛研究所保存的档案记载,1973 年 5 月,几十名世界顶级金融和政治人物在瑞典瓦伦堡金融家族的海岛度假胜地萨尔茨约巴登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戴维·洛克菲勒,洛克菲勒盟友——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的罗伯特·安德森,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格林希尔勋爵,华宝银行的埃里克·罗尔爵士,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乔治·波尔,洛克菲勒财团代理人、后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大名鼎鼎的布热津斯基,意大利菲亚特集团的乔万尼·阿涅利,基辛格和德国的奥托·阿梅龙根。

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可能产生的石油价格波动,而是如何管理将要被创造出来的大量石油美元。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顾问沃尔特·利维预计欧佩克组织的中东石油收入的上升将会刚好超过400%。他预言:“*石油进口成本将大幅度提高,石油消费国的贸易平衡将遭遇巨大困境。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空前的外汇盈余积累将导致严重后果……在石油出口国、石油进口国、石油生产国、国际石油公司的所在国以及石油生产和进口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之间,政治、战略和权力关系的全面调整刚刚开始。*”美国金融与石油寡头的目的无非是利用石油的美元结算优势,引发石油危机,大幅提高石油价格,以此让其他国家永久性地依赖美元。

(三)上下其手,利用石油危机强化石油美元

1973 年10月6 日,在美国的策划下,埃及和叙利亚入侵以色列,发动

“赎罪日战争”。1973 年 10 月 16 日，欧佩克组织宣布石油提价 70%，即从每桶 3.01 美元提高到 5.11 美元。除了伊朗表示反对涨价外，其他国家都表示支持这个决定。同一天欧佩克的阿拉伯成员国指出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事实，宣布对美国和荷兰实行石油禁运。次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阿布扎比、卡塔尔和阿尔及利亚宣布削减石油产量。在基辛格的操作下，伊朗国王巴列维改变口气，再次提出涨价要求。1974 年 1 月 1 日，油价再度上涨，幅度超过 100%，欧佩克基准油价上涨到 11.65 美元，石油价格上涨了 4 倍。

当时美国进口的大部分石油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加勒比地区和委内瑞拉，1973 年仅有 22% 的石油来自于中东。而欧洲与日本进口的石油有 80% 都来自于中东地区。油价上涨对除英国外的欧洲与日本的打击甚大。欧洲国家要想脱离美国的控制，只有与中东联手。1974 年，法国政府表示，愿意为科威特提供石化与炼油技术来换取石油。同年，法国与沙特政府达成协议，沙特在未来 20 年供应法国 64 亿桶石油（1 吨石油为 7.33 桶），而法国则提供沙特在石化工业、基础设施和军火上的援助。法国和伊拉克也达成了 50 亿桶石油的易货贸易协定。德国和日本也希望与中东达成双边协议，但却碍于“二战”战败国地位无法像法国那样自由行事。欧洲和日本都希望用本国货币来购买石油，而不需要储备美元来购买石油。这意味着美元将丧失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换言之，美元将丧失霸权地位。

石油输出国中最有发言权的是沙特阿拉伯。沙特的石油生产主要是由投资建立阿美石油公司的美国石油财团所控制。美国与沙特的关系极为特殊。1974 年 6 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创立了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强令欧佩克组织成员国只接受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

结算货币。在美国的操纵下,1975 年,欧佩克国家的部长们一致同意接受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支付货币,其余货币一概不行。从此,美国政府将布雷顿森林黄金交易体系转换成了一种极不稳定的以石油为基础的美元体系。而欧洲与日本不得不储备大量美元用来购买石油,它们陷入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相同的命运,只能任由美国对他们进行肆意的压榨与掠夺。

1975 年,美国财政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政府签订秘密协议,规定通过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借贷业务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此安排之下,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将购买持有期至少为一年的美国财政部新的有价证券,这样沙特由于石油涨价而获得的大量美元储备将被用来弥补美国政府的赤字。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下,来自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戴维·马尔福德担任沙特货币局首席投资顾问,他负责将沙特的石油美元投入到美国的银行。

相应地,美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大量吸纳石油美元存入美国银行、购置美国不动产、购买产权和投资于证券市场,以及大量购进美国财政部债券等。通过这种由美元金融垄断地位形成的机制化霸权体系,构建美国与中东产油国的石油需求与石油供给、石油支出与石油收入、石油美元与石油物资、美元回流与美元流出的相互依赖,将美国经济的石油能源和石油资本需求与欧佩克国家石油资源供给和石油盈余资本在美国的投资回报率捆绑在一起,构成利益依赖关系。

为了强化中东石油输出国对美国的依赖性,美国不择手段地采取了种种措施。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推广节能降耗技术的应用,降低了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性,世界市场上的石油价格随之低迷不振。很多中东产油国不得不在石油经济之外,准备发展多元化的产

业经济。这些国家利用石油美元资本发展本国石油勘探开采,同时向国内外的石油化工产业和石油销售网点等中下游产业链渗透和扩张。此外,还加强钢铁、建筑等基础工业建设,积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中东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多元化政策,必然要进口工业化国家的机器设备、技术和生活必需品。美国抓住时机,积极支持本国公司大举投资中东石油输出国的多元化经济建设,来加深中东产油国对美国公司和投资者的技术和市场依赖程度,实现对中东产油国从原油勘探开发、生产炼化,到成品油销售和市场终端维护的全方位操纵和控制。

由于特殊的宗教原因,中东地区的政治局势一向不太平。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军火生产国和输出国,为了保护国内军火商集团的利益,有意或无意地制造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让中东产油国政府对自身政权的稳定性产生恐慌心理。美国趁机煽风点火,让这些国家的政府大量采购美国生产的军事装备,使这些国家在军火贸易上加大对自己的安全依赖。比如沙特与美国的特殊双边关系即为典例。沙特用石油美元向美国购买军火,让美国驻军保证其安全,美国则以军火与驻军来换取沙特石油的控制权。

有些时候,美国还向中东地区相互对立的政治力量提供武器,激化双方的军备竞赛。军备竞赛常常加剧地区内部资源争夺和领土纠纷等冲突,而内部因石油储藏引起的边界等纠纷又进一步刺激了各国的扩军备战,从而导致恶性循环。结果,中东地区的武装冲突连绵不绝,各国都沦为美国新式武器的试验场,而美国则在其中渔翁得利,加强了石油美元体制的稳定性。

三、美利坚帝国互为犄角的军事霸权与美元霸权

（一）美元霸权助推军事霸权

恩格斯曾经讲过："暴力是陆军和海军，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这两者需要'巨额的金钱'。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造出来的金钱……因此，归根到底，金钱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状况来决定，经济状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美国金融霸权尤其是其霸权核心的美元霸权，与军事霸权互为犄角，相互依赖。

1812 年的英美战争，1846 年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都迫使美国政府发行了大量国债来支持战争上的财政需要。尤其在南北战争时，美国国债由 1857 年的 2870 万美元增加到战后的 27.55 亿美元。有趣的是，恰恰是战争国债吸引了全美投资者的资金，美国才逐渐形成了以纽约为中心的全国性资本市场。

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大幅度降低企业与个人税率。为了取得对苏冷战的胜利，美国政府还大量增加军费开支，期望在军事上对苏保持绝对的优势。这些给美国带来了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美国的财政赤字自 1982 年起开始急剧增加。到 1985 年，美国对外又举借了 1000 亿美元的债务，超过了巴西的外债总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此后，美国每年对外举借 1000 亿～1200 亿美元的债。

美国在全世界 132 个国家部署有 725 个军事基地，美国这一庞大的基地网络构成了一个由军事基地组成的帝国。为了控制世界主要航道，

美国维持了近13支巡游于全球海洋上的航母编队，它们构成了流动的军事基地。美国还大力开发基于卫星技术的高端武器开始使外空军事化。所有这些支出都增加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和国内预算赤字。

2008年，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耗费上已经达到6480亿美元，已经接近越南战争的6860亿美元，而“9·11”以来的反恐战争成本已经达到创纪录的8590亿美元。事实上来自东亚和欧洲的净储蓄投入美国的资本市场，变相起到了为美国战争融资的作用。据统计，截至2005年，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已经达到7800亿美元，而美国的净负债已占美国年GDP的约25%，美国经济需要其他国家每天输入几十亿美元才能维持下去。

要降低美国国债，只有降低军事开支。但对于美国来说，军队与航母才是维持其美元霸权的根本。美国的军费开支每年70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5%以上。此外，美国中情局每年开支达500亿美元，国土安全部每年开支为450亿美元。美国整个军费开支比中国、俄罗斯、英国以及其他北约国家全部国防的开支总和还要大。

在牙买加体系建立之前，一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往往会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这需要通过提高税收来融资。比如英国在其鼎盛时期，每举借一次战争借款都会带来大量为支付借款利息费用而强加的新税。结果，在军事上野心勃勃的国家变成了欠债的、高税收和高成本的经济体。当不能借到外国资金时，好战国家不得不拿出黄金维持其军事支出，或者让其货币相对于黄金贬值。过去的美国亦然。在越南战争期间，当时的金汇兑本位制对美国的海外军事支出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

然而在牙买加体系下，欧洲和亚洲的中央银行正以比美国军事开支大得多的规模补贴美国双赤字。作为不与黄金挂钩的世界货币，美元已建立一种霸权地位，美国事实上在利用美元霸权向其他国家征税，使其他

国家为美国的对外战争、美国的消费甚至美国公司收购他国公司买单。美元霸权使美国能够进口远远超过其出口能力的商品。这为美国搭其他地区的便车创造了条件。例如,当英国出口者将公司或不动产卖出换来美元时,他们将之拿到英国银行换成英镑。英国银行接下来将这些美元购买利率相对很低的美国国债。

(二)军事霸权为美元霸权护航

由于美国的军事霸权,其他国家的央行无法购买美国重要的股票、不动产或其他有形资产。1972 年后,当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提议,用其石油美元开始购买美国公司时,美国官员表示,这被视为一种战争行为。石油输出国组织被告知,它尽可以将石油提高到其想要的价格,只要它用这笔收入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美国将自由贸易奉为处理国际事务的信条,实际运行的却是国家主义与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成立于 1975 年,是一个跨部门运作的政府机构,财政部长任主席,成员包括国务院、商务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国防部、能源部等重要部门的负责人。该委员会主要负责评估和监控外国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判断交易是否威胁国家安全时,主要考虑国防及保持竞争优势、防止外来垄断等因素。美国对通信、航空、航运、水电、土地、不动产等方面的外来投资也有严格限制,以防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被外资控制。结果,出口到美国的石油、德国和日本的汽车,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换到的是可以无限印刷的美元纸币。这些美元除了购买美国国债也就没有任何其他的花费途径。

美国需要大量的世界资本回流美国,才能保持其正常经济生活的流动性,美国不怕经常项目逆差,唯恐资本项目逆差。为了保持资本项下的

顺差，美国会不惜动用战争手段，去打坏别国、别的地区的投资环境把美元驱赶回美国。这样，美元的需求也就会随之上升，美国就扩张更多的美元信用，从全球换回更多的实物财富。

反过来讲，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央行都用美元购买美国财政部国债来压低汇率。这种回流使得美国可以为其海外军事开销以及其国内预算赤字融资。比如在 1991 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使其盟友自愿地承担了大部分战争费用。欧洲和近东的中央银行于是拿出一些美国财政部债券来支持美国的战争。

如果东亚与欧盟在金融上独立行事，这些地区就可以发出类似美国门罗宣言式的军事原则，让亚洲人管理亚洲，让欧洲人管理欧洲。如果这样的话，美国吸收海外资金的能力将大打折扣，也无法维持现存的海外军事基地。像当年苏联一样，美国经济将会被过度的军事开支扼杀。此外，要维持美元霸权的石油基础，美国也必须要维持全球性的军事霸权。全球石油交易量每天 1 亿桶，全年交易量有几百亿桶，全球石油每年的交易量额有好几万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通过美国金融体系采用美元进行结算。只有掌控了石油才能保证美元霸权与美国的金融霸权。军事支出必然加重美国的财政负担，刺激国债的上涨。

一旦丧失了军事上的霸权，美元霸权就会土崩瓦解。美国必须要维持高额的军费开支，来控制东亚与欧盟。欧洲和亚洲以自己的外汇血汗钱构筑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军事基地链来包围自己，来控制与遏制自己。在欧洲，美国以北约机制为主要控制工具。在东亚，正如中国军事科学院彭光谦少将所指出的：美国已经揭开了新冷战的序幕，试图要将中国崛起的神话扼杀在摇篮里。美国以中国为主要作战对象，构建了以西太平洋为主要战场，以空海军为主要作战力量的“空海一体战”

战役作战体系。该战略以日本和澳大利亚为南北两大战略支点的军事同盟体系。北边是日本，南边是澳大利亚，南北对中国进行钳制。美国不仅要把美日、美韩同盟搞在一起，实现美日韩一体化，同时打造包括印度、越南、菲律宾在内的"亚洲小北约"。美国以西太平洋岛链为依托的军事基地体系大体上由三线五群组成，三线即西太平洋第一、二、三岛链，五群就是东北亚基地群、关岛基地群、夏威夷基地群、澳新基地群、阿拉斯加基地群等五个基地群，美国60%的核潜艇、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中的6艘都部署在三线五群。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仅不可能降低国债，还将有针对性地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费开支。长期来看，美军必然会继续采购大量新锐武器装备，用军事的力量来维护美元的地位，再用美元的地位维护军事的力量。换言之，用美元在全世界掠夺资源与财富，用飞机、导弹与航母来保证美元与石油的直接联系，以维护美元霸权与美国金融霸权的地位。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明明是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但美国的通胀却并不严重，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仍然居高不下，其他国家的通胀反而日趋严重，民众的生活水平缓慢下降。比如在欧洲，一些国家发生了金融动荡甚至发生了政治动荡，美国却安然无恙。这其实是美国在拿全世界的资源与财富养活它的人民、军队和航母。

四、北约机制对欧洲的束缚与制约

（一）北约是套在欧盟头上的紧箍

自北约成立以来，美国就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定的信心牢牢

把握着北约的领导权,而欧洲诸国限于其实力和地位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以及自身安全上的迫切需要,不得不接受美国的领导。因此,在美苏冷战时代,北约不仅是美国遏制苏联也是控制欧洲的工具。当时的欧共体与北约之间各有分工,矛盾较小,北约负责欧洲的军事安全,而欧共体则负责欧洲的经济发展。严格来讲,当时的欧洲并不具有独立的军事与外交权,西欧诸国的军事与外交政策基本上从属于美国,即使是戴高乐政府也不例外。

冷战结束,欧盟成立后,局势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和总体实力的不断增强,其摆脱美国政治和军事控制的欲望越来越强。法国和德国在欧盟发挥着主导作用,都希望把欧盟建成为世界强大一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欧盟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想要改变世界事务进程的力量,也就是说要与美国并驾齐驱,其背后的潜台词则是彼可取而代之。欧盟积极发展独立于北约之外的自身防务力量,以期在欧洲防务方面不再完全依赖于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盟跨出经济领域之外,向欧洲政治与军事一体化方向扩展,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其实,早在1904年,地缘政治学鼻祖麦金德所写的《历史的地理枢纽》这一经典文献中就指出:如果欧亚大陆上的德国与俄国结盟,将会严重威胁英国、美国这样的欧亚大陆之外的边缘国家的霸权地位。美国坚决要求将德国纳入北约体系,以防止德国与俄罗斯形成联盟来抗衡美国霸权。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也曾强调指出,“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控制整个欧亚大陆是“取得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基础”,“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并有意谋求地区霸权和全球影响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

也都是欧亚国家。”因此,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三大任务依次是:“防止附庸国家相互勾结并保持它们在安全方面对帝国的依赖性;保持称臣的国家的顺从并维持向它们提供的保护;防止野蛮民族联合起来。”

欧洲一体化进程与法德等国跟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已影响到美国霸权的稳定性,这引起美国的警惕。1992年,美国国防部秘密制定《战略防御计划》。该计划由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后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沃尔福威茨亲自操刀。美国国防部认为,正在崛起的日本和统一后的欧洲将成为美国未来最主要的威胁,必须要防止欧洲成为一个能与美国相抗衡的政治联盟,美国不希望欧盟能与自己平起平坐。

(二)欧洲军团胎死腹中

1992年,法德两国提出要在1995年建立一支以法德混合旅为基础的欧洲军团。这立刻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威胁德国说,德法若组建欧洲军团会使美国民众支持美国对欧洲军事保护承诺产生消极影响。言下之意是欧洲军事必须要在北约机制下服从美国的领导。实际上,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相比有很大差距。维持跨欧洲安全的基础仍是北约机制中的美国军事力量。1993年,法国国防部长声称,欧洲军团将置于北约的领导与指挥之下。欧盟在军事与外交领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与北约保留着相当程度的上下级关系。

到了1998年,英国和法国在圣马洛会议上达成《欧洲防务合作宣言》,倡议欧盟应该建立起独立于北约之外的自主防务力量。美国迅速作出反应。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强调欧盟加强军事能力须谨守的“三不”原则,即:不脱离北约,不重复建立军事结构,不歧视非欧盟之北约成员盟国。简而言之,即欧洲不能脱离美国的控制。

1999年，欧洲理事会决定在2003年之前组建一支独立于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试图在军事上与美国分庭抗礼。随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北约也应该建立起一支快速反应部队。2003年10月，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建立并在土耳其西南部多安贝伊军事基地举行了首次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美国藉此证明自己仍是控制欧洲军事安全的掌控者，北约行动的优先级必须要高于欧盟。在具体军事行动的组织、指挥和策划方面，欧盟和北约必须保持合作和协调。欧盟却并不能够摆脱北约而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安全事务中的一个有效力量。在欧盟与北约进行制度化协调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领导的北约却依旧占据首要地位。

(三)用“新欧洲”来牵制“老欧洲”

面对欧盟的强大及日益明显的独立倾向，美国对欧盟采取其继承自大英帝国的一贯伎俩，即通过对欧盟诸国的挑拨离间，瓦解削弱欧盟的力量。伊拉克战争期间，大多数欧洲人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在法德两国，赞同本国政府拒绝参加对伊战争的民众更达90%。而由于美国政府的有意误导，美国人对战争的支持度则在70%左右。美国吸收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以在北约内部建立一个亲美阵营，通过同是欧盟成员国的这些国家来牵制欧盟的发展。

在欧洲各国中，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当数英国。自“二战”结束以来，英国始终在扮演着美欧之间的桥梁作用，英国的影响力也正源自于此。同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由于不满法德操纵欧盟，在一些问题上宁愿追随美国而与法德作对。一些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主要出于历史上对俄罗斯的恐惧而愿意向美国靠拢。西班牙、波兰、匈牙利、捷克、意大利、丹麦、葡萄牙与英国八国元首秘密签署《八国文件》，明确

表态支持以美国为首所采取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拉姆斯菲尔德抛出新老欧洲说，把反对美国的德法等国称为“老欧洲”，把支持美国的成员国封为代表欧洲未来的“新欧洲”，并将其视为遏制俄罗斯，同时制衡“老欧洲”和加强美国对北约的主导的工具。此外，拉姆斯菲尔德还公开威胁道，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保护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支持美国的政策目标和战略利益，以此胁迫欧盟诸国乖乖听命于美国。

（四）法国重回北约，坚持体制内斗争

欧洲各国都很清楚，美国始终把北约当作控制欧洲并为其全球霸权服务的工具。要争取欧洲的军事与外交独立，欧洲国家只能在北约机制内部尽力争取更大的权力。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联名于2003年5月31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题为《2月15日，欧洲人民的团结日：以核心欧洲为起点，缔结共同外交政策》的文章，倡导建立以法国、德国为轴心的“核心欧洲”，自强自立于美国。2009年2月，法国国防部长莫兰表示，法国希望欧洲能够拥有自主防卫能力，具备独立执行任务以及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能力，北约中的美欧关系就需要进行调整，变得更加平衡。法国自1966年戴高乐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后的第43年，即2009年4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法国重新加入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法国这一举措，不仅是适应外部形势的需要，更是形势所迫，不得不为。法国只有重返军事一体化机构，才能全面参与北约决策，增加法国在北约内部的影响力，加强盟友对法国的信任，推动近年来停滞不前的欧洲防务建设进一步发展。法国希望凭借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增加对欧洲地区的话语权。这是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主要动机，也是欧洲大国对抗美国霸权的唯一方法。

欧洲与北约之间始终都脱离不了美国主导、欧洲从属的关系。但同时在美欧之间的根本矛盾仍然无法缓解。就拿最近的“阿拉伯之春”来说,中东动荡原本是内生性动荡,其起因主要是民众针对国内当权者的反抗。但中东动荡使欧美国家在中东维系多年的既得利益受到很大冲击。欧美国家在这种利益相一致的条件下借机重塑中东秩序,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

比如利比亚,这个国家在卡扎菲的统治下,政治稳定,社会富足,生活水平一直高居非洲榜首。2011 年,以美国与法国为首的北约帮助利比亚反对派推翻卡扎菲的统治。卡扎菲死后,利比亚很可能会成为欧美国家的附庸和挺进非洲的桥头堡。但是,美欧矛盾也将随之显现出来,北非政局必然演变成欧美之间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战略博弈。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的地缘战略中,北非都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节点,而双方在这一区域的根本利益是竞争性的。在美国的地缘政治版图中,北非是塑造欧洲发展空间的战略抓手和限制其进入非洲的重要门户。作为全球领导,美国需要防范来自所有其他大国对其地位的潜在挑战。塑造这些大国的周边发展空间,是很重要的地缘应对手段。为防范俄罗斯依托周边重新崛起,冷战后美国一直通过北约东扩、经济渗透、政治改造等手段经营前苏联国家,挤压俄周边战略空间。

利比亚、突尼斯、埃及等北非国家,正好是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19世纪法国在非洲拥有面积最大的殖民地,直至今日,法国与北非国家仍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南下非洲的必经之路,其在美国对欧地缘战略中的意义不言而喻。欧洲的再崛起也需要一个有利的周边依托。在东面,欧盟成功借助美国之力,在合力应对俄罗斯的过程中顺利实现东扩;在南面,全方位强化同北非邻国的关系。对北非的经营、渗透

与改造，不仅有助于解决移民、反恐等自身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为欧洲实现全面崛起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战略支撑。非洲是一块尚未被完全开发的土地，是21世纪全球工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凭借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和地缘优势，将北非打造为自家后院，并顺势强化对整个非洲的影响力，对于欧洲在多极世界中站稳脚跟和实现经济政治全面复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棋。

从北非格局演化的结果与趋势来看，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局势仍将长期动荡，这显然有利于美国，而欧洲各国尤其法国所获利益甚微。究其根本，主要是因为北约机制仍然像紧箍一样牢牢套在欧洲诸国的头上，美国仍是欧洲的主导者。

五、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对欧元的下马威

（一）科索沃战争一石二鸟

1999年3月，美国主导的北约，在欧洲历史的伤口与火药桶——巴尔干半岛上开始动手，它以南斯拉夫联盟的塞尔维亚族对克罗地亚族的种族清洗为借口，对南联盟塞尔维亚发动连续空袭，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巴尔干地区的地理位置具有极高的经济战略价值。储量仅次于中东的里海石油输入西欧必然要经过巴尔干地区。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地区在巴尔干则尤为重要，是石油管道的必经之地。

在“二战”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占当地人口的39%，其他都是塞尔维亚族。“二战”时，德国、意大利占领南斯拉夫，强迫驱逐塞族人，涌入了大批与德国人合作的阿族穆斯林。到1961年，科索沃中

67%的人为阿族穆斯林,其他24%为塞族。由于阿族穆斯林的出生率远高于塞族,科索沃地区的塞族人口比例越来越低。到1991年,阿族穆斯林人口比例超过90%,科索沃成为阿族穆斯林聚居区。由于高生育率,阿族穆斯林人口结构非常年轻,近50%的阿族穆斯林年龄在20岁以下。阿族青年独立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对塞族人进行种族灭绝式大屠杀的科索沃解放军。

塞族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早先是美国的宠儿,曾严格贯彻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南斯拉夫所要求的各项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美国人说他"看上去是一个经济自由派,有可能拥有更大的权力实行改革"。直到1998年3月,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都认为他是与美国"进行合作的正确人选"。1998年2月23日,美国巴尔干特使罗伯特·格尔巴德把阿族独立武装视为恐怖组织,以表示对米洛舍维奇的支持。但这种支持的前提是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可以在南联盟的任何地方派遣部队。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军事控制南联盟全境。对于这种丧权辱国的要求,米洛舍维奇理所当然地断然拒绝。敢犯强美者,虽远必诛。战争随之而来,结果亦为必然,美国大胜,南联盟一败涂地。

随后,美国花费了3660万美元在科索沃南部兴建美国自越南战争以来所建的最大、最昂贵的基地——邦德斯蒂尔基地,每年开销竟高达1.8亿美元。基地建设承包商是哈利伯顿公司,公司负责人是副总统切尼。由于基地规模巨大,设备先进,美军官兵将其与中国长城调侃成"能从太空看到的两大人造工程"。邦德斯蒂尔基地是美国控制科索沃通道的关键。向东趁俄罗斯衰败之际,将俄罗斯势力排挤出巴尔干地区,扼制俄罗斯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咽喉要道,牢牢地束缚住俄罗斯,使之完全丧失与西方对峙的能力。向南还可以加强对中东和北非产油国的控制,从而确

保北非—中东—里海石油输往欧洲的通道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方面是控制石油美元体制,另一方面是打击欧元。实际上,阿族发动的科索沃独立战争在美国发动战争前已经持续了8年。美国主导的北约在未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违反《联合国宪章》,悍然发动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攻击欧元。美国开打的时间与欧元诞生的时间有关。就在科索沃战争爆发的3个月前,即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欧元代表了欧盟的根本利益,既是欧洲一体化的象征,也是欧盟实行经济与政治统一的动力源泉。当时欧元和美元的汇率是1:1.07,欧元在启动初期的10天内就对美元升值了近19%,与美元的汇率则达到1:1.1806。欧元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结算货币,诞生伊始就对美元霸权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到2000年,欧洲各国间的对外贸易都改由欧元结算,欧元在世界各国央行储备资产中的比例上升到20%。美元地位受到欧元的直接挑战。

美国不允许任何其他霸权力量对自己形成挑战。欧元以及欧盟的整合成功当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美国绝不能容忍还有任何国家的货币与美元平起平坐。在欧元出现之前,美国垄断国际铸币税。欧元诞生后,强大的欧元经济体不仅对美国人的铸币税造成严重打击,而且还动摇了美元霸权的根基。在美国已经酝酿着巨大资产泡沫危机的条件下,欧元的成功并不只是会分享美国的货币霸权,还会因国际资本从美国流向欧洲从而戳破美国的资产泡沫,必然会使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从而陷入长期衰退之中。其结果是,欧洲取代美国而掌握世界霸权,美国则会沦为世界二流国家。

(二)战争鞭子定向驱赶国际资本

面对直接威胁自己的欧元,美国无论如何也要果断采取行动打断欧元的上升势头,阻止欧元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科索沃战争前夕,

美国参众两院的统治精英要求政府采用战争手段阻止国际资本流向欧元区，从而打垮欧元的支撑点，阻止欧洲另立门户。果不其然，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欧元迅速掉头下滑，到2000年10月，1欧元只能兑换0.8225美元，与其最高点相比，欧元汇率已经下降了40%。

显然欧洲经济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之大的衰退，更何况欧元区经济实力十分强大，基础极为雄厚。实际上，美国进行科索沃战争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制造战争恐惧，打坏欧洲的投资环境，引导国际资本流出欧洲。科索沃战争的爆发把欧洲变成了一个不安全的地区，资金不得不加速撤离欧洲，抛售欧元。在美国人看来，如果本国投资环境不好而短期内又无法改变的话，那就用战争把资金净流入的地区如欧洲打得更坏，从而使得美国产生孤岛效应。

科索沃战争爆发之前，有数据显示，大约有来自美国与亚洲投资基金的7000多亿美元的国际游资涌入欧洲，准备置换成欧元资产。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但对于投资者来说，必须要在利润与风险之间追求某种平衡。科索沃战争正准备开打时，欧洲的投资环境开始迅速恶化。国际投资者要利润，更要安全的利润。随着战争的进行，7000多亿国际游资中有约4000多亿迅速逃出欧洲，涌入其他更为安全的避风港。其中有2000多亿流入美国，另有2000多亿逃到香港，欲借香港为跳板进入中国内地。

但众所周知，1999年5月8日，北约战机用导弹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3人死亡、多人受伤和馆舍的毁坏，制造了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重大事件。在这一事件的驱动下，流入香港的2000多亿国际游资迅速流向美国。结果，为规避风险而流入美国的资金越多，美元就越坚挺，美股走势就越高，美国经济则愈加繁荣，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进入美国。美联储为了抑制过热的经济而提高利率，拉大了美元与欧

元之间的利率差，巨量国际套利资本撤离欧洲进入美国，加大了欧元的抛售，美元更加坚挺，从而对美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科索沃战争结束后，欧盟各国背上了难民潮的沉重包袱。60多万科索沃难民出现在欧盟家门口，实施人道主义救援成为欧盟各国难以推辞的责任。科索沃战后的重建也给欧盟带来了不小的负担。欧盟为科索沃的战后重建支付了大部分的费用，这自然扩大了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支出，加重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压力，拖累了欧元区的经济增长，欧元汇率进一步下降，欧元地位受到严重影响。

在科索沃独立问题上，欧洲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让科索沃独立，先借助美国的支持把俄罗斯的影响力挤出，进而整合整个欧洲经济，再把美国的影响力挤出，让欧洲成为世界一极，用欧元压倒美元。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左右着科索沃局势对欧盟而言都是心腹大患。美国的如意算盘是：让科索沃独立，之后利用科索沃引发的俄欧矛盾以及欧洲的内乱来影响欧洲经济整合、压住欧元进而拆掉地中海联盟，稳定美元霸权。但结果却是，欧洲人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战争让投资者失去对欧元的信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风景这边独好，美元仍然是国际投资者的首选。欧元越是削弱，欧洲经济便越困难，美国就越能把北约变成自己推行军事与金融霸权的工具，也越能将欧洲变成美国人控制的欧洲。

六、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为美元而战

（一）“9·11”让欧元喘了一口气

欧元一直等到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与“9·11”事件之后才得以绝

处逢生。2000年4月,美国网络经济泡沫开始破裂,接踵而至的是第二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而安然等美国大公司财务造假丑闻更让全球投资人对美国投资环境的安全性心存疑虑。"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约有三四千亿美元撤离美国,有近400亿美元流向法国和德国。美国经济由此步入衰退,失业率更是居高不下。与此同时,欧洲经济却表现相对良好,股市相对健康,利率也高于美国。

2001年10月,美国打着民主与人权的幌子侵入阿富汗。实际上,美国的目的在于通过战争重塑全球资本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因为美国需要大量的海外资本的回流来支撑整个国家的债务经济。结果,当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后,道琼斯指数就在短期下探后很快回升。随着战况进展顺利,撤离美国的资金又陆续回到美国。

但美国好景不长,随着欧元替代欧元区诸国本国货币进程的展开,欧洲诸国都采用欧元替代美元作为结算货币,欧洲经济也逐渐复苏。2002年下半年开始,国际资本流出美国的趋势愈加明显,每月净流入欧洲的国际资本都在150亿欧元以上,并大量购买欧洲债券。到2002年底,外国对美国资产的净购买额从上年的7528亿美元下降到6303亿美元,为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私人资本对美国的净流入额从7476亿美元下降到5337亿美元,减少了28.6%。

欧元对美元开始坚挺起来,从2000年10月27日欧元兑美元的1:0.823一路涨升至2003年3月12日的1:1.108,美元贬值了35%。美元霸权地位岌岌可危,欧元大有取而代之的强劲势头。美国债务经济掩盖着巨大的资产泡沫,一旦欧元地位稳固,国际资本就会撤离美国流向欧洲。美国资产泡沫会崩溃,金融危机必将随之爆发,美国经济将陷入大萧条。美元霸权也将被欧元所取代,美国霸权的基础将严重动摇。

小布什政府希冀通过大规模削减税收和大量扩充军费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结果美国财政状况却日益恶化,美元贬值的压力不断加大,欧元却升值至自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欧元的升值进一步带动了资金从美国流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美国经济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1991 年的海湾战争结束后,在欧洲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通过决议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禁止石油出口和对药物、粮食进口的制裁给伊拉克民众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大量伊拉克的老弱病残因食品短缺与药品匮乏而死亡。1995 年 4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 986 号决议,允许伊拉克每半年出口价值 20 亿美元的石油,用于进口食品、药品和其他民用物资。这就是所谓的“石油换食品计划”。计划由伊拉克与联合国安理会共同签署和负责实施。1996 年 12 月决议开始实施。安理会还先后于 1998 年和 1999 年,通过将伊拉克每半年出口 20 亿美元的石油限额提高到 52 亿美元和 82 亿美元的决议。但是,石油换食品采用以货易货的形式,将会把西德克萨斯轻质石油(WTI)期货的定价权边缘化,破坏美元与石油之间的挂钩关系,还让美国的金融寡头们失去石油金融套利的空间。换句话说,石油本身成了一种货币,可以交换一切商品,严重威胁了美国金融寡头掌控的石油定价权与美元霸权的地位。

(二)欧元害了萨达姆

为了打击美国并回报欧洲,2000 年 11 月,伊拉克央行宣布以欧元替换美元作为外贸结算货币,并把 100 亿美元外汇改换为欧元。2000 年 12 月 24 日,伊拉克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阿扎维宣布,美国对伊拉克采取敌视的立场,因此伊政府决定自 2002 年初开始正式以欧元替换美元作为外贸结算货

币。为彻底废除美元作为外贸结算货币,伊政府要求伊国有和私营企业遵照规定,使用欧元进行贸易结算。由于从2001年中期开始美元对欧元持续贬值,萨达姆此举使伊拉克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随后,很多欧佩克国家也纷纷响应,准备向欧盟出售石油换回欧元,而不是换回美元。

这触动了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世界石油价格主要由期货价格决定,也就是说,石油期货价格决定了石油现货价格。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主要有美国的WTI和英国的布伦特。美国法律规定WTI石油的现货交割只能在美国本土进行,但它却是全球石油定价的基准。所有其他地区的石油价格都在WTI石油期货价格上进行一个差额增减得到。从战略上讲,美国需要通过WTI机制掌控全球石油定价权来打击竞争对手,维持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与美元霸权的利益。

中东地区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生产和输出石油最多的地区。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给出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战略空间,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只有在一个油气管道和交通运输网络通过地中海和阿拉伯海以及陆地把这个地区直接与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中心连接起来的时候,地缘政治的多元化才能变成一个持久的现实。"

如果所有欧佩克国家的石油交易均采用欧元结算,美国霸权地位将一去不复返。2002年,外国人持有的美国企业债券的46%、股票的11%、总资产的23%都将抽逃,美元将贬值30%以上,美国天文数字的经常项目逆差无法用资本项目顺差来平衡,政府财政将陷入困境,高额军费将无人买单。因此,控制中东石油是美国保证其石油美元体制不受到威胁与挑战而必然采取的政策。

从欧盟的角度出发，当然希望在欧洲使用欧元代替美元进行石油买卖。这样不但可以有效地降低货币风险，而且可以刺激对欧元的需求，促进欧元升值。另外由于石油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在石油贸易中采用欧元能增强全球范围内对欧元的认可。欧佩克和欧盟之间又有很强的贸易关系。欧佩克成员国有超过45%的商品进口是来自欧元区，而欧佩克成员国是欧洲原油和原油产品的主要提供者。

但是，欧盟国家60%以上的能源都需要进口，除英国北海有石油储备之外，欧盟国家的石油进口依赖率高达80%～90%，其中德国最高，达98%。对高度依赖进口石油的欧盟国家来说，油价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严重影响本国的经济增长。欧洲央行为了稳定货币，规定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3%。进口能源在欧洲国家的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如果因国际石油供应短缺而造成国际油价上涨，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必然难以控制，欧洲央行如果为了稳定货币而采取紧缩措施，就会进一步窒息欧洲经济。

据测算，国际油价每桶上升 10 美元，欧元区通胀率第一年上升0.5%，第二年将上升0.7%，同时 GDP 下降0.3%。由于欧元只有共同的货币政策而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而欧元要保持稳定就必须限制成员国财政赤字水平，欧元区国家经济衰退时，维持财政赤字水平就会非常困难。通过调控国际油价的方法，美国可以恶化欧元区国家财政，最终遏止欧元锐不可挡的发展势头。

由于欧元区地理位置毗邻中东，能源严重依赖外部供应，对中东石油依赖度高达40%，伊拉克战争对欧元区的影响程度更为显著。欧盟主要国家都有超过90天的战略储备油。美国必须在伊拉克打一场超过90天的战争才能耗尽欧洲战略储备油，进而动摇欧元和欧洲经济的根基。如果一切顺利，欧洲金融市场上的资金就会由于恐慌大规模向美国流动，

德、法等欧洲主要国家将会掀起金融风暴。这便是法德等老欧洲国家反对美国对伊开战的原因之一。

在欧洲,只有英国才能在战争中获利。时任首相布莱尔的内阁曾与英国石油公司(BP)密商利用伊拉克石油资源。文件显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内阁官员与该国石油企业曾就伊石油举行会议,时任贸易投资部长西蒙斯告诉英国石油公司,作为英国支持美军入侵伊拉克的报酬之一,英国油企应分得伊拉克蕴藏的巨大石油及天然气储备资源。这场秘密会议在 2002 年 11 月举行,即伊战爆发前 5 个月。英石油公司等跨国油企其后购得数百亿桶的伊拉克石油,每年从中赚得数十亿英镑。

2003 年,英美联军绕开联合国,悍然入侵伊拉克,彻底摧毁萨达姆政权。战争再次稳固了美国金融寡头控制的国际石油定价权和美元结算体系,而联合国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与石油的欧元结算只能黯然退场。从一定意义上说,伊拉克战争不仅是对萨达姆政权冲击石油美元体制的报复,也是为了遏制欧元充当国际石油贸易的主要货币,稳固石油美元体制作为全球交易媒介的垄断地位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基础地位。

(三)战争是把双刃剑

战争毕竟是把双刃剑。长期来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全球央行最重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对美元霸权形成了严重的挑战。截至 2010 年底,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份额为 26.3%,约合 5.1 万亿美元,较 2009 年底增加了 0.3%。欧元 2010 年在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份额上升 1%,达到 4 万亿美元。截至 2010 年底,不包括欧元区各国发行的欧元债券,国际债务市场中欧元计价债券份额为 10.5 万亿美元。

军费远超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伊拉克战争还加剧了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与2007年次贷危机有着莫大的关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加上战争抚恤金和医疗费用，伊拉克战争对美国来说经济成本至少3万亿美元，还有其他国家为此提供的另外3万亿美元。而美国预期中的战争收益却始终不见影踪。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消耗美国国力的巨大黑洞。2008年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2008—2009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

总而言之，美国意图借伊拉克战争打击欧元的战略惨遭失败。美军战线拉得过长，时间拖得过久。伊拉克问题使得美国经济流血不止，完全背离了美国开战的初衷。此外，美国在地缘政治上也遭受重大损失。美国原本欲将伊拉克变成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国，以此形成有利于美国控制中东石油和战略要地的态势。美国希望在牢牢控制伊拉克之后，再拿下伊朗、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国，构建中东—里海石油圈的美国势力范围。

但伊拉克战争破坏了本来有利于美国的中东地缘格局，使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处境日趋被动。美国就像一个放大版的英国，其在欧亚大陆的最佳策略乃是均势政策。在中东地区，在很长时间里，美国一直奉行相互制衡的均势政策，尤其是海湾这个世界上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地区，美国的审慎政策是分治，而不是征服。美国把本就脆弱微妙的地区平衡格局完全打破。推翻萨达姆政权等于为伊朗剪除了一大天敌，而伊拉克什叶派崛起，则使中东隐隐出现了一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穆斯林什叶派新月地带，为伊朗崛起提供了潜在盟友和广阔的缓冲地带。这样，在不存在地区力量制衡的情况下，伊朗自动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命运的决定性力量，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环境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愈加恶劣。



第三章
美国对欧金融战
推动欧债危机的爆发



一、美国的间接战略：制造迪拜危机打击欧元

（一）信贷消费是危机之源

在近几十年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发达国家劳动者谈判能力显著降低，资本主义自我改良过程中诞生的中产阶级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不平等现象在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区广泛蔓延，急剧提高了资本家阶级对财富占有的比例。但是，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最终还是要依赖于以工资收入为基础的消费需求。与工人的消费倾向相比，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工人实际工资的停滞和下降，公共支出与福利的削减，限制了有效需求的增长，从而导致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并非真正地达到无人愿意购买的程度，关键在于具有购买意愿的最终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全球工资总收入比全球 GDP 的比重越来越小，而资本回报则越来越高，必然导致严重的全球性生产过剩。

为了消化全球生产过剩，世界消费终端——美国大力推进信贷消费。数据表明，美国消费支出的增长远高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美国消费借贷总额与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 1975 年的 62% 增加到了 2005 年的 127%。2006 年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大约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 200%。由于在生产投资上利润率下降，这使得大量过剩的资本从生产领

域流入金融领域。其次,消费信贷、抵押贷款和各种交易的费用收入是银行利润增长最为迅速的来源。在利润的刺激下,金融机构甚至一些制造业企业都积极从事于各种形式的信贷扩张。再次,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货币主义低利率政策使得廉价信贷易于获得。同时,国际资本的不断流入促进了美国金融资本的扩张,从而刺激了房产与证券市场的价值膨胀,引起了房产与证券市场的庇古效应。

所谓庇古效应是指,物价水平的变化将引起既定数量的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上升或下降。比如,物价水平下降能造成金融资产实际价值的增加,从而产生消费刺激效应。反过来,如果人们持有的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增加,也将导致财富增加,人们更加富裕,就会增加消费支出,因而将进一步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和增加就业。庇古效应刺激了信贷消费的大幅增加,形成短期的经济繁荣。经济繁荣本身又进一步刺激了市场预期对未来的高估,形成不可持续的正反馈机制。

在这个信贷经济中,金融衍生品大为扩张。金融衍生品是那些规定基于某特定资产估计价值基础上的交换规则的合同。正式意义上,这些做法是为了抵制风险。但只是一纸文件的金融衍生品可以被无限复制并发放。因此,这些金融衍生品本质上是一种越过生产靠将来收入赢利的投机行为,不仅不能抵制风险,还会将风险像病毒一样不断传播到经济活动的每个角落。

无论现代金融创新与金融体制有多么复杂,我们都能以凯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来分析现代债务经济。在明斯基看来,债务能否清偿取决于投资,投资的决定因素是利润。明斯基将融资行为分为3类:套利融资、投机融资、庞氏融资。套利融资指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所取得现金流入即已超过预计的现金流出。经济主体的负债结

构中股权融资比重越大，越可能是套利融资。投机融资指行为主体取得的现金流超过因日常支付及偿付应付利息而发生的预计现金流出，然而尚不足以支付到期应付债务的本金。庞氏融资指企业取得的正常现金流入尚不足支付日常性现金支付及债务利息，经济主体需要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或出售资产，这降低了资产净值，提高了债权人的借贷风险。

随着经济繁荣的延续，企业因经营而获得的现金流入持续增长，市场预期较为乐观，市场融资条件放宽，借款容易，利率较低。此时，那些高流动性资产价格就会下跌，企业纷纷将其代之以低流动性、高盈利性的资产，同时，他们也倾向于以借入流动性取代资产流动性，相应地提高了财务杠杆率。这样，原本套利的企业不免带上些许投机性；原来就惯于投机的企业及银行更是趁机扩大经营规模，将支付需要完全寄托在债务滚动之上。此时，人们普遍相信，未来盈利状况会进一步好转，风险不大。然而，一旦经济走上停滞或下降轨道，利润增长减速甚至负增长，则原来高速增长时期产生的快感将立即消失。靠借入流动性维持经营的做法难以为继，债务滚动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此时，投机者因现金流变化而成为庞氏企业，原来的庞氏企业则到了必须靠变卖资产支付债务的地步。由于在经济繁荣期间企业的资产组合中高流动性资产减少，一旦对流动性的主观需求转高，原先所持有的低流动性资产便急剧跌价。人们对高债务比率的企业产生普遍的怀疑，即便不是庞氏融资者的那些公司也遭到怀疑，迫使他们加入借新债还旧债的行列。于是，不信任感迅速漫延，对危机的恐惧笼罩了全社会，资产价格崩溃。虚拟资本的抛售发生，欠得越多就变卖得越多，卖得越多越贬值，最终是债务越还越多，金融危机就此爆发。金融危机不但使已开工的投资项目失去金融支撑，还因资本及金融资产的价格下跌，使新的投资失去内在驱动，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二)欧元动了美元的奶酪

从2003年开始的美国房产泡沫形成,到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都遵循了这一过程。到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后,美元地位一落千丈。尽管美国威逼打压,但欧元问世以来,国际储备货币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全球欧元储备规模持续扩张。欧元问世的第一年即1999年,全球欧元储备总规模为2469.50亿美元,2007年末达到10822.76亿美元,2009年为12499.54亿美元,全球欧元储备增长了4.96倍。而1999到2009年,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份额由71.01%下降到62.14%。英镑、日元等其他货币所占份额基本没有变化,而欧元的份额由17.90%上升到27.37%,提高了9.47个百分点。美元失去的份额全部流入了欧元。尤其在2008年4月,欧元兑美元的汇率达到1.58:1,欧元相比2003年累计升值58%。欧元屡创佳绩,美元持续疲软,各国央行纷纷抛售美元,欧元对美元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

人们对美元的信心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甚至有很多人预言欧元将会取代美元,登上世界货币的宝座。如果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中国都抛弃美元,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将土崩瓦解,美国将失去霸权并变成像拉丁美洲一样在外债中挣扎的地区性强国,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精英呼风唤雨、纵横江湖的风光将永久性丧失。

仅靠美联储降低利率、扩大流动性根本无法解决这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贫富差距过大,普通消费者无力还款。美国的政治与经济结构无法在短期内发生变化,因此,美国唯一的策略只有将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与地区。东方的中国在几十年中积累了巨额财富,是美国转嫁危机的首选,但中国具有独立的军事与外交政策,不会轻易屈服于美国人的淫威。

围棋谚语有云，东盘不亮西盘亮。尽管欧洲有大量金融机构参与到金融衍生品交易中，与美国次贷市场有着紧密的联系，但相对而言，欧洲受次贷危机的打击要远轻于美国。欧盟一直致力于将中东石油经济整合进欧盟经济中，并以欧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毕竟欧盟与中东的贸易规模比美国的大得多。2005 年 7 月，沙特阿拉伯货币政策署副署长公开宣称，今后将建立由 6 个石油产出国共同组建的阿拉伯第纳尔，该货币将与欧元挂钩。2006 年，伊朗成立石油交易所，以欧元作为该交易所定价和交易货币单位。2009 年 9 月，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宣布，伊朗将使用欧元取代美元成为外汇储备货币。伊朗中央银行调整了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大幅减少了美元资产。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欧洲国家虽然在经济上独立于美国，但在政治、军事与外交上受制于北约机制，从而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一个可行的选择。为了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只有牺牲与自己同文同种的亲密伙伴欧洲。但欧元区的德法等核心国实力强大，经济强劲，美国若直接攻击这些国家，也会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于是，美国人采用了间接路线战略。所谓间接路线就是，隐蔽己方战略企图，并不直接与敌方接触来寻求决战，而是要尽量削弱敌人的抵抗能力，破坏其稳定性，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从而以最小的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损失使对方屈服。在作战中避免与敌人进行直接的硬拼，而是采取各种巧妙的方法，力求出其不意地打击和震撼敌人，使之惊慌、动摇，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其结果，敌人不是自动崩溃，就是在最后决战中轻易被击溃。

（三）迪拜危机——美国杀鸡给猴看

美国的突破口是中东阿联酋的迪拜。阿联酋由 7 个酋长国组成，其

中第二大酋长国是迪拜酋长国。迪拜世界是迪拜政府的一家旗舰公司，它借了大量的债务在国内外开展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房地产项目。当信贷市场开始冻结时，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迪拜就陷入了流动性危机。迪拜近来已有迹象显示财政不稳。迪拜的房价，即便是非常好的地段也下跌了一半。2009 年 11 月 25 日，迪拜财政部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其金融顾问是罗斯柴尔德公司）及旗下的房地产分支棕榈岛集团将推迟偿付 590 亿美元的债务最少 6 个月，以便进行债务重组。棕榈岛集团的 35 亿美元债务也延期偿付。

迪拜地处沙漠，仅有的石油资源只占该地经济的 5%。实际上，迪拜以金融和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石油美元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涌入，在近些年支撑着迪拜房价的迅猛上涨。迪拜世界也是一家靠债务高杠杆运营的企业，虽然其各类资产超过 900 亿美元，但其中很多都为流动性很差的不动产，而其欠债规模就达到了 590 亿美元。因此，债务经济与房地产泡沫是导致迪拜危机的根本原因。

迪拜危机重创的是欧洲金融机构。迪拜债务超过一半的债权由欧洲银行持有，欧洲银行在迪拜的风险敞口可能高达 400 亿美元。与迪拜世界相关的风险敞口约 130 亿欧元，相当于 196 亿美元，可能对这些银行产生总计约 50 亿欧元的冲击。企业贷款需要向银行缴纳保证金，除去保证金的实际贷款额度为敞口额度，而风险敞口则是指因债务人违约行为导致的可能承受风险的信贷余额。在欧洲大型银行中，经常充当迪拜债券和贷款交易账簿管理银行或参与交易的银行包括英国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巴黎银行、法国法巴银行、法国 Natixis 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劳埃德银行集团、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等。

因此,迪拜债务危机的影响首先反映在欧洲市场,投资者的担忧情绪将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市场大幅推低。穆迪投资和标准普尔都大幅下调了众多迪拜政府相关实体的债务评级。11月26日当天,欧洲股市遭遇重挫,各国跌幅普遍超过3%以上。英国金融时报100指数下跌3.2%,德国和法国市场则分别下跌3.3%和3.4%。美国市场因感恩节休市。金融类股成为重灾区,行业分类指数下跌5.3%。

事实上,迪拜危机的爆发时点恰逢美元指数跌破重要心理关口。美元指数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它通过计算美元和欧元(权重占57.6%)、日元(13.6%)、英镑(11.9%)、加拿大元(9.1%)、瑞典克朗(4.2%)和瑞士法郎(3.6%)等六种货币的综合变化率,来衡量美元的强弱程度。

11月25日当天,由于美联储公布的会议纪要暗示利率将长时间维持低位,加强了市场对美元走软和通胀上升的预期,且其他各国官方和央行正纷纷购买黄金以替代美元外汇储备,导致美元指数跌破75的重要心理关口,欧元兑美元更是创出1.5144的15个月新高,大宗商品价格节节高升、国际金价也连续突破1170美元、1180美元乃至1190美元大关。危机爆发后,欧洲和亚洲金融市场引发恐慌性抛售,避险情绪再度膨胀,美元和美国国债成为资金避险的场所,美元指数迅速回升,其他货币和大宗商品价格却直线下跌。因此,迪拜危机拯救了危在旦夕的美元信心。

11月26日恰恰是美国独有的感恩节休市,于是美股顺势逃过一劫,至27日补跌,跌幅也仅为1.48%。和汇丰、苏格兰皇家银行等欧洲银行连续数日大幅重挫10%以上不同,美国花旗银行27日低开后强势上攻3%,最后仅仅下跌2.6%。

迪拜宣布债务拖欠的时间十分蹊跷。其实,早在2008年,迪拜正在

建设世界最高楼的埃玛尔地产股价就已下跌了80%，2009年初更是有大批金融机构撤离。2009年10月17日，穆迪投资公司就已发出警告：迪拜负债增长迅猛，严重超出安全边界。因此，迪拜债务危机显然不是2009年新近发生的危机，而是随着金融危机后资金链收紧的陈年旧债，信用评级机构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时间来调低主权债级别从而影响到市场。华尔街和美国政府正是此次迪拜危机的制造者与获益者。在迪拜危机之后，很快就发生了欧洲债务危机。

此外，美国制造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切断伊朗与欧洲的联系。2006年9月，美国宣布对伊朗执行全面的金融制裁，严禁本国金融机构与伊朗之间有任何业务往来，同时向欧洲施压要求欧洲金融机构与美国保持一致。迪拜是阿联酋7个酋长国中唯一一个与伊朗一样由什叶派穆斯林统治的酋长国，它与伊朗之间因信仰相同而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在迪拜投资的伊朗资金高达3000亿美元。2007年，阿联酋与伊朗之间的双边贸易额高达150亿美元，几乎不生产什么产品的迪拜竟然成了伊朗最大的进口国之一。这是因为在美国的压力下，伊朗与欧洲之间的金融联系与贸易往来均以迪拜为纽带，比如大量伊朗商人在迪拜注册公司，再以迪拜公司的名义进口德国的机器设备，先运到迪拜，再转运到伊朗。这样便可以避开美国的经济封锁。因此，迪拜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欧洲金融机构，掀起欧债危机之狂澜，还间接打击了伊朗。

二、高盛埋下的希腊债务危机地雷适时引爆了欧债危机

（一）高盛做局

迪拜债务危机很快就影响到欧元区最为薄弱的一环，即希腊。希腊

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根据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7年生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从1994年起,欧盟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即赤字率)不能超过3%,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即债务率)不能超过60%。

《稳定公约》在进一步明确《马约》规定的财政政策原则基础上,确定了欧盟财政政策协调的规则、过度财政赤字的惩罚程序,以及建立预警机制监督各国财政运行状况,保证各成员国在1997—2004年实现财政基本平衡或者略有盈余。《稳定公约》被认为是欧盟经济稳定的根本保证,也是欧元稳定的基石。按照《稳定公约》规定,成员国必须确定实现中期财政预算目标的时间表,努力在2004年实现预算基本平衡或略有盈余;欧盟对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进行协调和监督,如果判定某一成员国赤字率可能或已经超过3%,就向该国提出警告并要求其进行纠正;如果成员国仍不执行,欧盟就会启动过度赤字惩罚程序。成员国赤字率连续三年超过3%,最多可处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0.5%的罚款。

但是,希腊经济主要靠旅游服务业支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综合实力与竞争力较弱。希腊产业结构以服务业所占比率最高,约占60%,工业次之,约占25%~27%,农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左右。该国长期贸易逆差,资金外流,举债度日。2000年年初,希腊是欧洲通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公共债务比欧元区规定的多出2倍。以该国的经济状况与财政条件,希腊根本不能加入欧元区。欧盟显然放宽了希腊加入欧元区的条件。欧元区国家感受到美国华尔街的巨大威胁,希望能够抱团取暖,于是对希腊这样不符合要求的国家也网开一面,但这却给美国对欧洲的渗透与瓦解提供了可乘之机。

希腊求助美国的高盛银行利用欧盟财政规定上的漏洞,对政府财政

状况进行了粉饰来掩盖其虚弱的财政状况。高盛为希腊设计了一套货币互换交易，帮助希腊顺利加入欧元区。货币互换又称货币掉期，是指两笔金额相同、期限相同、计算利率方法相同，但货币不同的债务资金之间的调换，同时也进行不同利息额的货币调换。简而言之，货币互换就是不同货币债务间的调换。货币互换双方互换的是货币，它们之间各自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改变。一般，初次互换的汇率以协定的即期汇率计算。

高盛的具体做法是：希腊发行一笔100亿美元的10～15年的国债，分批分期上市。这笔国债由高盛负责将希腊提供的美元兑换成欧元，并规定一个汇率，使高盛得以向希腊贷出一大笔现金，而不会在希腊的公共负债率中显示出来。假如1欧元以市场汇率计算等于1.35美元的话，希腊发行100亿美元可获74亿欧元。然而高盛用了一个更为优惠的汇率，使希腊获得84亿欧元。实际上，这相当于高盛借给希腊10亿欧元，但这笔钱却不会出现在希腊当时的公共负债率的统计数据里，因为它要10～15年以后才会归还。仅在2000年12月和2001年6月，高盛与希腊所做的交叉货币互换协议就能让希腊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减少23.67亿欧元，从而使希腊在2001年的债务率从105.3%降低到103.7%，财政赤字率从6.64%降低到4.5%。

此外，高盛还为希腊设计了多种敛财的金融工具却不会使负债率上升的方法。如将国家彩票业和航空税等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来换取现金。这种抵押换现方式在国民经济统计中不算成负债而算成金融资产。这便是所谓的银行债权证券化。高盛提供的这些服务和借贷共拿到了高达3亿欧元的佣金。而希腊则使国家预算赤字从账面上看仅为GDP的1.5%，其实当时真正的预算赤字占到其GDP的5.2%。

数年之后的2009年10月4日，希腊新一届政府突然宣布2009年政

府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预计为 12.7%，远高于前任政府宣布的 6.7%，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例为 113%。这一数字大大突破了《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 3% 和 60% 的上限。其实希腊经济一直以来都是依靠“借新债换旧债”维持，从未达到过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约束要求，但无论是欧盟还是国际评级机构都未对希腊的主权债务等级作出反应。直到 2009 年 12 月，希腊政府公布年度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为 124% 时，全球三大评级机构才选择恰当的时间开始下调希腊主权债务评级，从而拉开了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序幕。

（二）希腊中枪

希腊早在金融危机之前的 2006 年，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已经达到极其危险的 97.8%。显然，高盛公司埋下的是一种木马程序，这一程序需要在有利于美国最为有效的打击欧元之时才开始启动。2009 年 12 月 8 日，惠誉将希腊信贷评级由 A - 下调至 BBB +，前景展望为负面。12 月 16 日晚，标准普尔宣布，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贷评级下调一档，从 A - 降为 BBB +。标普同时警告说，如果希腊政府无法在短期内改善财政状况，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12 月 22 日，穆迪将希腊主权评级从 A1 下调到 A2，评级展望为负面。

随着主权信用评级被降低，希腊利用国际市场进行融资的成本大幅攀升。政府债券一般都被视为安全系数最高的投资之一，因此利率不高，并广泛地被一些国家的主权投资基金、养老金和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大量持有。但希腊的国债即政府债券的利率也开始显著上升。2010 年初发行的国债利率高达 6.25%，2010 年 3 月发行的国债利率上涨到 8%，是德国国债利率的 2 倍多。这使希腊债务再融

资成本大大提高，从而给本来就很脆弱的财政资金造成更大的偿债压力。国债利率作为债券市场利率的基准，如果大幅飙升，银行和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会相应上升，从而给实体经济造成强烈的紧缩效应，反过来侵蚀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来源，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为了借债，希腊政府不得不实施紧缩政策则意味着国内工作机会的减少，税收的增加让经济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但希腊又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保证偿还巨额外债，从而陷入两难境地。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开始全面沽空欧元，首当其冲是对冲基金轮番做空欧元，其次是投资银行的双重角色，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遮掩者，摇身一变成了沽空欧元的助推者。高盛、美银、美林等大型投行推出"沽空欧元型"结构型金融衍生工具。欧元汇率大幅下跌，仅从 2009 年 12 月 1 日到 2010 年 2 月 5 日，欧元兑美元便已贬值 9.38%。

欧洲债务危机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良机。自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2010 年 3 月流入美国的中长期债券及股票的总资金数额达到 1405 亿美元。据统计，欧元区债务危机会给美国带来 2% 的经济增长率。

2010 年 2 月 25 日，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与短期主权信用评级分别维持在 BBB 和 A－2 不变，并仍将其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同时警告称，如果希腊的财政状况不能在一个月内好转，近期内可能进一步下调其评级 1 或 2 档，这可能使希腊长期评级处于垃圾级边缘。4 月 23 日，希腊政府被迫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欧元区即将启动历史上首次救援行动。不到几天后的 2010 年 4 月 27 日，标准普尔再次下调希腊评级至正常情况下根本无法借贷的垃圾级，理由是市场担忧希腊缺乏解决其高债务负担所需改革的能力。就在这一天，欧元兑其他主要货币一泻千里，而美元指数却大涨 1%。

截至2010年2月，希腊债务已达到2940亿欧元，其中外债占到债务总额的70%，约为2079亿欧元。希腊人口为1100多万，人均负债高达2.67万欧元。希腊债权国主要是欧洲国家，包括法国的789亿美元，瑞士的786亿美元，德国的432亿美元，英国的124亿美元，美国的164亿美元。到2010年底，希腊仅有区区2000亿欧元的GDP，但外债却飙升至4000亿欧元，人均外债迅速达到3.8073万欧元，其中外债占GDP的252%，政府债务占GDP的166%。到2011年7月，仅希腊政府债务就接近GDP的150%，成为欧盟国债与GDP之比最高的国家。由于希腊财政状况的严重恶化，全球权威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该国主权信用评级由B1连降3档至Caa1，评级前景为负面。这不仅使希腊的借贷成本变得更高，还会大大增加希腊今后借贷的难度。

2010年5月，希腊获得了来自欧盟、欧洲央行与IMF的1100亿欧元贷款，但这笔贷款的条件颇为苛刻：贷款利率高达5%、贷款期限仅为3年，且贷款在3年期间内分13次拨付，每次拨付前欧盟、欧洲央行与IMF均要检查希腊是否按照事先承诺实行了财政紧缩措施。2011年6月29日，希腊国会以155票对138票通过了总额28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2011年6月30日，希腊国会以155票对136票通过了财政紧缩实施细则与国有资产私有化方案。

财政紧缩必然会恶化希腊的经济状况。因此，这笔贷款不仅难以改善而且还将会恶化希腊的偿债能力。希腊的债务负担必定会变得越来越沉重。此外，为获得这笔贷款，希腊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削减财政赤字的方案。然而如果在本国竞争力没有得到改善的前提条件下，无论是通过增税还是削减支出来降低财政赤字，都会造成经济增长率下滑，从而进一步降低偿债能力与政府信用。实际情况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2011

年第1季度,希腊GDP同比增速仅为-4.8%。

然而,早已埋下希腊债务危机木马程序的美国高盛却赚得盘满钵溢。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直言不讳地指出,对希腊的攻击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出于政治和金融的目的对欧元区成员国的攻击,而希腊被视为这个环节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希腊被当做攻击目标,是国际市场上投机性力量对欧元的攻击。

(三)殃及欧元

高盛公司在为希腊遮掩财政赤字的同时,还购买了德国20年期的10亿欧元信用违约互换(CDS)保险。信用违约互换,也称信用违约掉期。信用违约互换是将参照资产的信用风险从信用保障买方转移给信用卖方的交易。信用保障的买方(即美国高盛)向愿意承担风险保护的保障卖方(即德国金融机构)在合同期限内支付一笔固定的费用;信用保障卖方在接受费用的同时,则承诺在合同期限内,当对应信用违约时,向信用保障的买方赔付违约的损失。这样,一旦希腊债务出现支付问题时,高盛便能由承保方即德国金融机构补足亏空。这让高盛成功规避了希腊债务违约所带来的风险。

由于德国是欧元区最大的经济实体,这必然将德国拴在希腊的债务链条上。一旦希腊政府出现支付危机导致高盛的投资无法收回,那么德国银行就要支付巨额的保费损失。而美国的高盛不仅能大发其利,还能将损失转嫁给欧元区领导国——德国的金融机构,从而打击欧元。

(四)里应外合

吊诡的是,制造欧元危机者却执掌着欧元区国家的财经大权。现任

希腊总理帕帕季莫斯在1994—2002年担任希腊央行行长期间,负责与高盛的货币互换交易。当年正是帕帕季莫斯与高盛密切合作,为希腊做假账、从而使希腊成为今天欧元危机中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而希腊总理帕帕季莫斯任命的主管希腊债务事务的官员佩德罗·克利斯多杜洛斯,曾经是高盛的交易员。现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在2002—2005年间是高盛欧洲分部副总裁,分管高盛欧洲的政府项目。德拉吉在高盛任职期间,正是高盛协助希腊掩盖债务加入欧元区,从而为欧元埋下定时炸弹的最关键时期。显而易见,高盛已经在欧洲安插了大量眼线来监视甚至控制欧元,而高盛代表的利益则是美国金融垄断寡头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的利益在大多情况下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几乎可以视为一体。

三、美国特色的官商勾结:欧债危机背后的美国政商联合体

(一)为什么这种官商勾结不算腐败

马克思曾说过,最早的国债并不是用来维持公共权力的,而为了发财。“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学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通过制造希腊债务危机,美国的那些金融机构大发横财。

英国当代思想家、牛津大学特里·伊格尔顿教授认为:“今天真正的实力隐藏于银行、集团和金融机构中,他们的掌舵人从来不用任何人推

选，他们的决策却可以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总的来说，政治力量是这些大人物的忠实奴仆，政府也许会指责他们的运行方式违反了社会秩序，可一旦政府干扰了他们的经营，那就是自找麻烦。”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作为政府高官与企业高官的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可以双向转换角色。早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美国政府便已完全由以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杜邦财团、梅隆财团和福特财团为代表的金融与工业寡头控制。除了劳工部长马丁·金德尔出身铅管匠以外，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内阁成员如下：

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成员，美国钞票公司和加拿大镍公司董事会董事，美国农业化学公司和巴勃可克·威尔可科斯公司董事，纽约和第五街银行董事等等。

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是姆·阿—汉娜公司董事会董事兼总经理，汉纳铁矿公司总经理，匹斯堡固本煤炭公司、国民钢铁公司、雷容工业公司、道格拉斯矿业公司、塞斯克汉纳煤业和汉纳矿业公司以及来东投资公司的董事会的董事长。同时，他还是下列公司的董事：汉纳炼铁公司，大湖钢铁公司，唐纳—汉纳煤焦公司，密执安钢铁公司，威尔顿钢铁公司，中西钢铁公司，菲尔普斯—道奇公司，克利夫兰花旗银行，加拿大糖业有限公司，以及另外 18 家公司。

国防部长查理斯·欧文·威尔逊是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这家公司在朝鲜战争时期获得 54.9 亿美元的政府订货，远远高于其他任何一家公司。这位兄台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有过一句名言：“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

司法部长赫伯特·布朗乃是劳德律师事务所成员，艾克塞斯保险公司董事，国民零售商互助保险公司董事。

陆军部长罗伯特·勒·斯蒂文斯是斯蒂文斯纺织公司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并任纽约电话公司、汉明威—巴特列特制造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通用食品公司、亚历山大史密斯父子公司、杰克逊公司的董事。

空军部长哈罗德·埃·泰尔波特是哈·埃·泰尔波特公司成员，泰尔波特公司董事兼经理，标准只管公司董事，奥拓里德电器公司、密德公司财政委员会主席兼董事，国民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麦迪逊广场花园公司、克莱斯勒公司的董事。

商务部长：新克莱尔·威克斯是美国企业协会主席，李德—巴登公司，卡尔—法斯特那联合公司董事长，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吉利保险刀公司、普尔曼卧车公司、美国夹板公司、全国制造商协会的董事。

预算局局长约瑟夫·道奇是底特律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复兴银公司顾问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委员，克莱斯勒公司、标准意外事故保险公司、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

驻英大使文思罗普·吴·阿尔德里治是大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威斯汀豪斯电器公司、内地造纸公司、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联邦储备银行、纽约中央公司的董事。

海军部长罗伯特·安德逊是大石油商。内政部长道格拉斯·麦克是通用汽车公司俄勒冈州代理商。农业部长艾斯拉·塔夫特·本生是谷米商和碾磨业的代表。邮政部长阿瑟·萨末菲尔德是通用汽车公司密执安州代理商。

到了小布什总统时代，美国的政治结构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担任过查尔斯·施瓦伯证券公司的董事、JP摩根财团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国务卿鲍威尔曾担任过两个大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一是海湾风暴航空公司，专为好莱坞那些大明星和富商

巨贾制造私人飞机。鲍威尔效过力的另一家是美国在线,而其子米歇尔恰好为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更是在企业界—政界进进出出。他上次卸任后便进入了企业界,曾担任过医药、电讯业等多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成员,其中包括拥有《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报纸的论坛集团、全球最大的电器设备公司 ABB 等。白宫负责与商界协调的官员伯拉劳特曾任过烟草商菲利浦·莫里斯公司的公关经理。专门负责给布什就职典礼捐款事务的卡拉莫尔是烟草商菲利浦·莫里斯公司公关部副总裁。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还是 D. E. Shaw 对冲基金高级主管,同年兼任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美林证券、高盛集团的顾问与培训讲师。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是谢夫隆石油公司董事。商务部长埃文斯是布朗石油与天然气公司总裁。国土安全部部长李奇主持李奇全球公司,也担任朗讯集团顾问。中情局局长伍尔西为巴拉丁私募基金董事,布斯艾伦—汉米尔顿公司的副总裁。副总统切尼拥有大量的哈利伯顿石油工程公司股票。美国伊拉克研究委员会主席贝克为凯雷集团的股东。国防政策局局长珀尔是波音公司董事。布什家族本身更是政商两栖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家族产业遍及金融、石油与军工。

在当代美国,如果说政治结构有些变化的话,那也只是金融财团的势力超过了工业部门。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斯隆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指出,美国实际上是金融寡头政治,6 家拥有资产总额超过美国每年 GDP 总额 60% 的超级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高盛集团,摩根斯坦利,尤其是高盛与政府走得很近。这些金融寡头权势熏天,独占鳌头。

美国财团头面人物出任国际国内公职更是由来已久。早在“二战”

期间，受罗斯福总统委任，高盛高级合伙人的西德尼·温伯格成立了“战时生产委员会”，该机构负责战争物资的生产与供应，为美国在战争期间的经济生产和前线战事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后，高盛的高级管理人员就开始陆续进军华盛顿，投身政界。比较出名的有1965年到1969年的财政部长亨利·福勒，1983年担任农业部副部长的丹尼尔·阿姆斯特茨。

1961年肯尼迪总统任命华尔街豪门道格拉斯·狄龙担任财政部长后，步入仕途的华尔街人士数目显著增长。1970年代任美林公司总经理的唐纳德·里根任里根政府财政部长，原狄龙—里德公司总裁尼古拉斯·布雷迪担任第二届里根政府财政部长。

克林顿总统时代的美国财长鲁宾1966年加入高盛的风险套汇部，5年后成为合伙人，后来在克林顿任总统期间，担任美国财长。1999年，在他和克林顿的支持下，美国金融界在花了30年时间、3亿美元的游说费用后，终于废除了禁止公司同时从事投行和银行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鲁宾离开了克林顿政府并在1999年10月加入了花旗集团，担任副总裁。鲁宾的财长继任萨默斯是鲁宾的学生，现在又是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鲁宾手下负责美国国内金融的财政部副部长加里·柯根利同样出身高盛。高盛原主席史蒂芬·弗里德曼是布什总统前首席经济顾问，后为布什政府的外国情报委员会主席。乔舒·博尔顿曾担任老布什的白宫总统办公室最高长官，后来进入高盛，担任伦敦高盛国际部负责法律与政府事务的执行主任，然后又担任小布什的总统助理与白宫负责政策的办公室主任。高盛原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塞恩曾任纽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原常务董事鲁本·杰弗瑞曾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高盛原副总裁罗伯特·斯蒂尔曾任保尔森国内金融顾问。

2000—2008 年布什在 8 年总统任期内同样任命了三位财政部长，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最后一任亨利·保尔森，他也来自高盛。保尔森 1970 年进入五角大楼，担任国防部长幕僚助理。1972 年尼克松时代，任总统幕僚助理和白宫内务委员会成员。1974 年“水门事件”后，加入高盛芝加哥分部，在芝加哥分部担任银行业务助理，1996 年被任命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1999 年正式出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06 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

尽管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时曾发誓要打击金融财团，但就奥巴马政府的金融与经济官员的来源来看，主要都出自花旗集团、摩根大通集团、高盛集团、美林证券、雷曼兄弟公司、哈特佛集团的高管层。奥巴马财政部副部长沃林原是哈特佛金融集团的高管，总统助理弗洛曼是花旗集团常务董事。政府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多年得到高盛羽翼的呵护。盖特纳先是得到鲁宾的赏识，而后在鲁宾担任财长期间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第三号人物。2003 年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物色行长及 CEO 的委员会由前雷曼兄弟公司 CEO 皮特·彼特森领导，而该委员会的外部顾问委员会三名成员之中就包括在 1976—1984 年间任高盛联席主席的约翰·怀特黑德。该委员会最后选择了盖特纳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兼 CEO。盖特纳没有金融业从业经历，在美联储纽约银行行长的任上，盖特纳所倚重的大多是高盛的前达官显贵，他的决策很大程度上依靠高盛出身的人士。他任命了前高盛经济学家威廉·达德利负责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政府证券交易方面的事务，并授权高盛前主管与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主席杰拉尔德·科利根组成一个专门小组，分析华尔街的风险。

（二）美国特色——财政部、美联储、华尔街是互通立交桥

由此可见，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财团与美国政府，尤其是财政部、

联邦储备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关系极为紧密的政商联合体。而IMF、世界银行、华尔街金融机构、美联储和美国政府都属于这个政商联合体的不同分支。在该集团的中心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高管。他们控制了美国的军事、外交、能源、经济和金融。

以高盛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财团的高管们或者说是美国政府官僚们，控制或影响着美国金融体系。换言之，政商联合体左右着美国政府国内国际的经济与金融政策的走向。因此，美国金融霸权与美元霸权既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他们的利益。当美国印刷美元时，其他国家的货币就出现相应幅度的贬值，所以新兴市场体的国家在政治多重因素影响下，一定会想法设法让美元资产保值增值，那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购买美国的低息国债。

白宫为了让新兴经济体国家沉迷于货币游戏之中，华尔街就成为最好的执行者。因为吸引新兴经济体的财富，美国需要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推动美国的经济泡沫，华尔街金融机构将美国的债券打包进行多重的证券化、债券化，大量推出CDS、CDO等金融衍生品，推高美国的经济泡沫。因为华尔街只有不断刺激经济泡沫，美国财政部才能发行更多的国债，美国政府才能为战争与各种地缘政治运动融资。因此，华尔街与白宫是一家人，华尔街的利润与白宫的财政本身就连为一体，将两者截然分割开来显然不可能。当然，无论是高盛公司，还是华尔街的其他金融机构，都只是一个随时可以更换的马甲，但无论马甲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美国特色的官商勾结的内核与本质都不会发生改变。

四、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欧债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希腊GDP仅占欧元区国家经济总量的2%。但小国希腊的债务危机却产生了米多诺骨牌效应，迅速向"欧猪四国"蔓延。所谓"欧猪四国"，是将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四国英文首字母接成一个词，正好是"PIGS"。如果将爱尔兰(Ireland)也加在一起，又称之为称"欧猪五国"(PIIGS)。

由于欧元区经济与金融一体化，欧洲银行在各成员国间快速扩张，并不断增持欧元区国家的债券，欧元区国家之间交叉持有国债非常普遍，债务网络密布，尤其是核心国德法对边缘国家的债务持有。2010年，葡萄牙GDP为2000亿欧元，外债4000亿欧元，人均外债3.8081万欧元，外债占GDP的251%，政府债务占GDP的106%。葡萄牙银行持有希腊债务75亿欧元，西班牙持有1/3葡萄牙债务。西班牙GDP为7000亿欧元，外债1.9万亿欧元，人均外债4.1366万欧元，外债占GDP的284%，政府债务占GDP的67%。西班牙持有葡萄牙债务几十亿欧元，西班牙有大量外债来自德国与法国。意大利GDP为1.2万亿欧元，外债2万亿欧元，人均外债3.2875万欧元，外债占GDP的163%，政府债务占GDP的121%。法国持有大量意大利债券。

欧洲银行与欧元区国家之间的风险都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如果希腊宣布违约，债务减值50%，首当其冲的是葡萄牙，因为葡萄牙银行业持有的希腊债务相当于其核心资本的36%。一

旦葡萄牙银行业遭到冲击，葡萄牙偿债能力将迅速恶化，使葡萄牙违约的可能性大为提高。而西班牙银行则持有大量的葡萄牙债务，一旦葡萄牙宣布违约，西班牙银行将陷入危机。当西班牙面临违约时，法国和德国银行将被拖下水，而一旦意大利无法偿债，则德国、法国以及整个欧元区都将灰飞烟灭。

迄今为止，欧债危机共爆发了三波。

（一）第一波

第一波于2009年12月从希腊债务危机开始，2010年1—2月，危机蔓延到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2010年1月11日，穆迪警告葡萄牙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赤字将调降该国债信评级。2010年2月4日，西班牙财政部指出，西班牙2010年整体公共预算赤字恐将占GDP的9.8%。2010年2月5日，债务危机引发市场惶恐，西班牙股市当天急跌6%，创下15个月以来最大跌幅。全球市场大肆抛售欧元和欧债，导致欧元相对美元迅速贬值，美元指数持续上扬。2010年5月，欧盟成员国财长达成一项总额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防止希腊债务危机蔓延。但之后持续出现的欧元区经济数据不佳以及相关国家继续被评级机构降级导致美元继续走强而欧元继续下跌。

（二）第二波

第二波欧债危机开始于2010年11月爱尔兰主权债务危机。2010年11月28日，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举行特别会议，通过爱尔兰救助方案，总额850亿欧元。市场担忧得到暂时缓解。2011年2月14日，欧元区财长初步商定未来永久性救助机制的规模，同意拿出5000亿欧元援助未来

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

爱尔兰因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获得了“凯尔特之虎”的美誉。2010年8月24日，标准普尔宣布，由于爱尔兰政府扶持金融业的成本迅速增长且超出预期，将该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A下调一个等级至AA-，评级前景为负面。2010年9月底，爱尔兰政府宣布，由于救助本国五大银行最高可能耗资500亿欧元，预计2010财政赤字会骤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2%，将远超希腊。穆迪和惠誉随即分别于2010年9月27日和2010年10月6日下调了爱尔兰的评级。2010年11月11日，爱尔兰10年期国债利率逼近9%，比欧元区信用等级最高的德国国债高出近7个百分点，创下自欧元1999年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

与希腊有别的是爱尔兰一直到2011年中资金都很充裕，政府负债率仅为25%。其实，爱尔兰危机纯粹是美国量化宽松的炒作。所谓量化宽松（QE），是一种由日本央行于2001年提出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可视之为无中生有创造出指定金额的货币，也可称之为间接增印钞票。一般来说，只有在利率等常规工具不再有效的情况下，货币当局才会采取这种极端做法。量化指的是扩大一定数量的货币发行，宽松就是减少银行储备必须注资的压力。当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被央行收购时，新发行的钱币便被成功地投入到私有银行体系。

由于美国2010年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只有通过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增长。于是，美国公布了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规模。这令全球担心美元会进一步贬值，进而使热钱形成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恶化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环境，诱发全球通胀。该举措更是强化了外界对美国的厌恶情绪，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担心这会导致大量资金涌入本国，

欧洲国家也担忧这会在他们那里引发通胀。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就声称“美国经济发展与管理模式存在严重缺陷”。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告诉媒体：“美国经济增长模式深陷危机。”美国要化解全球对美国QE2的声讨，就只能渲染欧债危机，让美元走强，转移全球对美国QE2的关注视线，平息各国的不满情绪与声讨。而爱尔兰债券规模最小，易被投机操纵。于是，通过所谓的国际评级机构操纵爱尔兰债务危机，美国能成功转移视线，达到顺利进行量化宽松的目的。

（三）第三波

第三波于2011年初开始。2011年的前4个月中，世界各大评级机构均下调了葡萄牙的评级，大幅提高葡萄牙国债利率。4月6日葡萄牙进行了规模为10亿欧元的短期国债拍卖，6月期国债中标利率达到5.117%，远高于3月2日进行的上一次拍卖中的2.984%，12月期国债拍卖平均利率为5.902%，远高于上一次拍卖的4.331%。作为葡萄牙最大债权国的西班牙是欧元区当中的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2010年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9.2%。到2011年3月底，西班牙中央政府未偿还国债余额为5065.95亿欧元，其中短期债务余额834.08亿欧元，中长期债务余额4129.35亿。而整个西班牙外债总计余额为17435.47亿欧元，折合23292.27亿美元。西班牙10年期国债利率为5.64%，比同期德国国债利率高2.71%。

在欧元区，意大利经济总量仅次于德、法两国，在区内占比约17%。但意大利是欧元区17国中债务占GDP比例排名第二的国家，仅次于希腊。2011年5月21日，标普将意大利的债务评级前景下调至负面，24日惠誉将比利时评级前景下调至负面，希腊违约风险加剧。6月24日，中

国总理到访欧洲，表示中国还将继续购买欧债，美元随之开始下跌。2011年7月5日，穆迪宣布将该国政府长期债券评级由Baa1连降4级至垃圾级Ba2，维持评级前景为负面，随后欧元兑美元汇率出现大幅下挫。7月6日，欧元兑美元汇率跌至1.4310美元。意大利股市及债市也遭遇重挫，那些存在欧债风险敞口的意大利银行股票遭到投资者大幅减持，意大利10年期国债的利率连续飙升。7月20日，援助希腊的计划出台，市场情绪稍缓。但8月5日，两国债券利率迅速上升，导致全球股市暴跌。8月9日，欧洲央行行长称已购入西班牙和意大利国债，欧债危机第三波暂告结束。

三波欧债危机导致国际投资者将大量资金从欧洲银行撤出，进入更为安全的美国市场避险。2011年7月27日，美国各大银行所持有的现金总量大幅增长8.4%，创下981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大幅下跌。这表明，大量资金正进入美国国债市场避险，从而恶化了原本资本充足率就不高的欧洲银行的风险。

欧债危机的大幅蔓延导致欧元区政府债券利率攀升，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而企业债券和CDS价格的制定，经常把国债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参考。所以后者的提高，直接导致企业在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实体经济因之受损。政府的财政恶化，增加了政府融资的需求量，进而挤压私人企业的投资额度，减缓经济增长。

截至2011年9月底，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五国未清偿国债本金规模为2.72万亿欧元，本息加起来为3.7万亿欧元。意大利有1.9万亿欧元的债务，负债率已高达120%，即国债是GDP的1.2倍。而欧元区的银行对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整体风险敞口占所有银行的62%。其对以上4国的风险敞口分别为7270亿、4020亿、

2440亿及2060亿美元。其中法国与德国的总体风险敞口分别为4930亿和4650亿美元。英国银行对爱尔兰的风险敞口则达2300亿美元。英国银行对西班牙的风险敞口也达到1400亿美元。债权债务关系已将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利益相互绑定。只要美国继续进攻欧元,危机将会从"欧猪五国"通过欧洲金融体系迅速扩散传染到整个欧元区,包括德法等欧元核心国。

五、三位一体的美国对欧金融战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在其《支配命运的人》一书中曾借拿破仑之口来概括英国人(指狭义的英国人,即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的英格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祖先来自欧洲大陆,是日耳曼部落的分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则是凯尔特人,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的民族性格是:"当英国人觊觎一件东西,他从来不说出他觊觎它。他耐心地等候着,直到他的心里不知怎样地发生出一道热切的信念,认为把他所觊觎的那东西的主人征服乃是他的道德和宗教天职……他从来就不缺乏恰到好处的道貌岸然的姿态。他以捍卫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伟大战士的身份去征服和兼并了半个世界,美其名曰殖民。当他需要为他的掺杂的棉织品获得新的市场,他就派遣一个传教士去向当地土人宣传和平福音。土人杀死传教士,他就马上动武来保卫基督教,为基督教而战,为基督教而从事征服,终于作为上天的酬报占领了市场……他吹嘘奴隶只要踏上大不列颠的土地便成为自由人;他却把穷人们才满六岁的女儿出卖,在鞭子的威胁下要他们在工厂里一天做十六小时的工作……他干什么都是讲原

则的。他跟你作战是根据爱国主义的原则……他欺负你是根据大丈夫的原则；他拥护自己的国王是根据忠顺的原则；他砍掉自己国王的头是根据共和的原则。”

作为大英帝国继承人的美国本质上就是大号的英国。美国虽号称民族熔炉，但其主流的民族文化乃是与英国一脉相承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正如战略家亨廷顿所说，一旦盎格鲁—新教文化丧失在美国的主流地位，美国就不能称之为美国。因此，萧伯纳对英国人的评价套在美国人头上也相当吻合。面对欧元，美国政商联合体从来不直接表现出厌恶之感，而呈现出不冷不热的态度。但美国政界却不断给欧元泼冷水，学术界发表著作与文章论证欧元的创立在经济理论上的谬误。比如，前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主席马丁·菲尔德斯坦曾经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预言欧元必然解体，并因此导致欧洲混乱、纷争乃至战争。

自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就像百多年前的大英帝国一样，在公开场合貌似正义化身，大声呼吁欧元区尽快采取措施结束危机，私下却继续制造欧洲的金融混乱。美国财长盖特纳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欧元区的问题极端困难，困难程度简直难以置信，我甚至怀疑他们能够搞定。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已经给自己挖了一个极深的坑，要爬出来有那么容易吗？”

（一）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率先发难

实际上，欧洲陷入的这个坑恰恰是美国人挖出来的。美国采取了信用评级、金融投机和媒体炒作三件大杀器对欧洲进行了三位一体的金融战。其中首当其冲的第一件大杀器便是美国人控制的三大国际评级机

构，虽然全世界总共有150多家评级机构，但只有穆迪、标准普尔在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中占据了垄断地位和拥有绝对话语权。因为这两家公司控制了大约40%的市场。占14%的市场份额而排名第三的惠誉国际评级公司提供的等级只是这两家公司中的一个参考与补充。

除惠誉具有部分英资背景外，三大评级机构都是美国的私有金融中介组织。三大评级机构市场信用风险最终裁决者的崇高地位是政商联合体控制的美国政府所赋予的。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可穆迪公司、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这些评级机构公开宣称自己的评级依赖于漂亮、复杂且公正、严谨的信用评级数学模型来评估风险。但美国联邦法院早已裁定，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的评级模型与过程是保密的，无须向公众说明。它们的评级过程完全是黑箱操作。由此获得超级金融话语权的代价则是它们只能俯首成为美国金融霸权的打手。

很多时候它们无非是为维持美国超级霸权而冲锋陷阵。比如2003年3月，德国施罗德政府反对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得罪了美国人，结果，包括德国顶级公司商蒂森、克虏伯等公司在内的很多德国企业被穆迪等三大评级公司降至垃圾级，德国公司的股价开始大跳水。而美国的跟班澳大利亚却因全力支持伊拉克战争，被三大评级公司评级升至最高等级的AAA级。

评级机构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更让人对其公正性产生质疑。2009年12月，希腊财政赤字占GDP的12.7%，欧盟财政赤字7.5%，而美国财政赤字约占GDP的12%，但穆迪对美国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却为最高的AAA级别。2010年4月27日，欧盟和IMF为希腊提供援助资金，但三大评级公司并未提高希腊信用等级，反而继续下调。希腊和葡萄牙股市分别应声暴跌6%和5%，德国、法国、英国等国股市普遍下跌2%～3%。

就像欧盟执委会负责金融服务业监管的委员迈克尔·巴尼尔所说的,“我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全面审视评级对于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影响。这些机构不仅对企业,而且对国家都掌握着极大的权力。这也就是我要求他们在工作中负起责任的原因。”信用降级对资产价格、融资成本和资本流量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在一波接一波的欧债危机过程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信用评级机构每次调低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评级都会在金融市场上重创市场信心,造成自我实现式的债务危机。

无怪乎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斥责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是寡头垄断。而葡萄牙总理科埃略也气愤地指责说,穆迪的降级如同向别人肚子上猛击一拳。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则说得更为直白:“穆迪降级的时机选择和调降幅度,具有明显的反欧洲倾向。”原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欧洲人民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艾尔玛·布洛克则指出,“降级行为是美国评级机构对欧洲发动的一次攻击。标普降级欧洲国家主权评级并无可靠依据,所以,标普的降级行动是个利益问题,他们在对我们搞货币战。是美国的一些势力,特别是金融界的一些势力。他们这么做的唯一目的是牺牲欧洲,为‘盎格鲁—撒克逊人’赢得利益。他们想通过破坏欧元区来赚钱……盎格鲁—撒克逊媒体负责呈现一个完全错误的欧洲景象,反欧洲的默多克传媒帝国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改变现状,德国和其他欧洲大陆的出版集团必须联合起来,创建一个使用英语的经济类新闻机构,传播欧洲人的观点。”

2011年8月,标普下调了美国的长期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但次贷危机爆发后的两年多时间中,美国的主权信用前景展望都未被调低。偏偏在这个时间点才开始调整,这无非是评级机构饱受人们责备其不公正行为做出的一个姿态,以显示其所谓的公正态度而安抚人心。实际上,这

对美国毫无影响。基于军事霸权与美元霸权的双重保障，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大，流动性高，安全性好，成为各国政府和主权财富基金最主要的投资品种。标普的调级不会对美国造成像欧元区一样的严重影响，这一点应该早就为评级机构与美国政府所了解。

评级机构打的是头阵，美国对欧元的攻击主力与第二件大杀器则是以华尔街为首的美国金融机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而且它不需要任何资本金。它具有近乎无限的融资或创造信用的能力。”

“欧猪五国”的贸易国大多是欧盟其他成员国，尤其是欧元区，其经济失衡的原因主要来自欧元区内部。以希腊为例，其超过60%的进口额来自于欧盟地区。德国生产的产品40%销往欧元区。因此，贸易失衡与债务问题也是欧洲内部的问题，而欧债危机与欧元汇率并不是实际经济状况的反映，更多是净资金单向流动造成的结果。

债务危机很多时候由汇率变化引起，而汇率变化很多时候并不反映实际的经济状况。国际投资者购买一国国债，不仅要看利率高低，还要看汇率变化。如果欧元汇率预期下跌的幅度高于欧元利率的提高，再考虑到违约风险，投资者会抛售欧元资产。因此，只要国际资本制造出欧元贬值的预期，就可以引起投资者抛售欧元资产，而这些投资者抛售欧元资产的结果会加剧欧元下跌，形成一个自我推动的恶性循环。这造成欧元区国家的融资成本增加，资金大量外流，投资者对这些处于债务危机的国家的长期支付能力产生怀疑。这些国家的长期国债以低利率难以发行，只能被迫将大量到期的国债转换成利率极高的短期国债。结果处于债务危机的国家很快便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到期债务。市场对这些国家的信心加

速恶化，债务危机亦将随之恶化。

（二）美国金融机构伺机出击

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机构会事先布下陷阱，一边攻击欧元，一边大赚其利。美国金融机构购买大量 CDS 来卖空希腊国债。结果在希腊危机爆发短短 6 个月的时间内，CDS 的价格上涨了 7 倍多。希腊政府债券随之被抛售，导致希腊债券价格崩溃，债券价格的崩溃进一步提高了 CDS 的价值，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三）心理战、宣传战铺天盖地

当然，在金融机构进行攻击的同时，少不了第三件大杀器——媒体炒作。媒体炒作是美国人的一种心理战。美国国防部对心理战的总结是：“有计划地利用宣传和其他心理行动，以影响敌对的外国团体的舆论、情感、态度和行为作为首要目的，从而支持实现国家目标。心理战行动是有计划的行动，向外国受众传达有选择的信息和指标，影响他们的情感、动机和客观推理，最终影响到外国的政府、组织、团体和个人的行为。”

美国开展心理战的基础则是信息源的控制。控制了信息源就控制了国内国际话语权，把人们引向某种特定的思维定式，人们会在这种定式中去寻找有利于美国利益的答案。世界上最大的 80 多个电信公司都为美国所有。美国的 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ABC（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所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国发布信息总量的 100 倍。美国控制了世界 75% 的电视节目和 60% 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此外，美国利用互联网技术控制了大多数网上信息的来源。

在欧债危机中，美国的媒体与金融机构相互配合，大肆渲染欧洲国家的政府没有支付债务的能力，甚至传出部分国家已经破产的谣言。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先生指责美国操纵舆论，“恶意的谣言总是被无休止地重复，并被策略性地放大。凭借纳税人资金摆脱困境的同一批金融机构，如今从希腊的厄运发了一笔横财。而同一批纳税人正为此付出代价，其工资和社会福利遭到大幅削减。因此，这些不良投机商通过赌定希腊债务违约，每天收获数以十亿计的美元。”

（四）“欧元先生”卡恩成了牺牲品

除了以上三种大杀器外，美国政商联合体的精英“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最为典型的莫过于2011年的卡恩事件。2011年5月14日，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因涉嫌性侵一名酒店女服务员被美国拘捕。5月19日，卡恩宣布辞职。然而，62岁法国犹太老人卡恩身高仅168厘米，而那位所谓被性侵犯的32岁女服务员是身高180厘米身强体壮的黑人。显然，只要稍加思考，有点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能分辨出来，这是美国人设置的一个陷阱。这不仅是一个公开的局，而且还是一个有意羞辱欧洲人的局。

纳粹宣传家戈培尔曾经讲过：“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用不着谋求知识分子的皈依。因为知识分子从来都不皈依，而是永远倒向强者。就跟大街上的

人一样。因此，给出的理由必须没有加工的痕迹，明白而有力，能引起情感和本性的共鸣，而不是理性的共鸣。真相并不重要，它完全从属于策略和心理。仇恨和轻蔑必须针对具体的个人。”美国的媒体精英深得戈培尔的三昧。卡恩事件背后的潜台词是，凡是美国媒体报道的就是正确的、可信的，凡是凡是违背美国金融寡头的利益就是错误的，只要通过媒体的大鸣大放，谎言重复无数遍自然就成了真理。

按照一般的传统，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IMF 总裁则由欧洲人轮值。但无论是谁在世界银行和 IMF，只要不听从美国人的摆布，忤逆美国政府的利益，结局必定是下台。卡恩并非第一个被美国人在 IMF 搞下台的法国人。早在 1970 年代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法国人皮埃尔·保罗·施韦泽以 IMF 的名义宣称美元估值偏高，要求美国提高黄金价格，结果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不到一年后施韦泽被迫离职。

卡恩在 1997—1999 年担任法国财政部长期间，强烈呼吁欧洲建立货币联盟，致力于欧洲一体化进程。1998 年 5 月 11 日，他亲自启动造币机制造出第一枚欧元硬币，从此被誉为“欧元先生”。2007 年卡恩任 IMF 总裁后改变了 IMF 的传统立场，卡恩一贯主张用超主权货币或一揽子货币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他有一句名言：“战后的货币权在美国手里，欧元问世以后，我们将同欧元伙伴一起收回主权”。

欧债危机爆发后，在卡恩的积极推动下，IMF 对欧元区重债国作出深度援助承诺。在他的带领下，IMF 密切地参与了欧盟拯救成员国的行动，不仅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这三个债务风险过高的国家提供了紧急贷款，而且还对欧盟新成员国匈牙利、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提供了资金援助。英国《卫报》曾写道：“卡恩就像照顾一个孩子那样，在保护希腊脆弱经济的同时，守护着整个欧元区。”

然而，卡恩的举措打乱了美国对欧元攻击的步伐，动摇了美国利益，尤其是金融财团的利益。对美国来说，维持货币信誉比扩大出口更急切，而维护信誉的唯一手段就是营造强势货币。只有让欧元跌才能保持美元的地位，决不能让卡恩领导的 IMF 成欧债的最后贷款人与欧元后盾。因此，卡恩必须要被搞下来。卡恩事件发生后，美国人的目的达到了。市场迅速对这一政治事件作出反应，美元指数一路攀升，欧元一路下跌，而欧债危机也随之恶化。

六、美债继续攀高，美国剑指欧元区核心国

（一）欧元可以死亡，美元不能"感冒"

尽管欧债危机汹涌澎湃，但美国主权债务的情况也并未好转。2009 年，美国联邦政府赤字高达 1.6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12%。2010 年赤字为 1.3 万亿美元，2011 年的赤字将达到 1.5 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2011 年预测，未来 10 年，联邦政府每年财政赤字不会低于 1 万亿美元，累积将超过 10 万亿美元。其中，外债占债务总额 56%，外国政府和投资者持有大约 5.5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2011 年 8 月，美国国债达到 14.29 万亿美元，略高于美国 2010 年 GDP 总量。但美国政府实际债务总量比这个数据还要高得多。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阿特曼估计美国政府实际债务总量高达 31 万亿美元。其中政府直接发行的公共债务为 9.74 万亿美元，直接担保债务 9 万亿美元，担保的政府赞助企业（GSEs）债务 8 万亿美元。GSEs 是指由美国国会按照联邦章程设立但由私人控股的一类金融服务机构，其设立的目的

在于为特定借贷市场，比如农业、家庭住房、教育等提供更加便利和较低成本的信贷支持。在 GSEs 中，最著名的就是在次贷危机中大出风头的房地美和房贷美。这两家公司是美国最大的为家庭住房提供资金来源的政府赞助企业。此外，还有担保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 3 万亿美元，担保的州和城市退休金账户不足 1 万亿美元。

这意味着如果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不能高于国债利率的话，美国总有一天会无法偿还债务。美国经济只有借新债还旧债才能勉强维持，一旦市场预期美国必然无法还债的话，美国债务危机的爆发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美联备前主席、现担任奥巴马经济顾问的沃克尔才一直蛮横地强调，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不可能遭到动摇。

如果放过欧洲，美国通过金融手段攻击其他国家不能完全达到驱赶足够的资金进入美国的目的。美国发动对其他国家的金融战，无非为了使其他国家用外汇储备支付的资金撤离，而撤离的资金再进入美国和欧洲。但还无法保证撤离的资金一定进入美国。如果资金大量进入欧洲，欧洲实力增加，反而不利于美国对欧洲的金融攻击。因此，美国的首选攻击目标必定是欧洲。只要让欧元大跌，就能让那些拥有大量欧元储备的国家抛出欧元，买入美元。与此同时，很多国家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将大幅缩水，大量国际资本会撤离这些国家转移到美国，用来帮助美国完成国债的大规模发行。

因此，如果欧债危机得到圆满解决，美元霸权受到削弱，欧洲国家将会吸引原本可以流入美国的资金，那么美国必将在不远的未来受到市场的质疑而难以借债，那么这个不可一世的金融帝国——美国必将面临永久性的破产。欧洲与美国在这方面的竞争关系就像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顾问、现任总统萨科齐的首席顾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创建人雅克·阿塔

法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欧盟决心继续借款，在资金的寻找中与美国面对面的竞争，就像两个老妓女为争夺最后的嫖客而争吵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然要将欧债危机的熊熊烈火燃烧到欧元区核心国。2011 年 11 月 10 日 15 点 57 分左右，标普评级网站的部分订户收到一份电子邮件警报，暗示法国的评级已经被下调。很快，欧元兑美元贬值，美国股市下挫，法国国债利率上升，价格下跌，资金纷纷涌入美国。不到 2 小时后的 17 点 40 分，标普澄清说，警报是技术性失误，但法国国债价格却仅有小幅回升。

当然，法国的情况本身也不容乐观，法国金融机构与欧元区债务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在意大利，法国银行拥有意大利银行大量股份，并在意大利建立了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法国的银行还持有巨额意大利国债。意大利债务危机必然会影响到法国的金融系统。因此，法国迟早也会受到欧债危机的冲击。但是，标普的误操作加速了法国卷入债务危机的过程。这是美国对欧元区核心国发动大规模金融攻击的前奏。2011 年，美国长期国债利率超过 30%，包括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美联储在内的主权投资机构持有共 9 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务。美国债务负担极为沉重，攻击欧元势在必行。

（二）防守反击——欧元保卫战

欧洲人也早已预料到美国人将会发动规模更为庞大的对欧金融战，而法德保卫欧元的意志绝不可低估。2011 年 12 月 18 日，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表示，德国不太可能会失去 AAA 主权信用评级，即使失去也可能不会带来灾难性后果。魏德曼称："这不太可能。在美国主权评级遭下调后，我们不禁质疑降级是否会真的带来灾难性影响。"而法国总统萨科齐对保住法

国主权信用等级的信心已经大不如前。由此看来,法德两国已确信,评级机构下调欧元区核心国的主权信用级别已箭在弦上。法国与德国为防止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欧元资产,已提前给国内作舆论上的准备。

欧洲央行曾要求欧洲全部27个成员国银行在2012年前资产充足率达到9%的水平,以应对未来欧洲债务危机的恶化。银行系统需要筹集到6000亿欧元的资金才能满足需求,而银行只能提供1/4的资金。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规定,银行必须维持8%以上的高流动性资产。流动性指资产能够以一个合理价格顺利变现的能力,是反映资产变现能力的指标。通俗地讲,流动性就是买了某种资产之后是否容易卖出。比如,流动性高就是按理想价格容易卖出,反之就是流动性低。

这些银行的高流动性资产中的60%必须是主权债,因为只有主权债才可以被认为是零风险并且享有最高级别的流动性,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得欧洲银行风险剧增。银行业为应对欧洲央行的最新规定,不得不大量出售问题国家的债券甚至是核心国家的债券,最终将进一步恶化欧债危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根据欧盟法律规定,央行不能直接买入成员国债务,而只能通过对商业银行的注资实现了货币扩张。为此,欧洲央行2011年12月21日宣布,通过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向欧洲银行业欧元区的500多家金融机构提供了3年期的基准利率为1%的超低利率贷款,并且没有任何贷款上限,只要银行有足够的抵押品做担保就可以贷任意额度的款项。2012年初,230多家欧元区银行的总投标额度超过4891.91亿欧元。该方案的目的是试图以欧洲央行投入资金的低利率与主权债务借贷的高利率之间的高额利差来引导欧洲金融买入并持有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而不是将其卖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得套利的机会,欧洲银行业必然买入主权

债务，而不再考虑售出大量风险资产来获得流动性。

当然，欧洲央行的举措有变相放水的嫌疑，有可能会引发欧洲的恶性通胀。但在权衡利弊之后，欧洲不得已也只能采取如此下策。欧洲央行的这一操作显然是有针对性的。美国评级机构下调欧洲国家信用级别屡屡恶化欧债危机，而通过长期再融资操作不仅是给欧洲金融机构提供一个有效的缓冲手段，而且是对美国打击欧元战略的一个巨大的战略威慑。

欧洲人为了对付美国玩起了既有防御也有进攻的组合拳。欧行变相放水之举是一种纯粹的防御策略。欧洲对美国的战略进攻则是典型的防御性进攻策略。欧元区对美国的有效反击还有两个重要手段。其一是限制美国评级机构对相关主体评级的立法。其二是就限制裸空交易进行立法。裸空交易是美国金融机构的市场操作主要方法之一，是指投资人预期市场上的债券或股票行情下滑，在没有借入债券或股票的情况下，便直接在市场上卖出根本不存在的债券或股票，然后在债券或股票价格下跌后买回，以此获得差价收益。这种交易方式将会产生杠杆效应，严重放大市场风险。但欧洲银行以立法的手段来反击美国的过程过于漫长，很难看到及时的效果。

其实迄今为止，欧洲反击美国最有效的手段是抛售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欧洲银行拥有大量 MBS。欧洲银行一旦抛售 MBS，美国的证券化住房抵押贷款价格遭到巨大的冲击。MBS 是美国金融衍生品的最重要的内核。欧元区金融机构此举将直接威慑到美国整个金融资产的稳定性，意味着一旦欧洲资本在美国的 MBS 市场上来一个大撤离，将有可能让美国的金融问题提前被爆出来，而欧元的压力将大大减轻。

2011 年，欧洲金融机构小试牛刀，直指美国金融势力的要害，大量抛

售美国 MBS,对美国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在 2011 年 4—12 月不到 8 个月的时间中,MBS 市场的下跌幅度从 10% 扩大至 50%,2006 年发行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BMS)的价格的 ABX 指数(2006 年 1 月推出的 ABX 指数称为次级房屋贷款债券价格综合指数,由一篮子具有代表性的次级抵押贷款价值构成,其随次贷证券资产风险升高而下降。这意味着当次贷风险升高、证券化的次贷资产价格下跌时,ABX 指标随之下滑)下跌 29%,跌至 2009 年底以来最低位。欧洲金融机构这一反击行动显然是对美国的一种警告。

(三)反击?——欧元有几颗"脑袋"

面对欧洲的金融反击,美国人相当不满。2011 年 12 月 20 日,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与以色列政府和军方领导人进行会谈时称,他一直在幕后领导着与伊朗作战的准备工作,目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如有必要即可开战。不过邓普西也表示,任何失误都可能意味着美国被拖入对伊朗的战争,那对中东和世界而言将是灾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这番话,就是美国人对欧盟更严厉的回击。

2012 年 1 月,欧盟发表声明称,成员国同意通过缔结财政新约加强融合,对赤字占 GDP 之比超过 3% 的国家启动自动制裁机制,债务占 GDP 之比不得超过 60%,年度结构性赤字不得超过 GDP 的 0.5% 为缔约国中期财政目标,但却有豁免条款,即允许缔约国"在控制范围之外发生对政府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冲击的非正常事件,或在修订后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定义下的严重经济衰退时期,暂时偏离中期目标"。

随后,意大利和西班牙成功地以低利率发售 220 亿欧元国债。2012 年 1 月 12—13 日,西班牙成功卖出 100 亿欧元的国债,高于原定目标 50

亿欧元。紧接着，意大利成功拍卖了85亿欧元的2013年1月到期的1年期的BOT债券和35亿欧元2013年5月到期的1年期BOT债券。BOT即建设—经营—转让，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营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

目前，法国债务水平已占其GDP的85%，达多年来的最高水平。法国和德国一直以来都是欧债问题解决的主要国家。若法国扛不住，则德国力量不足以支撑。一旦德法两国的主权信用等级被美国评级机构下调，欧元区各大金融机构手中所持有的这些国家的国债等金融资产，账面资产必然下降，从而倒逼欧洲金融机构追求更多现金，以满足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其后果是引起欧洲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

2012年1月，标普将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塞浦路斯下调2个级别。将奥地利、法国、马耳他、斯洛伐克、斯诺文尼亚下调1级。标普确认德国、比利时、爱沙尼亚、芬兰、爱尔兰、卢森堡、荷兰的评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级别从AAA被下调至AA+。法国和奥地利失去AAA评级后，欧元区只剩下4个AAA国家：德国、荷兰、芬兰、卢森堡。

惠誉则表示不会下调法国的评级，但前提是"*只要法国债务规模占GDP的比例稳定在90%左右，并在2013至2014年间开始回落，法国就能保住AAA评级*"。同时，惠誉进一步威胁称："*不过，鉴于法国经济增长缓慢，政府也需要向金融业提供部分支持，如果再将法国因为欧元区救助而承担的债务也考虑在内，法国的状况将与AAA评级不相称。*"

2012年1月13日，原本高开高走的巴黎股市一路下跌。当天收盘时，巴黎CAC40指数下跌0.11%，德国法兰克福DAX30指数下跌

0.58%。欧元对美元汇率当天跌至1:1.2624,创2010年8月以来新低,欧元对日元汇率则跌至1:97.20,创2000年12月以来新低。而美国国债利率却下降,美元指数上涨近1%,升至81.54。

欧盟领导人纷纷抨击标准普尔下调法国等9个欧盟国家主权信用等级的恶劣行径。欧盟委员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奥利·雷恩称,标准普尔的决定"不协调",因为欧元区国家目前正在采取果断措施应对债务危机。他指出,标准普尔以前犯过相同的"错误"。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与金融服务事务委员巴尼耶说,在欧盟国家进一步采取措施大力治理财政和促进经济增长之际标普下调欧盟国家主权信用等级,让他感到十分"惊讶"。法国总理菲永表示:"标普调降法国评级在意料之中,法国评级下调无碍法德之间的关系。"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对于标普调降欧元区国家评级一事并不感到吃惊。"奥地利政府表态称,奥地利经济状况稳定,不理解评级机构的决定。奥地利财政部长威廉·莫尔特雷尔和外交部长乌尔苏拉·普拉斯尼克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降级"不合理",并声明说:"单个欧元区国家信用级别调整不一……而这些国家眼下正紧密合作,试图拿出解决方案。"欧洲联盟委员会分管经济事务的委员奥利·雷恩认为标普决定"自相矛盾"。

标普的这一大规模的评级下调行动,会给欧元区金融机构带来资产降低、增加核心资本的压力。但由于欧元区对美国的这一行动早已经进行了舆论、制度与金融上的准备,因此,这次下调对欧洲经济以及金融稳定形成的冲击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标普下调欧洲9个国家主权信用等级的行动所引起的资产下降,将在很大程度上为欧洲央行的廉价贷款对冲掉。面对这一新的状况,不难预料美国对欧金融攻击的力度与频度都将会升级。



第四章

欧元的内在缺陷：

注定分裂的欧洲



一、政府财政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货币发行的基础

（一）“欧元之父”的理论缺陷

根据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假设世界由甲、乙两个国家组成，甲国使用甲币并生产大飞机卖给乙国，乙国使用乙币并生产鞋子卖给甲国，甲币与乙币之间的汇率自由浮动。现在甲国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了大飞机的劳动生产率，而乙国的的劳动生产率仍原地踏步。此时，甲国大飞机的生产过剩，乙国鞋子的需求大幅提高。结果导致两国间的贸易失衡，甲国出现收支赤字，失业率增加，乙国贸易顺差并出现通货膨胀。要解决甲国的失业问题，两国央行都得扩大货币供给从而产生更严重的通胀，要解决乙国的通胀，两国央行都得收缩货币供给从而产生更严重的失业问题。对此，蒙代尔认为，只有两国放弃主权货币，实行区域统一货币才能保证物价稳定和就业。

欧元区即为蒙代尔理论的现实版本。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资本在各成员国之间完全自由流动，欧洲央行使得各成员国完全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但实践却证明蒙代尔的区域统一货币的观点极为失败。其实从理论上来看，蒙代尔经济理论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像蒙代尔之类的经济学家把现代货币看做可随时兑现的主权债务工具，并将货币与财政

截然分开。他们认为，货币政策仅控制货币供给量，财政政策用于调控政府支出、税收和政府借贷。但这种教科书式的观点仅适用于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下的货币，这种货币相当于某种债务凭证，持有人有权在银行要求将之兑换为相应数量的黄金或国债。

然而，现代货币与政府财政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国家税收机制创造了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即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向其国民征税，并要求税收支付只能使用国家确定的货币。税收机制的根蒂是国家主权，因此现代货币一般都是主权货币。在这种情况下，本国货币只能由本国政府发行，如果一国政府只接受本国货币作为税收支付手段，公众与企业只能向政府提供商品和服务以获得本国货币来缴税。国民由于有了强制性的税收负担，才愿意获得本国货币。但这并不是说没有税收负担的人不需要货币，或者说只有有税收负担的人才愿意接受主权货币。原因在于有税收负担的人必须使用主权货币纳税，而没有税收负担的人也需要使用最权威的负债来清算其与有税收负担者之间的债权和债务，因此也内生地需求主权货币。

（二）中国古代纸币的成功案例

中国是最早流通不可兑换纸币的国家，分析中国古代较为原始的纸币流转系统能更为直观地理解现代货币的本质。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现代银行，不可兑换纸币发行与流通的渠道是通过官员工资、奖金的发放或政府的其他开支从国库流入到官吏和商人的手中，官吏手中的货币也通过购买商品流入商人手中。商人购买农业与手工业小生产者的产品使得一部分货币流入普通老百姓手中，普通老百姓购买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又让这部分货币回到商人手中，最后通过税赋的形式流回国库，形成

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

比如南宋孝宗时代，要让老百姓接受不可兑换纸币——会子，政府必须通过征税来收取会子。或者说，不可兑换纸币的流通是建立在政府税收愿意接受的基础之上。南宋政府自然非常希望财政收入中的铜钱能多于会子，财政支出中的铜钱少于会子。但是，一旦财政收入中的会子比例降低而支出中的会子比例提高，会子的信用大幅下降，通胀将随之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政府采用了钱会中半制。所谓钱会中半，是指国家对铜钱、对会子不偏不倚，一视同仁，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实行铜钱与会子数量对等的制度与原则。政府以会子征税不是为了融资，而是为会子提供价值。换言之，政府将铜钱和会子视为地位平等的法偿货币，这样才能使会子得到老百姓的接受。从此，南宋的本位货币从铜钱逐渐转变为纸币会子。

在现代经济中，主权政府向国民强制征税，国民只能以政府垄断发行的货币作为税赋缴纳工具，这样政府就能够通过规定公众获得货币的条件来影响货币购买力，也只有政府才能为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发放的主权信贷。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就是由政府发行的信贷工具即不可兑换货币来清偿。因此，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后不欠任何人的债务，只是承诺接受该货币为纳税手段。

主权货币包含着一系列的债权和债务关系。在货币经济的交易中，货币支出者放弃了其债权人的权利，从货币接收者购买商品与服务，同时将政府信用转移给货币接收者。因此付钱也就是付出债权，主权货币是交易过程中的一种信贷工具。总之，主权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不是政府债务，因为主权货币的背后支撑是政府税收，从而可以用于结算一切公共和私人债务。

缴纳税赋在拥有货币主权的国家并不是搜刮民财的手段，而是一种货币回笼的方式。货币以税赋回流政府的方式退出流通。再举一个中国古代的例子。洪武大帝朱元璋创建大明王朝后，发行新纸币——大明通行宝钞，简称大明宝钞。新纸币是典型的国家垄断的不可兑换纸币，它没有发行准备金，也不能兑换成金银或铜钱。为了推行纸币，金银被禁止作为货币使用。但是纸币发行 20 年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幅贬值，物价普遍上涨。

面对纸币的急剧贬值，明朝皇帝采取诸多措施来维持纸币的稳定性。盐自汉代以来都是国家专卖，几乎无法偷税漏税，因此盐税是一种人头税。1404 年，成祖提高盐税，规定承认每人每月买 1 斤，纳税 1 贯，未成年人每月买半斤，纳税 500 文纸币。1 斤盐只值 3 文铜钱，4 斤盐值 1 贯纸币。当时全国人口约 5000 万，以 1980 年世界未成年人比例 40% 计算，每年可回收过剩的纸币 4.8 亿贯。1424 年，成祖南京抽分场与龙江提举司的薪柴木竹以每 10 公斤 1 贯的价格卖给民间来回收纸币。宣德皇帝继位后，将商税提高了 5 倍，另增设各种税赋与行政罚款来回收过剩的纸币。

为了保证市场交易的平稳运转，政府至少应该提供和税收负担相等的货币量。如果政府货币供给量超过了税赋总额，多余的货币将被储蓄起来。由于政府仅仅发行货币就可以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而公众通常愿意储存更多的货币，政府支出总额往往会超过其所获得税收总额。而公众对主权货币的交易需求越大，储蓄的货币量随之越大，政府负债就越高。

公众能够使用主权货币向国家缴纳税收，国家通过征税回收其债务即货币，而商业银行发行的银行货币是能以支票方式提取的银行存款，但

其不存在国家税收机制保障下的强制赎回制度，因而商业银行的负债能力受到的约束较大。但只要政府接受银行货币作为税收支付手段，银行之间的存款能够按面值相互结算，其价值将与主权货币一致。

政府在支出的同时就意味着签发了一张国家财政部支票。财政部支票并不需要税收收入或国债的抵押。当财政部支出时，资金从商业银行账户划转到财政部在央行的账户上。国家财政部支票的接收人会通过银行体系兑现该支票，或是提取现钞或是存入银行账户。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账户上增加了相同数量的准备金，因此银行系统存款准备金总量不变。财政部在支出之前不可能收到税款，任何从私人部门转至政府的税款都需要政府通过央行提供同等数量的主权货币。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是银行的资产与央行的负债，标志着对主权货币的索偿权。当财政支票接收人兑现一张支票时，银行就将存款准备金转化为主权货币提供给客户。因此，央行不过是财政部的银行，将财政部负债转化为财政部对央行自身的负债。

中央银行体制的运作基于将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作为主权信贷。中央银行实质上是一国银行系统的最后贷款者，其发放的是主权信贷。而商业银行发行的银行货币或银行券只是以主权货币计价的政府货币替代品，也是一种内生货币。由于存款人的资产与银行负债相抵消，银行货币或银行信贷必须要有政府发行的主权货币的投放才能增加货币供给量。换言之，银行货币是以政府货币作为准备金与以政府货币计价的资产做担保。整个银行体系都以政府央行为金字塔的顶端，而央行则承担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企业或居民在商业银行账户上的结算过程其实也就是准备金在银行之间的转移过程。因此，每一笔税款的支付都会导致银行体系中准备金的减少，如果政府实现财政盈余，社会流通与储蓄的货

币量将减少，反之则增加。

（三）没有政府赤字，就没有主权货币的存在

教科书式的货币理论认为，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倒数是存款创造乘数，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准备金的多少决定其能够发放贷款的规模。实际上，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并不是银行贷款的基础，而更应该看作是商业银行持有主权货币从而保证国家和纳税人之间顺畅清算的必要保障。银行的目的是要保证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清算，由于政府税务机构接收银行货币作为税收的缴纳，银行事实上就成为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金融中介。政府支出转化为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的增加，相反，向国家的税收支付导致银行体系准备金的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国债的发行只是对货币流通量的调节。政府能自由而不受限制地制造不兑现的主权货币作为纳税凭证，并以之清偿一切债务。因此，政府赤字并不需要通过向民众或国外投资者售卖国债的方式来借贷。实际上，政府发行的国债只是让公众持有一种有利息收入的金融品来替代无息的主权货币。政府发售国债也不是用来为赤字融资，而是通过吸纳银行体系中多余的准备金以维持一个合理的基准利率。因此，国债仅是税收与货币制度的补充，只改变借贷的基准利率水平。

由于主权货币创造的总量由政府购买的商品、服务与资产的数量所决定，国家是通过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来控制最初的货币投放。缴税使得最初投放的货币有很大一部分脱离流通领域，剩余的货币要么成为储蓄，要么流入银行体系转化为银行准备金。如果流入银行的准备金过剩，货币政策能够降低商业银行账户中的超额准备金，即通过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方式将超额准备金转化为有利息收入的政府债券。因此，财

政政策决定了货币投放量，而货币政策仅决定短期货币借贷市场的利率。

总而言之，财政政策或者说政府的支出政策决定了可以用来缴税的主权货币的数量。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调节相对于财政政策而言作用较小，只能在短期内微调货币供给量。因此，没有税收体系的财政政策就没有现代货币体系的存在，没有政府赤字就没有主权货币的存在。

二、欧元不是真正意义的现代货币

（一）超主权货币不是真正意义的现代货币

2007 年 1 月 1 日，斯洛文尼亚加入欧元区。2008 年 1 月 1 日，塞浦路斯与马耳他一起加入欧元区。2009 年 1 月 1 日，斯洛伐克加入欧元区。截至今日，欧元区成员国从最初的 12 个增至目前的 16 个。这 16 个国家在欧元区中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德法两国是核心经济体，其他国家中的大部分为外围经济体，小部分则是被边缘化的经济体。德法希望欧元是服务于其货币国际化的工具。因为无论是德国马克还是法国法郎，都无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对美元，甚至是英镑发出挑战。在欧元产生之前，德国马克曾经是主要的国际货币之一，但全球储备资产中德国马克资产与美元资产的比例基本反映了两国的经济规模之比，大约保持在 1:4 左右。德国的本意是将整个欧元区变成大德国经济区，法国则希望通过统一货币的方式制约德国这个强大而可怕的邻国。因此，欧元的创建更多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符合经济规律。

众所周知，欧元机制是超主权信用货币体系，即通过欧洲央行吸纳成

员国货币政策主权,同时以各国共同签订的条约协调财政政策。欧洲央行有着独立预算制度,资本金由成员国中央银行认购和支付。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批准发行欧元货币的专有权。在国际合作方面,欧洲中央银行可以加入国际货币机构,而成员国中央银行只有在得到欧洲央行批准后才可加入国际货币机构。欧洲央行有通过各国政府或直接从各经济主体收集制定货币政策必需的统计信息的权力。成员国中央银行作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必须参照欧洲央行的方针和政策运作。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包括主管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前者负责方针和决策的制定,后者负责具体实施。主管理事会由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执行委员会委员由欧盟理事会和主管理事会协商后确定。无论是主管理事会还是执行委员会成员均具有一票表决权。欧洲央行不得接受任何机构或组织、成员国政府的指导。

欧元本身没有税收基础。即使是欧盟也没有税收募集的能力。欧盟收入主要来自于关税、农业税、欧盟范围内的非直接增值税,其总额仅相当于各成员国 GDP 的 1.24%。因此,欧盟收入几乎没有自己可以直接控制的税收,显然国家主权要高于欧盟整体利益,自然也高于欧洲央行所覆盖的欧元区整体利益。

在实际操作中,教科书式的央行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本就不存在。离开了财政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不可能长久有效。没有了货币政策的支持,财政政策的作用也要大打折扣。因为货币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欧元在尚不存在“欧洲合众国”时诞生,本身就十分荒谬,因为只有相互竞争的各国主权政府才拥有合法主权。

对于采用主权货币的国家,政府支出增加或降税都能增加为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而银行体系准备金的增加为社会经济体系注入

了更多的货币并降低了市场利率。只要实业投资回报率高于市场利率，便能刺激投资需求，增加产出与就业，从而增加未来的税收收入。因此，政府赤字既能保持经济增长，又能增加税收。因此，拥有主权货币的一国政府完全无须担心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只要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在一起，便可以促进经济繁荣，实现充分就业。

而政府赤字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一般在不可兑换的主权货币条件下，主要有两个原因导致通胀。一是有限的资源导致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比如石油、铁矿石等能源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等；二是经济运行的效率超过了资源所能容许的极限，导致需求增长过大而产出增加有限，从而出现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因此，只有在实现充分就业、所有的真实资源被充分利用之后，过多的政府支出才会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只要有失业存在，资源就没有被充分利用，那么以主权货币计价的政府赤字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因此，对付经济危机的合理做法就是加大政府财政支出，提高银行准备金，保证银行体系充足的流动性，刺激投资和消费。

税收创造货币，国债仅是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补充。马克思曾说过，“因为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政府可以应付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有所感觉，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一笔接着一笔的积累而引起的增税，又迫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短期来看，中央银行买卖国债的公开市场操作降低或增加银行体系的准备金。长期来看，财政部新债券的发行才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纵业务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相互配合。

对于拥有独立货币主权的国家来说，政府能让本国央行增发货币买入国债，以避免国债利率的大幅上升，同时防止通胀发生。美国政府赤字的严重程度要超过欧元区，国债数量非常庞大。2010 年，美国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重为 10.6%，欧盟仅为 6.4%。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当国债风险遭到市场上的投资者抛售时，美联储可以无限制买入国债从而保证国债利率不至于过高。但美国国债主要由美国养老基金、美联储和几个大国集中持有。自主发行国债和美元的美国只要控制持有美债的几个贸易顺差大国，便能缓解美国的债务问题。

(二)欧元区成员国有财政主权却没有货币主权

欧洲的情况与美国具有本质差别。根据欧盟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或成员国中央银行用于资助欧盟机构、实体、政府或机构、中央政府，地区、地方或其他公共权利部门、由公法管理的其他实体、成员国的公共企业的透支款项或其他类型的信贷款项应被禁止，上述机构借助欧洲中央银行或国家中央银行提供的债务手段而发生的直接采购也应被禁止。简而言之，欧盟禁止欧洲中央银行向政府开支提供资金。因此，欧洲中央银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欧元区不存在一种统一的财政体系，因而欧元也不存在税收驱动货币的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区成员国丧失了货币主权，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掌管，成员国政府无权要求欧洲央行对其提供资金支持。欧元区成员国无法将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配合使用，瘸腿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唯一可以利用的政策工具。在经济陷入危机时，政府通过财政扩张政策稳定需求几乎成为唯一的手段。在政府很难通过增税为公共支出融资的情况下，发行政府债务成为必然选择。商业银行却仍然能够创造出自己的

银行货币，使政府不得不向商业银行借款并付息。结果，欧洲央行支持了商业银行的借贷行为，而政府却承受债务压力。

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说，发行国债的计价单位是独立于本国金融体系的欧元，这相当于用外国货币进行本国的财政政策操作。政府赤字需借入外国货币。如果一国政府没有独立的央行可以自由开出票据，那么政府支出只能通过公开市场与私人部门在资金借贷上进行竞争，这样做的结果或是成本高昂或是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各国政府承诺的财政约束会把欧洲锁定在一种无力施救的衰退状态中。

（三）欧元区有货币主权却没有财政主权

欧盟不是美国联邦政府，欧洲央行也不是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欧洲央行在危机期间无论对利率的反应速度和调整力度都不及美国。对于同样的欧盟成员国瑞士、挪威、希腊和瑞典，欧洲央行对区域内的流动性注入也显得相对不足。欧元区决策效率低下，本国利益导向表明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欧洲市场，所谓的欧元区实际上是由具有不同规章制度和治理结构的单个市场组成的一个集合体。各国的监管机构和政府都是出于本国利益而作出响应。寄望由统一的超主权信用货币，来推动欧盟一体化甚至国家化进程，实在是逻辑颠倒。债台高筑的欧元区国家，其财政扩张的空间本来就不大，加上盟内的赤字约束规定，它们的短期内的财政增收能力有限，于是短期内的财政支出增加便体现为财政赤字的飙升。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各国纷纷进行财政救市扩张，即使是德国和法国这样强调财政平衡的国家，也不得不扩大财政开支。

由于前述的种种原因，欧洲央行等欧洲超主权机构对于债务危机的反应无非是全面紧缩。欧盟设置政府财政预算约束，欧元区还通过《稳

定与增长公约》为盟内经济体引入了强力的财政纪律约束。这限制了经济增长，无法充分调动和配置资源，极大地削弱了应对危机的能力。

一旦政府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并服从于国际债权人的利益，国债发行就变成一种危险的行径。政府为了取悦国际市场，以国外货币发行债务，政府必然会受制于国际市场，因为偿债能力将依赖于其获得外国货币的能力。政府不能再根据自己的意愿使用本国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而要听任国际市场的摆布。如果向政府销售的商品与服务是为了换取本国货币，那么会以本国货币计价。如果政府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无法通过本国货币取得，国家才会真正受到国际约束。各国发行的债券不是主权债务，因为地方政府尽管具有有限的征税权，却没有货币发行权，不能发行货币，所以其国债用欧元发行相当于用外国货币发行，因此有可能无法兑现。欧元区国家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因此，欧债危机的爆发几乎是一种必然结果，无非是时间的早晚不同而已。

（四）统一货币只能同甘，无法共苦

当然，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统一的货币使区域内的国家享受到了很多好处，在经济景气阶段，这种货币制度安排促进了区域内外的贸易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然而在经济衰退时，陷入危机的国家无法因地制宜地执行货币政策，进而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紧缩财政、增加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这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削减支出并不能改善财政预算，政府财政的紧缩，导致人们越来越难以获得足够的主权货币来缴纳税赋，税收随之下降，政府支出越来越少，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同时，对于这些负债累累的国家，增加税收会降低国

民可支配收入，进而降低内需，从而引起恶性循环。此外，增加企业税会导致资本外流，投资降低，结果不仅不能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税收总额。减少开支实际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刺激和降低该国的福利和社保，减少对经济的刺激，导致该国国民消费能力下滑，并促使国民大量增加储蓄，最后消费会进一步减少。因此，消费能力下降、财政紧缩和减少赤字最终不仅不能提高长期的偿债能力，反而会使经济陷入更深的衰退。

在欧债危机恶化的过程中，显然可以看到，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的国债利率不断上升，有些国家的利率甚至达到了高利贷的标准。如此之高的贷款利率根本不可能长期持续，借新债还旧债的过程必然难以维持。与之相反的是，美国的国债利率却低得惊人，美国 10 年期国债利率一直低于 3% 的水平。因此，美国只要提高国债上限，将有能力直接刺激消费和大量投资基础建设。而欧元区金融机构却要面临不断出现的债务危机和高额的融资成本，这些债务危机的发生必将导致这些金融机构的坏账不断增加。而欧洲在债务危机爆发，实行严厉财政紧缩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来刺激经济增长。而这一切的原因正是在于欧元并非现代意义上具有坚实财政与税收基础的货币。财政与税收的统一需要的是政治的统一，美国未来前景强于欧洲的原因正如波兰前财政部部长莱谢克所说的——“美国比欧盟有更强的政治凝聚力”。

三、欧洲的统一只是一个梦：四分五裂的欧洲

（一）欧洲合众国是一个政治神话

公元 800 年，加洛林家族的查理曼大帝统一了欧洲大陆的主体部分，

在名义上复辟了罗马帝国，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美国战略家基辛格曾说过，“假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理论上归其治理的领土确能实行中央控制，则西欧各国与他的关系或许将类似中国与其藩属，法国就相当于越南或韩国，英格兰相当于日本。”

遗憾的是，欧洲历史演变的轨迹并未朝着查理曼大帝的政治路线前进，神圣罗马帝国也未能发展成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欧洲逐渐演变成小国寡民的封建采邑制。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欧洲国家体系又形成了一种均势政治的格局。基辛格这样评价欧洲的均势格局：“中世纪的欧洲一统的美梦幻灭后，遗留下一群实力相去不远的国家。当这一群国家不得不互相打交道时，仅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是有一国变得异常强大，得益控制其他国家，最后形成帝国；要么是没有一国有足够的国力能够一统天下。在后一种情形下，最具侵略性成员的言行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抵制，取得一种权力的均衡。”

制造均势格局的方法之一是同盟，即与其他国家结盟、借助他国的资源寻求均势。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为了与英国的英镑霸权相抗衡就曾建立过类似于当代欧元的货币同盟。1865 年，在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欧洲各国在巴黎召开了一次会议，目的是要在各国采用一种统一的、普遍通行的金银通用货币。巴黎会议直接导致了以法国为核心的拉丁货币同盟的诞生，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均采用以法国货币体系为基础的金银复本位制。自 1866 年 8 月 1 日开始，各国的基本货币都称为法郎，以法国的货币体系为基础，主币的含金量都定为 0.29 克黄金或者 4.5 克白银，可以在各国间等值流通。随后，有很多欧洲国家陆续加入。拉丁货币同盟成为 19 世纪的欧盟，而法郎则成了 19 世纪的欧元。法国扩大了自己的金融主导权，而欧洲各国则能把本国货币与法国货币挂钩，以稳

定币值。

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白银过剩造成了银币的大幅度贬值。各国都以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为目标，意大利等成员国无法大量发行不足值的银币用于流通。各国廉价银币的大量铸造极大损害了法国的利益，造成银币贬值，大量退出流通。法国很快修改了协议，限制接受银币，从金银复本位改为金本位。许多国家无法再从法国获得好处，逐渐退出联盟，拉丁货币联盟随之逐步衰退并最终解体。

均势思想深入欧洲人的骨髓。欧洲国家结成货币联盟联合组成欧元区以对抗美元霸权，是均势思想在经济与金融制度上的体现。无论是均势政治本身还是同盟策略，对于强国与大国来说，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但对小国与弱国来说，只能被利用，在遭遇风暴时甚至是被抛弃。比如，19世纪的弱国波兰接连三次被俄国、普鲁士与奥地利瓜分，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弱国利益被强国出卖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

21世纪的今天亦不例外。《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欧盟委员会拥有判断一国是否存在过量赤字的权力，但是最终判定权和惩罚裁决权由欧盟理事会掌控。由于德国和法国在欧盟理事会拥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机构的实际执行力弱化，很难将财政纪律强加于大国，造成了事实上的大国与小国之间权力不对等。

《公约》规定在实践中被弃如敝履的现象成为必然的结果。2002年至2004年，法国和德国连续3年财政赤字超标，其中2003年赤字规模占GDP比例已经分别达到了4.1%和4%，2004年虽然有所改善，指标分别是3.6%和3.8%，但仍然超过了标准。2005年3月，欧盟25国财长会议通过了《公约》的修改，允许短期内赤字超过3%的上限，还规定如果每超

过这一标准的1%，就要向欧洲央行缴纳相当于该国GDP的0.25%的无息稳定存款。如果2年内财政赤字仍不达标，则将存款变为罚款。

强国带头不遵守规定，弱国必然跟进。再考虑到各国均无独立的货币和汇率政策，于是赤字财政便成为大部分欧元区国家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同时在政府赤字受限制的情况下，增发国债便成了唯一选择。结果是财政赤字和债务超标的国家不断增多，2006、2007年为4个国家，2008年增加到6个，2009年除了芬兰以外，所有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全部超标。而同盟的约束形同虚设，针对赤字超限的处罚规定从来没有被执行过。

在欧洲的政治家看来，欧元是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的远大构想的阶段性产物。2011年8月1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共同提议成立欧洲经济政府，追求更大程度的欧元区国家的共同管理。但欧洲政治统一建立在一个不牢靠的神话般的基础之上，即欧洲人都是有着共同命运的人民，欧盟是一个永远亲密的同盟。

事实上，欧洲只有大约2%的公民生活在母国之外的欧盟国家。欧洲各国之间的差异并未缩小，各个欧洲国家之间的思想与行动仍然极为不同。欧洲人民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度要远远高于对欧盟共同身份的忠诚度，大多数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时并未获得其选民的一致同意。

在一体化进程中，欧盟委员会负责政策范围内的日常管理，欧洲央行制定单一的货币政策。但是，诸如防务、外交、税收等重要政策的制定权仍然掌握在各国自己手中。一旦欧洲发生危机，各国只能在一个临时机制之上共同决定，每一个重要的决议都需要各国在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之后，达成一个相互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与协定。

一旦利益相互冲突，所谓最终妥协的协定也显得极其脆弱。1985年签订的《申根协定》规定，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典、芬兰、丹麦、意

大利等26个欧洲国家之间不再对公民进行边境检查。外国人一旦获准进入“申根领土”内,即可在协定签字国领土上自由通行。但在2011年5月,法国为了阻止来自利比亚和突尼斯的难民潮,在与意大利接壤的边境线上设立了边界管制,暂时废止了《申根协定》。2011年7月5日,丹麦甚至撤销了一些《申根协定》关于自由旅行的条款,恢复了边境检查制度。

(二)欧洲一体化表面下的“碎片化”

一方面是欧洲一体化,另一方面却是欧洲碎片化。与1988年相比,欧洲多出了16个国家,并且欧洲国家分裂的趋势愈演愈烈。法国有科西嘉、布列塔尼激进独立运动,德国有巴伐利亚独立运动,英国有苏格兰民族独立运动,意大利有北方独立运动,西班牙有加泰罗尼亚、巴斯克独立运动。

位于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在1532年前被法国吞并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布列塔尼人是凯尔特后裔,而法国人主要是日耳曼后裔。时至今日,布列塔尼民族主义者仍然认为,根据民族自治的原则,该地区有权获得完全的政治独立。

德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最大的州巴伐利亚州原本是一个独立王国,1870年被铁血首相俾斯麦武力强行合并到德意志帝国。现在巴伐利亚仍然有着自己的文化独特性,许多当地的居民都强调自己和德国人的区别,并且出于优越心理,希望能够独立,并且强调自己的方言。2009年9月的民意调差显示,近1/4的巴伐利亚人希望独立建国。

英国主要的两大民族是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英格兰人主要是日耳曼后裔,而苏格兰人则是由凯尔特后裔组成。苏格兰在1707年与英格兰

合并，但保留了独立的司法体系。1999 年，英国政府恢复了苏格兰地方议会，在诸多内政问题上拥有自治权。2006 年的民意调查显示，51% 的苏格兰人准备投票支持独立，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中独立出来，只有 39% 的民众反对独立。2012 年 1 月，新获选的苏格兰民族党组成的苏格兰自治政府决定，苏格兰将在 2014 年秋天举行独立公投。一旦独立成功，苏格兰将独享北海油田和渔场的经济利益。

表面上维持着民族国家的形式，但事实分裂的国家有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首府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是西班牙最富有和最高度工业化的地区之一，当地人口约占西班牙全国的 10%，但 GDP 与税收却占全国的 20% 以上，流入西班牙的直接外国投资有 1/4 以上直奔该地。人口仅 600 多万的加泰罗尼亚人是西班牙的一支少数民族，他们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西班牙人，大多数的人都有着强烈的民族独立感和自豪感。加泰罗尼亚拥有自己独立的加泰罗尼亚语，这是与西班牙语不同的独立的欧洲语言。1979 年，加泰罗尼亚实现全面自治，拥有独立的公共机构与政府。1993 年，加泰罗尼亚议会规定幼儿园与学前班只允许使用加泰罗尼亚语。2006 年 6 月 17 日加泰罗尼亚举办地方自治权扩张的公民投票，结果赞成比例达 73.9%。

2008 年，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夫人韦罗妮卡 · 拉里奥都语出惊人地宣称："意大利从来都不适合成为一个国家，从来没有达到过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条件。现在意大利的统一已经不再有意义……北方联盟代表意大利最富饶的地区提出了具体诉求。这个地区已经受够了一再被其他地区拖后腿的局面。"其实，意大利自从罗马帝国覆灭，一直都处在分裂状态。历史曾长期存在过撒丁王国、伦巴第王国、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两西西里王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教皇国、蒂罗尔公国等诸多国家

以及众多的自由城邦。这些独立地区在习俗、文化甚至语言上都有着很大差别。现代意大利则完全是近代民族主义者强力撮合的结果,而文化心理上并未统一为完全的民族国家。

意大利南北地区在经济上有明显的差异。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伦巴第地区、博洛尼亚等北部地区工业发达,在富裕程度和公益设施上可以和法英等国相媲美,意大利南部地区经济落后,人均收入低,失业率高,只能依靠罗马政府巨额的财政转移救济来过活。20 世纪 80 年代末,米兰周边的伦巴底地区的人均 GDP 是全国人均 GDP 的 132%。意大利南方原先是独立的那不勒斯王国,面积占全国的 40.8%,人口占全国的 36%,但 1999 年人均 GDP 只是中北部地区的 54.9%。

奉行分裂主义的意大利政党北方联盟赋予意大利北部地区以核心价值,并以北方的政治文化来构建帕达尼亚民族(Padania)。1996 年 9 月,北方联盟宣布:“北方地区成立帕达尼亚共和国,帕达尼亚独立,并拥有主权”。北方联盟公开发表了《帕达尼亚独立宣言》和《国家的基础》等纲领性文件。文件宣称:在地理位置上,帕达尼亚应该像德国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一样,是中欧的一部分,而不是意大利的一个部分。意大利北方人的血统主要源自前罗马帝国的凯尔特人的部落,而且混杂了深厚的伦巴底人的血统、北方的语言与法语、加泰罗尼亚语、葡萄牙语等都属于同一语系,而意大利中部地区的人们主要是伊特鲁里亚人血统,而南方人是古希腊人后裔。

北方联盟如今在意大利政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北方联盟的积极推进下,意大利正在进行联邦制改革,赋予地区政府更多的权力。比如,地区政府可以在其权限范围内同其他国家签订条约,只是其形式需要在国家法律的管理之下。地区政府拥有大部分的行政权,仅仅在下一级

政府无法或者没有提供行政服务或履行行政职权时，下一级政府提出请求或者市民提出申请，由上一级政府替代行使该行政职权。中央政府放弃对地方的人事与财政的指令，更多地通过司法途径去实现对地方的约束。地区政府拥有独立赋税，享有财政收入和支出自治。地方政府拥有自己的公产，可以进行投资开发，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债券不予担保。目前意大利维持表面统一的只是北方向南方的财政转移，一旦联邦制改革完成，南北方在财政上完全独立，意大利的分裂就变为既成事实。而所谓联邦制改革可能只是意大利走向独立或者分裂的一个步骤和工具。

比利时就像一个缩微版的欧元区。比利时全国人口约1000万，其中北部和荷兰人同宗、说荷兰语的弗莱芒人约占全国人口的56%，南部讲法语的瓦隆人约34%，还有极少量说德语的人。欧盟与北约总部所在地的布鲁塞尔地区较为特殊。布鲁塞尔85%以上的居民讲法语，但四周被弗莱芒地区完全包围，成为法语区的一块飞地。这地区的人口占全国的10%，当地同时使用荷法两种语言。

20世纪60年代以前，瓦隆地区由于盛产煤炭，钢铁业一度非常繁荣，经济发达，人均收入较高，北部弗莱芒地区则以农业为主，贫穷落后。瓦隆人看不起弗莱芒人，政府高层、学术精英和上流社会几乎全部被法语区的人把持，法语区的贵族在19世纪控制了荷兰语区安特卫普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队将领几乎都是瓦隆人，下层士兵则大多是弗莱芒人。

“二战”结束后，弗莱芒地区经济在港口运输、贸易、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带动下，迅速发展，而瓦隆地区却因为煤炭资源耗尽，钢铁业衰落，而一蹶不振，只能靠旅游和农业维持，富裕程度明显落后北方。弗莱芒人认为，讲法语的瓦隆人在依赖他们，北方应甩掉南方贫穷而讨厌的瓦隆人。民意调查显示，1/3的弗莱芒人赞同将他们居住的弗兰德地区分裂

出去，自成一国。瓦隆人希望保持比利时的统一，维持中央政府主导、统筹财政的施政体制。因为他们需要从弗莱芒得到财政补助，瓦隆地区的失业率为17%，是弗莱芒地区的2倍。

弗莱芒地区和瓦隆地区各有5省，但双方悬而未决的是布鲁塞尔大区的划归问题。弗莱芒人要求将布鲁塞尔划归弗莱芒地区，但遭到瓦隆人居民的强烈抵制。2009年11月比利时组成新一届政府，但因布鲁塞尔及其周边选区划分谈判长期未果，2010年4月政府集体辞职。从2010年6月13日提前举行国会选举至2011年1月，主张弗莱芒独立的政党“新弗莱芒联盟”与瓦隆人的政党就组阁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导致比利时已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中央政府，南北地区已实际分裂。

由此看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完全是欧洲政治精英们的一相情愿，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与不断的碎片化才是欧洲演化的自然轨迹。作为欧洲一体化图腾的欧元，既不能促进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不能掩盖欧洲日趋分裂的趋势。因为政治统一是货币单一化的基础，以货币统一来促进政治统一，未免是本末倒置。历史上从未有过未经武力整合仅依靠经济利益的吸引获得政治统一的先例。建立欧元区以抗衡美元霸权，就好比东汉末年袁绍纠结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但各路诸侯都怀私心，不能团结协作，联军变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最终在董卓军的攻击下，联军必然瓦解，诸侯们将分道扬镳。

四、欧元区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一）欧元区也有“三大差别”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差距较大，区域之间

发展极不平衡。其中，德国、意大利北部地区、法国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较为发达，德国的 GDP 占欧元区 GDP 总规模的 20%，德法意三国占比更是高达 50%。而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北部地区等边缘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较为落后。

有一种声音认为，这种区域差距主要是因为社会文化与宗教的差别。其实，这种观点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与事实依据。比如就宗教来说，意大利南北方均信仰天主教，但北方经济发展水平不亚于英法，而南方则贫穷落后。再如比利时北部讲荷兰语、信仰新教的佛莱芒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一直远远落后于其南部讲法语、信仰天主教的瓦隆地区。再如文化问题，早期人们都认为，儒家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障碍，但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发展的现状很快就让这种臆想的观点销声匿迹，人们纷纷开始探讨起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其实，从来不存在停滞不变的文化，所谓的民族文化都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此，文化与宗教因素并非区域发展水平产生差距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欧元区各国经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是历史造成的。换言之，即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比如欧元核心国德国在 19 世纪原本是一个落后国家，恩格斯就曾讲过巴伐利亚存在着大量生产假冒伪劣山寨货的小作坊。而德国通过教育走出了强国之路。早在拿破仑的军队入侵的时候，普鲁士威廉三世就说过："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普鲁士建立起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现代大学。19 世纪 70 年代铁血首相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又制定了职业义务教育培训法规并一直延续至今。全民教育培养了高素质国民，大学给德国带来了创造和发明，职业教育为产业化提供了大量工程师与技师。到第二次工业革

命时，德国终于站到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巅峰，而当年闭塞落后的巴伐利亚地区早已成为德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二）欧元区的“发展中国家”

从近现代历史来看，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与意大利南部在欧洲一直都是较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希腊数百年来都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直到1821年才独立建国。独立之后，希腊一直都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穷到连很多欧洲人不愿承认希腊人是欧洲人。直到现在，希腊的经济基础都非常薄弱，工业极其落后，主要以外需拉动的国际旅游业与国际航运业为支柱产业。2010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达到52.57%，其中旅游业约占20%，而工业占GDP的比重仅有14.62%。

陋室空屋，当年花满堂；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西班牙与葡萄牙都曾是烜赫一时的在海外大幅扩张的殖民主义大国。在那个时代，很多西班牙与葡萄牙人前往美洲寻找黄金，企图一夜暴富。这当中包括了很多技术高超的工匠和专业技术人才。一方面，人们想通过淘金一夜暴富，不愿从事工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殖民地的发展又造成对日常商品特别是日用手工业品的大量需求，而西班牙本国生产能力远远无法满足这种需求。西班牙人开始大量进口英国、荷兰的商品，他们把英国与荷兰当成了自己的生产基地，英国、荷兰两国的经济也因此而繁荣起来。

由于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大量移民美洲，国内劳动力紧缺，人员工资大幅度上涨，这样就带动了西班牙本土产品的价格上涨。同时因为西班牙大量进口其他国家的商品，这些商品随着进口量的增长，价格越来越便宜，产品质量也越来越好。这使得西班牙本土的普通手工业者几乎无法与外国竞争者进行抗衡，结果是手工工场纷纷倒闭，劳动者失去工作。那

些在美洲新大陆大发横财的社会上层人士与冒险家，他们手中握有大量黄金，急切地要得到奢侈品来满足他们的穷奢极欲。结果，西班牙本土的手工业放弃普通消费品的生产，转而生产奢侈品。西班牙人从美洲掳掠来大量的黄金，使得他们在当时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富国。葡萄牙与此类似。

西班牙贵族与有钱人消耗财富的方法就是消费奢侈品，西班牙政府消耗财富的方法则是战争。西班牙人把生产交给其他国家，自己只管战争、消费和不断的掠夺。西班牙人习惯于征服和劫掠，习惯于短时间内得到大笔金钱与土地，丧失了勤劳工作的美德。他们轻视平凡而扎扎实实的劳动，瞧不起从事劳动的普通人。当时的人这样评价西班牙人："他们从不种地，也不做农场工人、木匠或泥瓦匠。他们都寻求轻松的行业或寻找少做工作就能糊口的生活方式。西班牙人认为，与其劳动不如忍受饥饿和其他痛苦。他们把工人和奴隶等同看待。"

直到今天，西葡两国的工业基础都很薄弱。比如葡萄牙主要依靠服务业来推动经济增长。2010 年，葡萄牙农林牧渔业只创造了 2. 38% 的增加值，工业创造了 23. 5% 的增加值，而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达到了 74. 12% 。而西班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靠占 GDP 11% 的旅游业和债务消费尤其是占 GDP 16% 的房产消费来拉动的。

爱尔兰属于凯尔特文明，其自然资源贫乏，工业基础薄弱，自古便受到英国人的盘剥。16—17 世纪，英格兰开始征服爱尔兰。1801 年，爱尔兰正式并入英国。在英国统治下，大部分爱尔兰地主都迁移到英格兰，剩余的贫困农民为了养活自己，不得不大量种植土豆，导致爱尔兰的农作物高度单一。结果在 19 世纪中后期，土豆连年歉收，爱尔兰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当地人口减少了至少 1/4，超过 100 万的爱尔兰人逃亡海

外。流浪海外的爱尔兰人由于生活贫困,不得不大量从事各种低下的职业或者走上犯罪道路。

钱钟书在《围城》中曾写到,“他住的那间公寓房间现在租给一个爱尔兰人,具有爱尔兰人的不负责、爱尔兰人的机智,还有爱尔兰人的穷。相传爱尔兰人的不动产是奶和屁股;这位是个萧伯纳式既高且瘦的男人,那两项财产的分量又得打折扣。”在欧美,爱尔兰人成为“马贼、乞丐和小偷”的同义词,长期与犹太人、吉普赛人并列受到欧美各国的严重歧视。

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爱尔兰都与19世纪一样,仍是一个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国家,经济极为落后。爱尔兰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迅猛,被誉为“凯尔特之虎”。但这头虎的荣誉来得并不光彩。爱尔兰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帮助美国避税实现的。爱尔兰政府将企业税率降低到12.5%以吸引外商投资。而美国的企业税率是35%,法国是是33%,德国的是30%。低税率政策十分有效。英特尔、微软、戴尔等各大公司纷纷登陆爱尔兰,利用在爱尔兰分公司逃避美国的税收。这些公司逃税金额大约占到爱尔兰GDP的20%。

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与爱尔兰这些落后国家先后都加入欧盟与欧元区。但这些国家与法德等先进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差距过大,欧洲不得不因地制宜,根据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同实施“多速欧洲”战略:各国都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必须由德法两国加上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3国共同组成硬核,由该硬核为欧元区发动机推动边缘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推动欧洲的一体化。

(三)单一货币加剧了欧元区的结构性失衡

表面上看,欧元区的“多速”战略可以保证将发展水平不一的各国捆

绑在一起。但实际上,欧元反而使得这些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国际著名智囊机构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特德·杜鲁门一针见血地指出:“单一货币其实制造或加剧了欧元区内部的严重失衡。消灭汇率和实施低利率货币政策,极大地提升了德国经济和出口竞争力,德国经常账户盈余迅速飙升。然而,德国人民和政治家们没有认识到,这种似乎一夜之间天上掉下来的利益是昙花一现,他们终将付出代价。欧元区必须作出抉择。要么继续前行,推进经济政治整合,直至建立欧洲财政和政治联盟,要么退回来,建立某种较为紧密的欧洲邦联,并重新引入独立主权货币和汇率机制。”

如前文所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国对工业制品进口依赖度较大,其出口产品以农产品、资源性初级加工产品以及金属制品为主,缺少附加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经济严重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旅游业和航运业等附加值较低的低端产业。随着拥有充沛而廉价的劳动力储备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金砖四国与东欧国家的兴起,全球中低端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转移。与这些地区相比,欧元区落后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过高。而这些国家在短期内无法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它们的制造业竞争力大幅下滑。

对于具有货币主权的国家来说,如果出现国际收支失衡,可以通过调整汇率本币贬值来降低工资和生产成本,以提高本国商品的竞争力,从而扭转贸易逆差。但由于欧元区内实行单一货币制,欧元区落后国家无法通过贬值本币来增加出口竞争力并调节贸易赤字。比如葡萄牙的布匹价格要高出欧元区之外的国家波兰、土耳其等非欧元区国家的30%以上。换言之,这些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被严重高估。据测算,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实际有效汇率被高估超过10%。

站在德国人的角度来看，欧元区落后国家从德国借钱买德国商品。如果德国停止借钱，这些国家就无法还钱，德国人要么收不回贷款，要么得借出更多的钱。可事实恰恰相反。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德法等发达经济体人口开始老龄化，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内需开始不足。在成立欧元区之后，德法等核心国利用制度的原有优势、技术和资金优势，享受着单一货币政策的好处。其中受益最大的是德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德国之外的其他欧元区国家也拥有贸易顺差，其规模通常是德国的 3～5 倍，但加入欧元区后，德国由于生产率较高，贸易顺差迅速扩大，其他国家则进口增加出口减少，有些国家甚至沦为贸易逆差国家。

现在德国对欧出口高达出口总额的 70% 左右，但整个欧元区的进出口总额却保持基本恒定。因此，德国的顺差大部分来源于欧元区内部的贸易。通过对欧洲尤其是占德国出口总额 40% 的欧元区国家的出口大大拉动了德国的经济增长。2011 年，德国、荷兰和卢森堡的经常项目账户盈余都超过 GDP 的 5% 以上，日本的这个数据仅为 3.6%，俄国是 4.8%，而中国是 5.2%。然而那些欧元区落后国家的出口则越来越疲软，顺差逐渐下降，并在 2005 年变为逆差。

一国贸易顺差表示本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超过本国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反之则本国需求超过生产。葡萄牙、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等国便是需求超出生产的典例。在 2008 年之前，欧元币值稳定，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融资成本即利率较低。2001—2007 年，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欧元区的边缘国家的 10 年期国债与德国国债的息差一直保持在 0.5% 以下。这意味着这些国家能享受来自德法等国成本低廉的资金来维持经济增长。换言之，就是尽管这些债务国长期贸易逆差，但有来自贸易顺差的债权国的欧元资金不断流入，可以支持其经济增长和民众消费水平的

提高。而这些流入资金又通过贸易顺差再回流到债权国，从而形成一个恐怖的不可持续的欧元区内国家的经济循环。

廉价欧元资金在欧元区内部循环，使欧元区落后国的民众享受到了高收入与高福利的生活。希腊、西班牙等国男性职工退休后所领取退休金，竟达到几乎人均年收入的10倍以上，远高于英美等国。但是，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并未同步提升，导致国际竞争力就业率的同步下降，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贸易逆差，使得经常账户账目日趋恶化。结果，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希腊甚至包括意大利的经济都严重依赖于欧元区债权国的资本借贷来支撑。

因此，单一货币加剧了欧元区的结构式失衡。核心国家，尤其是德国从欧元区获得了充足的市场、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和债权，保持并发展了经济的强势地位。而在欧元区形成之后，落后国的竞争力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一直下降，只要外部经济环境有一点风吹草动，危机就会随之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债权国资金大举抽离债务国，这样，在欧元区内部的资金流动中断，债务国的资金逐渐被抽干，主权债务危机一触即发。美国人的对欧金融战不过是提前引爆了危机而已。

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央行通过借贷来向德国央行借款付账。希腊4国央行在欧洲央行的净负债大幅攀升，从2008年的不足500亿欧元迅速扩张到2011年3月的3000亿欧元以上。与此同时，德国央行在欧洲央行的净资产也迅速攀升，截至2011年3月超过了3000亿欧元，与4国的负债基本相当。欧元区成员国央行之间这种的借贷关系，相当于欧洲央行印钞供债务国还债并消费，而这些资金最终还是会有很大一部分回流到债权国，尤其是德国。因此，如果欧元区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使美国停止攻击欧元，欧债危

机与欧元危机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五、房地产泡沫放大了主权债务风险

在那些欧元区边缘国家，来自债权国过多的欧元资金追逐本国过少的投资项目，必然会导致资产泡沫。由于这些债务国既不是国际或区域金融中心，也缺乏发达的资本市场，结果房产业便成了欧元资金的最终归宿。“欧猪五国”均有程度不同的房产泡沫，其中尤为严重的是爱尔兰和西班牙。

（一）爱尔兰的房地产泡沫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低税率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爱尔兰多年保持贸易顺差和高速经济增长，人均GDP也比意大利、希腊、西班牙高出20%，更是葡萄牙的200%。截至2009年，爱尔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金额的存量达2100亿欧元，同年的贸易顺差是387亿欧元。但经济高速增长中积累的资本却被低效甚至无效地配置在房地产业上。

房产业过热少不了爱尔兰银行信贷的大幅扩张。据测算，爱尔兰房地产贷款每增加1欧元，房价就上涨1.13欧元。一方面，银行信贷的增加会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但过度的话将会适得其反地助长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另一方面，房价飙升会鼓励银行作出不当的反应，增加对房地产业的放贷额度与比例。此外，爱尔兰既不征收财产税，也允许用个人支付的银行贷款利息来抵消个人所得税。这对人们投资房产业有鼓励与刺激的作用。

1975—1994 年,爱尔兰整个国家信贷供应量为当年 GDP 的 40%,2008 年却达到 300%。加入欧元区后,爱尔兰享受了欧元区内低利率的好处。2008 年之前,欧洲央行以 1% 的利率向爱尔兰银行提供 3 个月期无限制贷款,爱尔兰金融机构 10% 以上的流动资金均来源于此。此外,因为爱尔兰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其他欧元区国家,欧洲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使爱尔兰实际利率极低。

在这种情况下,爱尔兰银行大举借债和放贷。1997 年,爱尔兰银行信贷供应量为年度 GDP 的 60%;到 2008 年则达到 200%,几乎是其他发达国家的 2 倍。2007 年,金融业资产负债表规模相当于 GDP 的 1400%。大部分银行业贷款流向了开发商和个人房贷。2008 年,银行对开发商的贷款就达 2000 年全年贷款的 140%,个人房贷则是 2000 年全年贷款的 175%。

宽松的信贷像洪水一样推动着房价上涨,由此带动地价上涨从而进一步刺激房价上涨,最终使得房价与地价齐飞,投机共暴利一色,形成房产、土地与银行之间的一个正反馈过程。充足的流动性刺激房价飙升,从 1995 年到 2006 年,爱尔兰新房价格每年平均增长 12%,房价平均上涨了 3~4 倍,房价相对家庭年收入的系数也从 4 增长到 10。房地产泡沫本身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特点,房价的上涨又刺激银行业投放更多的贷款给开发商和个人。

2006 年,用于购买土地的银行贷款相当于当年爱尔兰 GDP 的 2/3。同年,仅有 400 多万人口的爱尔兰新开发了 9 万多幢住宅楼。从 1996 年到 2006 年,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平均房价增长 360%,都柏林之外地区平均房价增长 253%,爱尔兰全国平均房价增长 280%。1993 年,房地产业就业人数是全国就业人数的 6.5%,2007 年,上升到 13.3% 这样一个令人

吃惊的数字。

2008 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爱尔兰房地产泡沫瞬时崩溃。到 2009 年,爱尔兰全国的房地产价格比最高点的 2007 年下跌了 37%,都柏林下降了 42%。房地产泡沫破灭引起爱尔兰经济的急速恶化。从 2008 年起,爱尔兰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连续负增长,失业率到 2011 年 12 月高达 14.5%。银行资产也大为缩水,仅 2010 年整个银行业的损失就高达约 350 亿欧元,占爱尔兰年 GDP 的 20%,银行资产缩水 70%。2010 年的房价比 2006 年房价最高值下降了 35%。

采用浮动贷款利率的爱尔兰贷款者还款变得非常困难,给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发放巨额信贷的银行业因此而受到严重打击。自 2007 年 3 月起,爱尔兰银行业的股票价格开始下跌,整个银行体系濒临崩溃。为了拯救陷入困境的银行业,爱尔兰政府成立国家资产管理署(NAMA),以折扣价格购买银行向房地产开发商或购房者提供的贷款,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不良贷款。NAMA 以一种由政府担保的债券购买银行的贷款。NAMA 向银行注入巨额资金,将银行债务转嫁到政府身上,从而增加了财政负担,最终引发了爱尔兰主权债务危机。

(二)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

在欧元区单一货币体系中,西班牙也享受到欧元区低利率政策,西班牙利率从 1995 年的 11%下调至 2003—2005 年的 3.5%左右。房地产业受到低利率刺激而飞速发展,成为西班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西班牙用在房产投资的资金约占其 GDP 的 7%,而法国仅为 2%。2007 年,房地产业提供的岗位占整个西班牙劳动力市场的 13%,而这一数据在德国仅为 6.7%,在英国仅为 8.5%,中国约在 6%左右。1999—2007 年,西班牙

地价上涨了500%,同期欧洲新增房产的60%都在西班牙。

随着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西班牙地方政府通过城市开发计划、改变土地性质,允许开发商建设,来收取丰厚的土地出让金,形成了有西班牙特色的土地财政。在西班牙,与爱尔兰一样,买自住房的贷款利息支出都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一些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对购房又附加了许多优惠。在政策的支持下,房地产业迅速成为西班牙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建筑及相关产业对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到18%,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贡献更是达到了50%以上。

但值得警惕的是,西班牙空置房数量在欧元区国家中最多,空置率达15%,是欧盟平均水平的3倍,即在所建的2100万套住房中有300万套为空置住房。西班牙政府也预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防止房产过热对国民经济造成恶劣影响。西班牙政府认为,房价由供需决定,因此只要供应更多的土地让房产数量增加,房价便能下降。在这一思路下,西班牙早在1998年便颁布了《土地自由法》以促进更多的土地被出让来建造房产。但是,当房产作为金融品时,其价格不由供需平衡决定,而是像股票、债券一样采用资本资产定价的方式。简而言之,正是因为房价不断升值才促使人们产生房价升值的预期,刺激投机者为赚取资本利得即增值回报而购买房产。因此,供给更多的土地在很多情况下不仅不能压制房产泡沫,反而助长了泡沫的膨胀。

庞氏骗局一般的房产泡沫经济的结局是注定的——泡沫破灭与经济衰退。在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下,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西班牙失业率又重新回到了20%以上,其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只有一半人拥有工作。西班牙金融货币研究中心的两位研究员在《房地产泡沫:原因和责任人》一文指出:“目前这一代西班牙人的积蓄将付诸东流,因为他们把自己的

钱全部投入了不动产中。现在房价正在猛跌,他们或为子女或为自己年老后所做的种种安排看来都要化为泡影了。很多人已经负债累累,根本无力偿还贷款。我们花费了大量金钱建造了一些本不应该建的房子,没人知道将来这些房子能值多少钱。这些住房要么常年闲置,要么每年只有少数人去住上短短的几天。人们买它根本不是因为居住需要,纯粹是为了日后升值而进行的投资性购买。银行借了很多钱给房地产公司,现在银行没法收回贷款。要是能倒闭的话,这些银行全都要倒闭。政府通过土地圈售获得了大笔并不稳定的收入。与此同时,普通市民也开始享受个人高档消费。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之前买的车根本不应该买,因为我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有钱。整个社会生产现状也已经完全乱了套。最后,一旦这种短期不持久的行为突然停止,经济便出现倒退,各种棘手的后遗症也层出不穷。"

西班牙金融机构在向购房者发放抵押贷款的同时,也在为房地产商和建筑业商发放贷款,空置住房的存在造成售房延期,还贷延迟不可避免,金融压力增大。抵押贷款利率的上调和房价的攀升使购房者还贷成本相应增加,无法按期偿贷的风险加大,银行的呆坏账增加。西班牙家庭抵押贷款负债已达到可支配税前收入的110%。2009年,西班牙所有银行贷款中对房产商和买房者的贷款达到1.11万亿欧元,相当于西班牙GDP的105%,占到了西班牙私人部门贷款的60.3%。其中约5800亿美元发放给房产商,这些资金中又有2400亿美元是不良债务。大量开展了按揭房贷的45家储蓄银行,正受到不良贷款上升的威胁。这些储蓄银行大多为地方政府所有,总共9000亿欧元的贷款中有70%是在房地产部门。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已经让主权债务违约保护成本增加了50%。

（三）希腊的房地产泡沫

希腊与爱尔兰、西班牙相似，欧元区低廉的信贷资金的流入，以及大量欧盟援助资金的注入，促使房产过热。希腊90%的家庭财富以房产形式存在，房产投资占希腊投资的20%左右。2006年，希腊房价已是1999年的2倍。2001—2006年，首都雅典房产涨幅约30.5%，希腊其余地区涨幅则超过50%。到2008年，希腊房产泡沫破裂，房价平均下降12%，并出现严重滞销。大量房产商破产倒闭，仅2010年1—5月，希腊房产联合会会员中有734家会员倒闭，约占会员总数的5%。

（四）葡萄牙的房地产泡沫

葡萄牙房产泡沫要轻微一些。1988—2007年，葡萄牙房价才上涨了208%，年均增长约5.8%。自2007年末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葡萄牙银行开始降低购房信贷额，而市场上房源越来越多，买房人数却越来越少。2010年1月，葡萄牙可售房产为22.3万套，其中66%为二手房。为了刺激购房需求，葡萄牙银行房贷利率自2008年12月开始连续下调，从5.976%下降到2010年3月的1.873%。在这一政策的刺激下，葡萄牙房产市场有所企稳，但仍有一些地区房价大幅下跌。比如在葡萄牙度假圣地埃斯特里尔，超豪华别墅的价格从2011年年初到2011年9月大幅下跌了57%。

从这些国家的房产泡沫兴起与衰落的过程来看，欧元区落后国家加入欧元区后，不仅未能利用德法等核心国流入的充裕资金来推动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国际竞争力，反而利用现代金融工具的杠杆作用以债务经济刺激房产业与银行业的繁荣，最终造成严重的资产

泡沫,从而放大了主权债务风险。爱尔兰如此,西班牙如此,希腊和葡萄牙也是如此。

六、德法英三国的欧元博弈

欧债危机恶化到一定程度将导致欧元的崩溃与欧盟的解体,最终必将引发欧洲灾难性的后果,对全球经济也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对德法两大欧元区核心国来说,这样的结局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德法之间达成基本共识,就是尽一切力量拯救欧元,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德法并不是铁板一块,两国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在欧债危机的救援问题上始终保持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德国、法国都是一体化的受益者。要维护这个一体化体系的稳定,德法需要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付出真金白银。但关键在于,德法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来维护欧元区的稳定。比如对欧元区债务国再提出的发行欧洲共同债券的请求,德国与法国均持反对态度。

欧盟委员会早在2009年就建议发行欧洲共同债券来取代主权国家的政府债券,藉以避过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欧洲共同债券由欧元区统一发行,17个成员国为该债券提供共同担保并停止发行各自的国债,从而降低希腊、西班牙等债务国的国债利率。但是,欧洲共同债券名义上是建立在欧元区成员国共同担保的基础上,实际上却仍旧是由信誉好、偿债能力强的国家,即德法两国分担债务,提供担保。就德国来说,引入欧元债券意味着利息支付将增加2.3%,每年将多付470亿欧元利息。欧洲共同债券显然对欧元区债务国更有利,欧元区债务国可以支付比以前低的

利息。而德国、法国等实力较强的国家却不得不受到限制和牵连。

（一）德国的算盘

德国在欧洲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德国不像英国有英吉利海峡的天然阻隔，也不像西班牙、法国有第比利斯山脉作为自然屏障。德国处于欧洲腹地，是欧洲邻国最多的国家，也是欧洲最重要的枢纽。其东临波兰、捷克，南接奥地利和瑞士，西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为邻，北与丹麦接壤，并与北欧国家隔海相望。因此，德国国力虚弱时，必受到周边国家的冲击而震荡，其强盛时，必谋求欧洲的主导地位。

欧元创建伊始，法国尚能与德国平起平坐。但世易时移，欧元区现在实际上变成了德国主导的单一货币联盟。欧洲领导人们纷纷来到柏林协调立场、寻求支持，一时间，柏林成为欧洲大陆外交活动中心。德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将法国甩开，成为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并通过推动欧洲财政一体化来重塑其政治大国的地位。

法国试图保持其在欧元区的领导作用。其通过改革国内劳动力市场准则，提高社会效益来维持法国与德国主导的货币集团之间的联系。当然，法国并未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把自己捆绑在德国的经济战车之上。以往在处理欧洲事务中，德国有意同法国保持微妙平衡，法国发挥政治主导作用，德国则贡献经济实力。可如今法国经济不振，欧洲所有目光都投向德国。法国正在考虑建立一个围堵德国的中欧联盟。2011 年 11 月，英国和法国在伦敦签署为期 50 年的全面军事合作协议，英法两国的陆海空三军都将全面联手，并共同研发和试验核武器。法国试图通过和英国加强军事关系以制衡德国。

德国救援危机的愿望没有法国强烈，原因在于德国是唯一在欧债危

机中获得利益的欧元区国家。虽然占德国出口份额最高的欧元区成员国对德国货的需求下降,但欧元贬值让德国货在欧元区外的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2011 年,欧元对美元贬值3.1%,对日元贬值更是超过8%,德国出口额大幅增加了 8.2%。而投资、消费增长率分别为 6.5%、1.5%,从而使得德国 GDP 增长率达到了 3%。投资者对其国债需求强劲,以致该国首次以负利率发行国债。德国政府能以 -0.01% 的利率发行约合 50 亿美元的为期 6 个月的国债。换言之,购买德国国债的人借钱给德国政府,还得自己倒贴利息。

此外,德国已向原民主德国地区投入了 1.3 万亿欧元,2017 年前还需每年投入 1000 亿欧元左右。2000—2009 年,德国名义工资年均上涨 2%,而实际工资却下降了 4.5%。1999 年,意大利工资水平低于德国,而今意大利单位劳动力成本已比德国高出 25%。欧元建立之初,欧洲国家福利水平,以意大利为 100,希腊为 69,葡萄牙为 74,西班牙为 82,法国为 104,德国为 109,卢森堡最高为 174,而今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福利水平已经赶上德国。显而易见,遵循严格的财政纪律而简朴度日的德国民众极不愿意毫无条件地为享受高福利、高工资的欧元区落后国提供援助。德国民意调查显示,2/3 的选民反对出资救助希腊。因此,德国人手上的选票决定了德国政府不可能毫无保留地以自己手上有限的财力为欧债危机大方买单。

欧元区的建立造就了德国经济极高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德国每 3 个工作岗位中就有 1 个与出口有关。如果没有出口的话,德国 GDP 增长率至少降低一半。德国出口产品的单位生产时间所创造的经济附加值在 1995—2007 年 12 年间提高了 45%,大约为意大利 6.6% 的 7 倍。同时,如果没有欧元,德国马克现在面临的升值压力不会

比人民币小，而一个弱而不倒的欧元给德国的出口贸易带来了巨大的优势。从根本上来说，欧元区是德国的根基所在。

但是，如果不能遏制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甚至出现欧元区解体等极端情况，无疑将会给德国带来巨大的打击。在希腊的国债买主中，德国银行占了9%。德国的银行是爱尔兰的最大债权人，给爱尔兰的贷款总额达1130亿欧元，占用了德国银行总资本的1.8%。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德国都无法独善其身。欧元区崩溃意味着，德法两国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欧洲一体化也将毁于一旦，而两国尤其是德国凭借欧元区的整体实力所获得的国际政治地位将随之丧失。因此，德国尽管并非心甘情愿但却不得不救援欧债危机。

德国的救援有着严格甚至是严厉的前提条件。德国坚持对外援助都以国家为单位，即每个国家有权利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援助条件。这样，德国就能够迫使他们采取几乎做不到的紧缩政策，来使他们符合欧元区标准。这就意味着他国的财政预算案必须先确保获得德国国会预算委员会的审核，这成为德国法定的援助条件。由此可见，德国企图借债务危机加强对欧元区国家财税权力的监管，甚至推动欧元区更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盟建立。意大利、西班牙等其他传统欧洲大国显然难以接受这样干涉内政的条件。德国一直追求财政平衡、货币从紧的政策，并要求法国也跟上。德国认为法德都应尽快将各自的财政预算赤字压缩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这样才能使欧元重趋稳定。

（二）法国的算盘

法国经济实力远弱于德国，本国主权信用等级也遭降级。法国极为担心财政紧缩将严重挫伤本国经济。因此，法国反对德国的紧缩政策，而

要求主要来自德国的援助要以欧元区全体国家的名义，即共同的条件、共同的责任，并以此为契机，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欧元区经济政府的权力中心，并建议欧元区首脑每两个月召开一次首脑会议来制定欧元经济政策，从而让法国能联合欧元区债务国共同对欧元区经济政策提出符合法国利益的要求和对策。

法国是坚决支持对危机国实施救援的，因为法国银行持有大量的欧元区债务国国债，如果这些国家违约的话，法国的损失将十分惨重。法国主张让欧洲央行出手大规模救助受困国家。由于欧洲债券市场动荡加剧，法国借贷成本不断上升，倾向于欧洲央行加大对债券市场的干预力度。法国预算部长兼政府发言人佩克雷斯表示："欧洲央行职责是确保欧元和欧元区金融系统稳定。我们相信，欧洲央行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欧洲金融稳定，就像2008年帮助支撑欧洲银行体系那样。"法国认为，为保持欧元区完整，成员不至于出现破产或违约，欧洲央行必须要做最后贷款人。

但德国反对欧洲央行通过大规模购买债券在解决欧债危机中发挥更大作用。德国总理默克尔宣称，"从欧盟条约看，欧洲央行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德国将顶住要求欧洲央行在应对债务危机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压力，恢复市场信心的唯一办法，是落实已达成的经济改革措施，并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欧洲政治联盟。"德国央行执行理事会理事鲁道夫·邦穆勒同日发表讲话称，欧洲央行购买成员国债的计划，会将更多私营部门风险转移给各经济体政府及纳税人。

（三）英国的算盘

不管法德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有多大，两国的根本利益都与欧元共存

亡。但英国却大为不同。欧债机爆发以来，欧盟各国奔走呼号，英国却态度极其冷漠，袖手旁观。英国财政大臣达林曾表示，“我们不会也不能扶持欧元。我非常清楚地表明，如果有人提议为欧元设立稳定基金，那绝对是欧元集团国家的事。”英国首相卡梅伦则表示，英国没有义务给任何潜在的希腊救助计划提供帮助。

丘吉尔曾说过，“英国保住了欧洲的自由。如果没有英国执着地扮演着欧洲均势保持者的角色，法国几乎无疑地会在十八或十九世纪成为欧洲的霸主，德国也会在之后登上欧洲盟主的地位。”英国始终没有把自己作为欧洲的一部分。以欧洲大陆均势格局为目标，英国愿加入任何反对独大势力的组合，其外交政策站在欧洲大陆较弱或受威胁较大的一方来制衡较强的一方。

英国对德国在欧洲大陆日益强势的主导地位极为担忧。英国希望欧洲央行为债务问题严重的欧元区国家提供担保并购买债务国国债。换言之，就是让德国作出自我牺牲来救援欧债危机，这样既可以缓解对英国经济的冲击，又可以削弱德国经济。德国则希望借欧债危机的契机更为深入地推进政治、经济、财政上的一体化，建立针对违反财政纪律的国家建立惩治机制，促使各成员国共同承担责任。当然，德国背后的潜台词是德国统一欧洲。欧盟加强政治一体化、欧元区加紧金融监管将危及英国的金融中心地位，由此将直接损害英国经济的发展。而财政联盟会让英国失去在欧洲决策的参与制定权与发言权。英国在这一问题上与法国站在了一起。英国首相卡梅伦针锋相对地指出，“这次危机恰恰为权力从欧洲回归各民族国家提供了机会”。

英国人也不是省油的灯。英国企图利用欧债危机的机会，从欧盟拿回更多权力，而不是给欧盟更多权力。为了一己之私利，英国落井下石，

大幅削减对欧洲国家的信贷，导致英资银行从欧元区撤走几百亿英镑资金。英国巴克莱银行与渣打银行已大幅减少准备提供给欧元区银行的无担保贷款额度，让欧洲银行体系信用紧缩的可能性升高。最大的银行间信贷提供商汇丰银行的贷款缩减幅度最大，对欧元区的银行间贷款总额下降了 40%。该行已不再向希腊银行业放贷，同时将对西班牙和爱尔兰银行的贷款规模缩减 2/3 左右。截至 2011 年 9 月的 3 个月内，英国 4 大银行的银行间贷款总额下降了逾 24%，至 105 亿英镑。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对希腊和西班牙银行的贷款。与此同时，英国却在国内实行大规模的信贷宽松计划，向市场释放流动性以降低本国中小企业贷款成本。英国人的卑劣行径大大增加了欧债危机的解决难度。

（四）德法英博弈“全球金融交易税”

2009 年 9 月，德国和法国共同提出了“全球金融交易税”的倡议。金融交易税是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金融交易行为征收的一种行为税，可有效遏制金融投机行为。欧盟委员会一直寻求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该税，却遭到英美为首的许多国家的反对。但欧债危机的蔓延迫使欧盟决定在区域内先行实施。2011 年 9 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向欧洲议会提交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提案，计划从 2014 年起对欧盟境内金融机构参与的所有金融交易征税，该交易税将覆盖金融机构间 85% 的金融交易，其中股票、债券交易税率为 0.1%，金融衍生品交易税率为 0.01%。

美国和英国是全球两大金融中心，其股票和债券交易位居全球前列，两国的外汇交易超过全球交易量的 50%，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则占到全球交易总量的 70%。金融交易税不但使英美两国的利益受损，更重要的是将削弱其金融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这是因为，首先金融交易税会刺激

金融公司的业务转移到海外，从而削弱两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其次，金融交易税主要针对金融机构间的交易，会使危机后依旧脆弱的两国银行业系统面临冲击。再次，征税带来的收入是作为一种基金储备，由国际社会或成员国共享，这将使两国财富更多向他国转移。因此，掌握世界金融霸权的美国带头坚决抵制金融交易税。而英国却将责任推到美国身上，声称，除非包括美国、欧洲、亚洲金融中心在内的主要经济中心都需征这种税，否则英国不会单独采取行动。换言之，英国强烈反对仅仅在欧洲范围内实施。英国首相卡梅伦甚至将金融交易税形容为“完全疯了”。

德国对金融交易税的态度则是有保留地支持。德国人认为，金融交易税必须在所有欧盟国家至少也得在欧元区 17 个成员国境内同时实施，否则德国法兰克福的金融业务可能流向伦敦。换言之，德国实行金融交易税的前提是英国也实行金融交易税。而法国却是金融交易税的主要倡议和坚定支持者。2012 年 1 月，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示，在其他国家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法国率先从 2011 年 8 月 1 日开始征收 0.1% 税率的金融交易税。事实上，就欧盟而言，英国和德国的金融交易占其全部交易量的 90% 以上，而金融交易税对法国的影响极小。这便是法国积极支持金融交易税的原因所在。由此看来，一旦遭遇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欧洲的共同利益便被各国弃如敝履。



第五章

宿命的结局：

欧元的选择只有早死或晚死



一、美国试图延缓其霸权的衰落

（一）美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任何事物包括国家总有其从诞生到巅峰最终衰败的一个必然过程。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也不例外。关键在于，美国是否真的开始步入衰落的过程，其霸权是否真的开始逐渐丧失。从经济上看，美国的衰落显而易见。根据IMF的数据，以市场价格衡量，美国在1969年占全球收入的36%，到2000年下降到31%。到2010年，这一比例急剧降至23.1%。此外，2000年中国GDP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8，1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比例已迅速攀升至40.2%。美国国会预计2012年财政赤字将高达1.6万亿。美国当前债务总额超过14万亿美元，几乎超过美国GDP。如果按当前支出速度测算，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必将破产。

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从1979年到2004年，收入最低的20%阶层的实际税后收入增长了9%，收入最高的20%阶层的实际税后收入增长了69%，而最富有的1%阶层的实际税后收入则增长了176%。从1979年到2007年，收入最高的1%群体占比国民收入增长了13.5%，在2007年达到了大约1.1万亿美元。美国乔治敦大学艾德尔曼教授这样评价道，“过去40年，几乎所有的收入增长都是占人口1%的最高收入

者所获得的,他们可以赚大量的钱和积攒巨额财富。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有利于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富豪阶层,而不是普通美国人,因金融系统过错造成的损失正由社会均摊,收益却进入私人腰包。”

美国的贫困标准以家庭人口和家庭收入为基准,2011 年美国贫困人口标准是四口之家税前年现金收入低于 22314 美元或两口之家低于 14218 美元。按照这一标准,全美有 1/6 的人口,即 4620 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需要接受政府补助来购买食品。其中极度贫困中的美国人大约为 2050 万(极度贫困标准是四口之家的年收入 11157 美元以下)。2010 年,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为 4990 万。在美国有 2/3 的大学生一毕业就背负沉重债务,平均每个大毕业学生负债 8 万美元。另外美国还有 9730 万人属于低收入阶层。换言之,美国有 48% 的人口,即 1.464 亿人生活在物质匮乏之中。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美国的贫困阶层难以摆脱出身阶层的束缚,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像鲤鱼跳龙门般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据研究,在父母处于收入最低的 20% 阶层的美国家庭中,42% 的孩子依然处在社会底层,而在父母处于收入最高的 20% 阶层的家庭中,有 39% 的孩子依然处于最高收入阶层。在父母处于收入最底层的孩子中,只有 6% 的人上升到了最上层。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民众已对本国政治制度相当不满,对美国现行政治制度不满的美国民众达到 80%。结果,2011 年 9 月 17 日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可避免地发生并日益扩大。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铁血手段强行镇压,与抗议群众频频发生流血冲突。

(二)美元霸权仍有军事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为支撑

尽管美国的衰落显而易见,但美元霸权表面上看却并未遭到实质性

的削弱。美元霸权是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控制和掠夺的手段。美国霸权通过美元霸权直接作用的领域从全球金融、贸易领域扩展到政治、军事、安全等各领域。美军培养高级将领的少数研究生院之一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托马斯·伯奈特所说:"我们只用少量的纸币去交换亚洲地区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我们也足够聪明地知道这一切并不公平,当我们送去这些纸币时,我们必须要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产品——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超级霸权的根蒂正在于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几乎能与内政分庭抗礼。从美国国务卿的政治权力上也看到这一点。美国将分管外交事务的主要官员称为国务卿,而且地位在一切部长之上,有近似首相、总理的地位和权力。

美元霸权需要两个关键因素的支撑——意识形态霸权和军事霸权。《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美国以意识形态霸权为先锋驯化他国人的思想,让世界各国甘拜下风,以美为师。意识形态霸权是软实力,相对于军事霸权来说成本更低,代价和风险更小,更加体面和隐蔽,效率更高,速度更快。军事霸权是硬实力,如果有人反对美国霸权,美国就以战争给世界各国制造一种战争随时降临头上的可能性,强迫其接受美国制定的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的博弈规则。

但"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美国不仅经济衰落,文化、思想与社会模式也处在衰落之中。索罗斯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给出这样的评价:"为了维持法律秩序也应该被强力镇压,但是这一举措若走了极端,则可能会催生一个高压政治体系,这种社会体系难免导致个人自由被限制得更多。"这意味着美国文化霸权与道德制高点的丧失。

很多人认为,美国军事强大,美国的国债危机甚至金融危机不仅未能

将美国从世界霸主的宝座上拉下马来,反而是美国内部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一个反馈过程。甚至有些阴谋论者认为,金融危机是美国战略家与金融家有意制造的经济动荡,意在打击欧洲与中国,而美国仍将世界霸权牢牢攥在手中。

对于美国精英来说,国家战略首先考虑的是维持国家、社会、政权正常运行。为此,美元不能被废止,世界体系不能崩溃,支撑世界体系的若干基础不能动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政府将综合运用经济手段、外交途径、阴谋陷阱。如果这些手段能够达到目的,美国也不会动用战争手段对付其他国家;如果这些手段无效,美国最后会不惜动用战争手段走出困境。战争手段并不能长期维持政治与经济霸权。法国政治家夏尔·莫里斯·塔列朗曾这样告诫拿破仑:“陛下,用刺刀可以做到一切,但只有一件事做不到,那就是坐在刺刀上。”

英国当年也试图以军事霸权维持其政治与经济霸权,结果却失败了。普法战争之后的1873年,处在巅峰的英国开始走下坡路,逐渐走向衰败。1886年,在英国殖民地南非的德兰士瓦发现了大型金矿,很快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黄金生产地区。但南非土著布尔人却要求摆脱英国而独立。伦敦金融城为了控制金矿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布尔战争。战争胜利后,英国人控制了当地60% ~80%的黄金产量,保证了伦敦金融城世界金融中心的垄断地位,维护了大英帝国的霸权。来自德兰士瓦的大量黄金延长了大英帝国的气数。

当时的黄金就相当于现在的石油。在金本位制度下,英镑以黄金为锚。大英帝国以首屈一指的军事实力保证英镑能在全球各地随时兑换成黄金。为此大英帝国不惜动用武力抢占金矿。但是,在一国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武力只能起到暂时的作用。一旦军事力量成为主要手段,这就表

明该国已黔驴技穷。通过隐蔽的经济与金融手段维持霸权比任何武力，其成本要低得多，而其所获得的利益则大得多，也阴险得多。最终，英国也未能以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长期维持其政治与经济霸权。

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现代货币以国家信用为背书，而美元信用则以石油为基石。美国与当年的大英帝国如出一辙，动用武力维护美国在全球最大的石油产地——从北非、中东到里海地区的控制权，以维持美元与石油的结算关系。因此，动用武力并非美国的战略扩张，而是美国人的最后手段。一旦武力解决不了问题，那美国将再也拿不出来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三）美国主动收缩

一个大国随着实力的增强会不断向外扩张，一旦扩张过度而衰落下去。美国正面临着这样的局势，开展海外军事行动越来越力不从心。在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以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美国的对外扩张达到了一个顶峰。2010 年 8 月 31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宣布美军结束伊拉克作战行动，这标志着美国战略收缩的开始。

与此同时，美国的石油供应已经向本土和西半球收缩。从 2007 年开始，美国从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进口石油总量每年减少 100 万桶。目前美国的石油进口一半以上来自西半球，对中东的依赖仅为 17% 左右。美国在能源上依赖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未来，随着美国在巴西、西非等地的石油开采和石油进口增加，加上美国国内的页岩气等资源的开发加速，美国对中东的石油依赖将会进一步降低。

尽管计算机与网络、建筑工程、石油钻井设备以及油页岩炼油都是美国的高新技术，尽管美国的总体研发费用、大学排名、诺贝尔奖得主人数

仍居世界首位，但是，科技领先与发达也并非霸权的必要条件。“二战”之前的英德两国是世界科技领袖。仅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就有45人拿过诺贝尔奖。就连经济学，当时美国的经济学家都要前往德国求学，还形成了所谓的美国学派。德国率先研制出了喷气式飞机、导弹、制导炸弹、火箭、各种新式潜艇等军事技术，核武器技术也几近突破。而美国产品在当时被视为假冒伪劣的山寨货。但“二战”的结果却是，德国科技与人才被落后的美国占有并消化。

2012年年初，美国公布了指明未来十年美国的最高军事战略与美军的最高指导方针的战略评估报告——《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美国从要求其军队同时打赢两场战争转变为只要求美军具备打赢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能力，同时在另一场可能同时发生的突发冲突中起到干扰、破坏、威慑的作用。

基于这样的思想，美军开始执行缩减规模的新战略。美国军事预算将在5年内共计削减约2600亿美元，10年内共计削减约5000亿美元。随之而来的将会是美国的大规模裁军，裁撤人员的最高规模可能达到现有数量的10%。与此同时，美军的战略目标却要求是具备在几天乃至几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能力，并将更加致力于网络战、弹道导弹防御和核威慑力量的建设，加强其战略威慑能力。这显然是以军事行动策应其经济与金融目标的举措。但美国的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全线后撤或者放弃，而是为了突出战略重点，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第一要务是振兴经济，政府将专心于推动经济的复兴，解决美国人的失业问题，因为美国霸权的根本最终要依赖于国内的经济繁荣。

（四）有退有进，不甘衰落

在对外战略中，美国驻欧洲的军力将可能会大大缩减。美军将减少

欧洲的部署，将重心转移到亚太。而东亚地区则是重中之重，将更多的资源投到东亚地区。因为美国经济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亚太地区的国家。美国明确将中国视为假想敌。2011 年 11 月，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宣布，未来几年内将把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建成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指挥中心。美国也正加紧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部署最新型的沿海作战舰，并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为了威慑中国。

美国的战略调整实属高明之举，让人深为折服。因为美国决策精英正确认识到美国实力的衰落，通过有收有放的全球战略与攻击欧元的袭扰战术可以延缓美国衰落的速度，尽可能延长美国霸权的寿命。此外，美国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森林面积、可耕地面积、煤炭储量、石油与天然气储量均居世界前列，美国的经济实力依然十分强大。截至 2008 年底，全球最大的 500 家跨国垄断企业中，美国有 162 家，占 32.4%，主要集中在金融业、能源资源、军工、高科技、服务业等领域。美国跨国垄断企业的营业额占 500 家最大垄断企业的 35.7%，利润占 38.7%，资产额占 25.5%。因此，尽管我们不能否认，美国已处在一个从巅峰走向衰落的历史性转折点，但美国的霸权绝不会突然死亡，只会处在缓慢衰落的过程中。

二、欧洲不可逆转的长期衰败

（一）人口老龄化和高福利制度将加剧债务危机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逐渐丧失了世界中心的地位，却仍对世界格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现在，欧洲正在面临着不可逆转的全面

衰败，欧债危机便是这一过程的具体体现。欧洲的衰落与危机，究其根本，在于其人口老龄化。当然，老年人并没有什么错，但更具有活力与创造力的年轻人才是真正的希望。逐渐失去年轻人的欧洲也失去了未来的希望。

欧盟国家的婴儿出生率和生育率近年来低于绝大部分地区，仅比日本出生率下降要缓慢一点。在欧盟，2007 年出生的婴儿数量比 1980 年少了近 100 万，65 岁以上的人比 14 岁以下的人多出 600 万。英国家庭政策研究中心对欧洲 27 国的调查显示，1980 年到 2006 年，欧洲的结婚率骤降 24%，有 5400 多万欧洲人选择单身。许多夫妻选择了晚育。女性和男性生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29 岁和 31 岁，比 25 年前推迟了 5 年左右。这加重了欧洲人口的老龄化。

就欧元区来说，人口年龄的峰值从 1990 年的 25 ~ 29 岁提高至 2007 年的40 ~ 44岁。占欧元区人口比重 18.4% 的 50 ~ 64 岁人口在未来的 15 年内都将陆续转化为老年人口。未来 10 年内区内新增的适龄劳动人口主要来自 15 ~ 24 岁，但其比例只有 11.6%。从 2000 年到 2010 年，欧盟国家 65 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15.6% 上升到 17.4%，而欧元区国家则从 16.2% 上升到 18.3%。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未来几十年将愈加严重。根据欧洲统计局按照目前的出生率与死亡率预计，整个欧洲将在 2015 年至 2030 年迎来老龄化比率提升的高峰期。

老龄化拖累了欧洲的经济增长。欧债危机重灾区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欧元区中正属于老龄化问题突出的区域，老年人比率高，新增劳动力不足，将造成长期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和竞争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国当中债务负担越重的国家，在未来 20 年中的老龄化劳动力的短缺问题就越严重。

传统的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即正在工作的下一代人的缴费，直接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者的养老金，具有较强的债务隐蔽性和较高的财务脆弱性。在欧洲国家普遍实行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险制度架构下，参保人的养老金权益在本质上是一种隐性负债，从而提升了政府支出的潜在总额，影响了经济潜在增长。欧盟中的 19 个国家的国有养老金债务是其 GDP 总和的 5 倍左右。早在 2009 年，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债务规模就已经达到了 39.3 万亿美元，约合 30 万亿欧元。其中，德国有 7.6 万亿欧元，法国有 6.7 万亿欧元。

老龄化带来的主要财务成本，包括五个福利项目，即公共养老金支出、医疗费用支出、长期照护支出、教育支出和失业保险支出。人口老龄化越迫近和越严峻，用于前三项的支出便会不断攀升，而后两项则会逐渐下降。因此，五项福利支出的此消彼长在一定程度上将会相互抵消一部分成本支出。但总的说来，随着老龄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欧洲各国政府的相关福利支出也成倍增长，从而造成政府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

欧洲建有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老龄化支出在整个经济支出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根据欧盟经济政策委员会老龄人口工作组的统计，在欧债危机爆发前的 2007 年，欧盟国家的老龄化相关直接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例为 18.1%，欧元区则占到 19.1%。分国家来看，老龄化直接支出占比最高的国家是法国，占该国 GDP 的 22.5%；其次是意大利，为 21.6%；德国和希腊分别为 18.7% 和 18.1%，葡萄牙和西班牙则分别为 16.0% 和 14.4%。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断加重欧洲的福利支出负担，使财政赤字不断超标。

欧洲的福利制度具有高度的政治正确。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般占总人口的 70% 左右，拥有左右政治与国家政策的巨大力量。他们的福利

需求总是以泛政治化的方式提出、再通过民主政治的方式来表达，从而造成了极高的政治成本。政客为赢得选举而支付的全部成本，连同其政党给民众作出的福利承诺，在政府财政来源不足时会直接形成高额的政府债务。2010 年 5 月国际货币基金和欧元区决定援助希腊，但同时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包括削减福利，降低养老成本与财政紧缩。希腊政府迫不得已全盘接受了这些条件。随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希腊民众反对削减福利的示威游行，造成了希腊政局的严重动荡。

2010 年，欧盟每 4 个工作人口赡养 1 名老人，到 2050 年，每 2 个工作人口就必须承担相同的责任。财政和老龄化会导致欧洲的年轻一代背负双重的负担，既要为上一代还债，还要赡养上一代人。最终，这些国家以后的经济发展可能会陷入既无货币政策支持，也无财政政策支撑的困局。总而言之，人口老龄化和劳动适龄人口的减少导致的经济增长减缓、财政收入减少和公共支出增加等三个必然的结果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的难以挽回的颓势局面。因此，欧洲债务危机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

（二）欧洲人口的民族结构也是一颗定时炸弹

一个民族人口数量的多寡决定了一种文化与价值观的延续性与扩张性。比如在 19 世纪，英国是第一个真正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的国家，这导致英国人口在基数不大的情况下增长很快，使得其有富裕的人力资源去殖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乃至印度、非洲和世界各地，从而将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英语扩张到全球。但现在的欧洲却走在相反的道路上。

战后欧洲经济飞跃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老龄化和劳动力匮乏问题，

引进国外劳动力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欧很多国家的主要政策之一。原本东欧劳动力是最佳选择,但当时东欧与西欧之间被铁幕所隔离,欧洲各国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从中东、北非招募了很多有技能的适龄人员,来做这些脏乱差的工作。这些穆斯林及其后代逐渐在欧洲扎下了根。

2009年6月,欧盟成员国共有注册移民1850万人,另外还有800万非法移民。但由于欧盟不根据宗教信仰统计移民数目,所以这个数据并未准确统计出欧盟国家的穆斯林移民数量。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表明,穆斯林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8%、荷兰为6%、德国为4%、英国为3%。德国伊斯兰档案中心公布的数据更让人震惊。该中心的数据显示,2007年欧洲穆斯林人口为5300万,占全部人口的7.2%。

许多欧洲国家都希望能控制穆斯林的组织和社会团体,将欧洲穆斯林同化于本国文化。但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伊斯兰的教义有充分抵制外来文化改造的固有潜力,使欧洲人的大多数设想和规划都化为泡影。欧洲穆斯林的普遍思想是,他们是生活在异教徒国家的穆斯林,不但不接受社会融入,反而还决心用伊斯兰文化改造西方社会。

就法国来说,该国是欧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法国曾是北非伊斯兰地区主要的殖民主义宗主国。当时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与英国自由放任的理念不同,法国政府不允许殖民地土著自治,而是实行全面法国化改造,强制土著学习法语,社会制度法国化,甚至把一些殖民地看做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称为海外省,把以法国为中心的所有海外殖民地称为法语区。“二战”后,法国被迫允许这些地区名义上获得独立,但仍与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维持着不平等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而且还从北非穆斯林地区引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半个世纪以来,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增加了50倍,如今超过600万。

法国统治精英不承认穆斯林移民的宗教信仰，希望他们接受法国文化，从而被自然消融于法国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法国曾鼓励过穆斯林与法国人通婚，来消化穆斯林。但事与愿违，法国穆斯林学习法语，在法国读书工作，但却拒绝法国文化，坚守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和伊斯兰文化传统。由于世界各地来的穆斯林都遵守伊斯兰的婚姻法制，以要求对方归信伊斯兰为结婚条件，结果凡是与穆斯林结婚的法国女子或男子都变成了新穆斯林，反而增加了法国穆斯林人口的比例。如果法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仍保持现在的势头，到 2035 年，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将超过半数，法国将会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

面对这样的局面，欧洲文化精英非常担心欧洲文化传承将随着穆斯林人口比例的急剧提高而发生异化，甚至是断裂。埃及出生的英国历史学家贝特·叶奥在《欧拉伯：欧洲—阿拉伯轴心》一书中创造了一个新词“欧拉伯”（Eurabia）。它由欧洲（Europe）和阿拉伯（Arabia）两个单词拼合而成。叶奥认为，随着阿拉伯人大举向欧洲移民，早晚有一天，欧洲人将淹没在阿拉伯人的汪洋大海里，从而失去欧洲文化的自我。法国历史学家朱斯坦·韦斯在《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上开篇便提到：“到 2050 年，欧洲将会认不出来了。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大道，林立的清真食品店将取代目前的浪漫酒吧；柏林的路标将用土耳其语书写；奥斯陆和那不勒斯的小学生，将在课堂上朗诵《古兰经》。”

欧洲的政治精英也普遍承认，欧洲推行多年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经遭遇滑铁卢。2010 年 10 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承认，多元文化政策“失败了，彻底失败了”。2011 年 2 月，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英国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几十年，结果造成了英国社区隔离、伊斯兰极端分子活动猖獗。2010 年，萨科齐在法国发起了“民族认同”大讨论，他

还将穆斯林罩袍比喻成“移动监狱”。这些欧洲政治精英的公开表态意味着欧洲右翼势力的崛起已经不可避免。因此，长期来看，随着欧洲不可逆转的长期衰败，其内部的分裂与动荡即使不是在所难免，也是可能性极高。

在欧洲陷入困顿并且是长期持续衰退的情况下，美国要想延缓其霸权衰落的过程，必然要通过打击欧元来收编欧洲经济体，从而保证美元霸权与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因此，欧洲长期衰落的宿命给美国人提供了延缓自身衰落的前提条件，而欧元的前景也十分渺茫。

三、欧元的未来前途渺茫

（一）欧元的死法

欧元区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却并不是一个简单而短暂的过程。欧元区瓦解的形式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也许是彻底解体，也许是一个债务国退出，也许是多个债务国同时退出。退出可能是一国突然的单边行动，也可能经过各国的多边协商完成。

对于欧元区决策者来说，尽量延缓欧元的生命是第一选择。但迄今为止，缓解欧债危机的主要对策是扩大流动性来避免大规模的债务违约以防止欧元解体。其本质上无非是一种被动的欧洲式的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决策者希望通过此举来为债务国争取经济改革的时间。但从欧元区整体角度来看，投放流动性并不能减少债务总量，而债务国也难以按预想的计划完成经济改革。到 2014 年为止，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国债务预计将分别达到各自 GDP 的 180%、145% 和 135%。希腊、爱尔兰和葡

萄牙最终单方违约的可能性极高。因此,投放流动性只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拖延策略。

根据欧元区 M1(包括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体系内的隔夜存款)、M2(在 M1 基础上增加的实体经济的短期存款)和 M3(在 M2 的基础上增加了货币市场短期工具)的数据表明,M1 的大幅提高并未带动 M2 和 M3 的提高。这表明市场不认同欧元区目前的救助政策,欧洲投放的流动性大部分都滞留在银行体系内部,而不能有效配置于实体经济领域。所谓流动性的投放,其本质乃是以德法两国主要是德国为代表的高信用国家向债务国出借国家信用而非资金。因此,这就将债务国的信用风险转化为欧元区的系统性风险,最终拖累的是整个欧元区。但是,如果不投放流动性,欧债市场将会立即崩溃,欧元将会突然死亡。

(二)对德法来说欧元死不起

欧元突然死亡,将会给德法两国带来巨大的创伤。据瑞士银行估算,一个较弱成员国退出欧元区后,该国每个公民必须承担的银行资本重整的一次性成本大概为 9500 ~ 11500 欧元,风险溢价和贸易停滞成本平均每年有 3000 ~ 4000 欧元,相当于退出第一年该国人均 GDP 的 40% ~ 50%。强国退出欧元区后,其出口业在主要出口市场上对主要竞争国将处于竞争劣势,诱发资金逃出欧洲从而导致新诞生的货币快速升值。本币升值不仅不利于出口,也会让央行丧失对货币基础的控制。强国可能会出现相当程度的经济紊乱。出口行业的衰退将导致失业人口膨胀从而引起社会动荡。以德国为例,德国退出欧元区后,预计第一年的人均成本约为 6000 ~ 8000 欧元,此后每年承担的成本为 3500 ~ 4500 欧元,这相当于第一年 GDP 的 20% ~25%。

如果欧元死亡,欧洲政治上的代价比经济损失更加严重。自欧共体创建以来,欧洲的最终目标一直都是形成某种形式的政治统一。欧元瓦解之后,欧洲一体化政体的概念将变得毫无意义,欧洲的国际影响将不复存在。欧元的瓦解以及欧盟的解体将对欧洲的国际地位造成负面冲击。当世界面临全球经济、环境和政治风险时,全球影响力会发挥很大作用。欧元瓦解后,欧元区国家即便在国际舞台上想要轻微发出声音也将变得很难。

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由于原货币扩张受单国经济规模限制,德法将欧元作为突破性的战略选择,试图增强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欧元的死亡即便是部分国家的退出,德法两国在政治上所付出的代价将巨大到难以用金钱衡量。与法国相比,欧元对德国的重要性尤甚。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德国实现大国梦想和国家根本利益诉求的基础,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扩展欲望使欧元区从建立之初起就是一个政治联合。

如果希腊、葡萄牙等债务国被德法强迫退出欧元区,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会遭受到严重打击,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核心国家费尽心力一手建立起来的欧元区很可能就会分崩离析。即便欧元能继续存续下去,欧元区也只能收缩到以德法为首的几个国家的狭小范围内,形成一个小欧元区。凭借上百年的经济基础和技术积累,德法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尚能保证自身的经济稳定,但新欧元将局限于欧洲一隅,难以与美元争锋,欧洲的国际竞争力也将大幅下滑。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对土耳其的吸引力随之必然大为下降。欧洲将失去影响土耳其的能力,从而失去以土耳其为跳板影响中东的能力。一旦失去对中东的影响力,欧洲自身的能源供给将完全受制于俄罗斯和中东产油国,而欧洲军事安全尚依赖于美国控制的北约,这样的小欧元区必然丧失了自身的政治发展空间和能源保

障，只能仰美国之鼻息而苟延残喘，德法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上几十年如一日的苦心经营与积累将灰飞烟灭。

（三）债务货币化是良药吗

除了投入流动性之外，欧洲决策者还可以采用对欧洲央行进行债务货币化的策略。但是，欧洲央行在制度架构上是包括所有欧元区成员国的央行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因此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必须经过成员国央行这一层，其操作效果受各成员国央行的影响。同时，《马约》规定欧洲央行和各成员国的央行不得向政府提供任何信贷便利，不得在一级市场上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因此，只有修改《马约》才能做到债务货币化，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

无论是采用投入流动性的策略还是采用债务货币化的手段，都会促使货币供给速度快于实体经济产出速度，由此导致信用的过度扩张。如果信用扩张可以投入到实体经济领域，尽管会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形成经济波动，但却可以促使经济的快速增长，降低债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在欧洲的信用扩张并未投入到实体经济，是一种典型的信用过度扩张的现象。信用过度扩张只推高了房产、债券等金融资产的价格，拉大了贫富差距，造成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放大了实体经济波动的幅度。

2007年次贷危机后，欧洲经济受到牵连，市场出现巨大震荡。一些欧元区国家为救助濒死的金融业，以政府信用来代替私人金融机构的信用，并过度扩张政府信用来延缓金融危机的发生，最终导致欧债危机的发生。实际上，要解决欧洲危机，只能依靠这些国家自身竞争力的增强。但欧洲国家的信用扩张并未有效地用于企业生产以推动产业复苏，而是用

来救助金融机构。因此，欧洲决策者目前所采用的种种策略虽能暂时缓解欧债危机的严重程度，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危机国的竞争力，只能将危机拖延得越来越严重，最终必会达到无药可救的地步。

（四）再试一试债务重组

一旦信用扩张失效，欧洲决策者仍有一个不是对策的对策，即通过债务重组的方法来减轻债务国的偿债压力，其实质这是一种变相违约。但债务重组导致的债务违约会给欧洲银行业带来极高的风险。欧元区银行大都持有政府债券或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担保的其他债券。欧洲银行不仅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而且还面临着更大的非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截至2011年3月，欧洲银行持有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四国的国债总额近2.2万亿美元。此外，在非主权债务方面，欧洲银行对危机国发放的各种贷款数额巨大，仅法国4家最大的银行和德国的12家银行在“欧猪五国”发放的房屋抵押贷款、小企业贷款、公司债券、商业房地产贷款等总额就分别达到3000亿和1740亿欧元，远超过对这些国家国债的持有额。

主权债务违约将严重损害市场对银行的信心，银行业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融资成本大幅攀升。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以市价计量，债务违约导致政府债券价格下跌，从而使得银行资产缩水，投资收益下降。一旦债务重组开始，大面积的政府违约开始发生，欧元区银行体系会面临严峻的危机。银行体系只能进行大规模的再融资，如果再融资的需求无法满足，主权债务危机将全面向欧洲的银行体系传导。银行危机反过来也会降低欧元区国家的主权信用，因为一些政府原本已经承受着巨额赤字，而且难以控制债务膨胀，但需要其救助的银行却越来越多，从而形成

一个主权债务危机与银行危机相互传导的恶性循环。

实际上,欧洲经济已越来越陷入主权债务与财政紧缩螺旋之中,债务规模过大需要财政紧缩,但财政紧缩导致经济衰退收入减少,更无法偿还旧有的庞大债务,只能通过借更多的债来还旧债。由于欧洲的银行体系与各国债务体系互锁,这样债务危机导致的债券市场暴跌有可能引发银行特别是那些风险敞口大的欧洲银行的灾难性破产,同时导致银行与国家债券,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欧洲银行资产占全球银行总资产的53%。西欧与美国、英国、亚洲、南美洲、非洲、东欧、俄罗斯、中东、中亚这些地区的金融系统联系十分紧密。欧洲银行危机有可能成为整个世界经济陷入大面积灾难性崩溃中的导火索。索罗斯指出,“欧元必须要生存下去,一旦欧元分崩离析,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将无法承担这个灾难性后果。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现在的情形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遇到。我们正面临着发达世界的一次大规模紧缩。”

经过多年的运作,欧元区已将各成员国的经济活动整合在一起,脱离欧元区对各国都是最差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最好的选择只能是采取拖字诀,继续通过不停地向债务国输血然后逼迫债务国财政整固的方式来避免债务国债务大规模违约现象的发生。在中东问题上,德法有很大的可能性试图拼力一搏保住债务国留在欧元区,坚决拉拢土耳其以保持对中东的影响力。其结果必然是信用过度扩张。长期来看,美国可以趁机继续打击欧元来帮助自己度过危机。欧债危机的解决最终还是要看欧洲在中东的收获有多大。随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其必然会挑起各种矛盾来制造中东的政治与社会动荡,让其他国家与地区难以接受整合中东。而欧洲不仅需要通过土耳其来增强自己在中东的控制力,还

需要求助于中国的金融援助和俄罗斯的能源输入。这需要欧洲的决策层像走钢丝一样来平衡各方利益,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然,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五)欧元若死亡,美国人喜,新兴体忧

欧洲的灾难是美国的福音。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元区 17 国 2012 年 1 月份失业人数共增加 18.5 万至 1692.5 万,失业人数上升至 1995 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失业人数继续增加影响,欧元区 2012 年 1 月失业率也上升至 10.7%,是 1997 年 10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美国在 2012 年 2 月失业率下降至 8.3%,创 2008 年 3 月以来最低水平。当然,美国也并不希望欧元突然死亡。一旦欧元突然死亡,欧洲必将迅速陷入崩溃的绝境,整个欧洲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将随之瓦解,美国在欧洲的治理成本必将急剧上升。因此,欧元的死亡时间与方式仍然只能根据美国经济形势变化的情况而定。

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将遭受欧债危机的严重冲击。欧洲国际金融资本是美元套利资本与国际流动资本的主要提供方,是新兴工业国的巨额外资流动性的提供者,总额大约超过 15 万亿美元。当欧债危机恶化到冲击欧洲银行体系时,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欧洲国际资本将从全球撤离,必然抛出其他国家的货币来买入并持有美元及美国短期国债资产。一旦欧洲资本从全球各国大规模撤离,则以美元的形式从各国外汇储备系统中流出,这将导致国际外汇市场上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出现大幅下跌,从而导致更多的资金为避嫌而撤离,这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终,欧债危机的恶化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造成严重的紧缩效应,对新兴市场的金融与货币稳定性构成严重影

响,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剧烈振荡。

四、欧债危机是中国对外投资的良机

(一)用好用活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到世界第二。但中国也为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构中的资本收入过高,劳动收入过低,导致贫富差距悬殊急剧扩大,大为激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宏观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投资增速现在保持50%以上,其中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额的将近1/4。实行开放政策,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是中国实现国富民强的必然选择。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必然被纳入到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的全球体系,以大幅度开放本国市场的代价来获取外部的资金与技术,这有可能会危及民族产业的生存和发展。

中国长期以来积极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却未能通过国内市场的大量出让换来国外的先进技术,反而使国内产业遭受到了严重冲击,经济增长不得不日益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美国杜克大学约瑟夫·杜里科教授这样写道:“美国与其他工业国都一直努力接触中国,通过扩大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和制度联系,将中国纳入现存世界秩序。西方各国政府希望,与其他国家间贸易和投资关系联系的扩大将鼓励中国领导人对内实行经济、政治改革……完成中国精英阶层的社会化过程,使之接受世界经济规范和惯例。”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人写成的文字都是异想天开。美国人与中国人一样,都善于运筹帷幄,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擅长阳谋,其战

略意图与战略路线都是公开的。

在战略上,美国希望能将中国完全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以保障美国的利益。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美国首先必须使中国经济依赖于美国。其次,必须使中国经济走上低技术水平扩张的道路。再次,必须在金融上控制中国。美国迫使中国承诺实行激进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政策,不再坚持外资企业对华技术转让要求,放弃对国有大企业的特别保护,并在一定期限内开放金融、电信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为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攻城略地创造条件。美国甚至试图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中国不是没有成为丧失独立性的依附性经济体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克服储蓄和外汇的短缺,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来解决发展融资问题。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出口,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即通过出口所得外汇资金支付经济发展所需之进口。时移世易,当初有效的政策到了今天却成了中国发展的障碍。由于经常项目顺差巨大,为使汇率保持稳定,中国央行对外汇市场进行大量干预,导致外汇储备急剧上升。而美国则对中国采取了开放国内低端市场的策略,通过各种金融手段让赤字美元回流美国,但却永远不会赎回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只是不断地用更多的新债换旧债。

美国在名义上不违背债务契约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通货膨胀、低利率和汇率贬值等手段来逃避债务责任。按美元指数衡量,仅2002—2010年,美元已经贬值了41%。美国的海外资产主要以当地货币计价,而美国的对外负债则以美元计价。美元贬值会使美国海外资产的价值和投资收入都增加。当然,弱势美元策略下的美元贬值不可能长期持续。如果美元始终贬值,必然危及美元的霸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决策层根据需要来决定美元的贬值与升值。

为了克服目前的债务危机，美国只能采用信用扩张的手段来饮鸩止渴。但美国既要大量扩张信用，又要保持美元价值，避免因国债发行过多导致利率提高。高利率必然使得美国国债疲软甚至崩盘，从而影响美国的国际金融大循环，进而影响美国的金融霸权。面对这样的两难困境，美国必须要让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持续为美国国债买单。如果中国停止购买，或减少购买新的国债，美国国债就会面临崩盘的压力。让中国大量持续地购买美国政府债务，推动美国政府债券的价格上升，从而降低利息，是美国保持稳定的关键因素。

2009 年 4 月，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中国的美元陷阱》的文章指出："中国得到了 2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变成了财政部券共和国，正如英国在不经意间得到了大英帝国。中国领导人好像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他们有麻烦了。虽然他们现在对低收益似乎仍不太在乎，但他们显然担心美元贬值将给中国带来巨大资本损失，因为中国外储的 70% 是美元资产。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中国实行外储的多元化，减少持有美元资产，按照特别提款权的币种构成重新配置外储。但有一个障碍：中国持有的美元太多，如果中国抛售美元就必然导致美元贬值，并进而造成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资本损失"。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卖掉手中所持有的美元资产，马上就会遭受巨大的资本损失，失业率将大幅提高，如果继续增持美元国债资产，则可能在未来遭受更大的资本损失。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在与美国的博弈过程中始终处于战略劣势。这也是很多学者认为救中国就是就救美国的战略依据。

欧美国家的信用过度扩张必然导致全球通胀的恶化，使得基础原材料、食品等的价格上涨。那些大量进口食品、能源和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

最终承担了欧美国家金融危机的恶果，换言之，欧美国家将金融危机转嫁给了其他国家。北非埃及即为典例。埃及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其人均 GDP 也早超过了 5000 美元。但在全球通胀的影响下，埃及食品价格指数超过 30%。与此同时，50% 以上的男青年和 90% 以上的女青年毕业即失业。此外，埃及贫富差距悬殊，政府税收占 GDP 比重过低，政府拿不出钱来有效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最终，埃及陷入了政治与社会动荡之中。

中国的情况亦不容乐观。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已经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严重负债，金融机构潜在的不良资产可能大幅增加。决策层稍有懈怠，未来便可能发生由于投资萎缩、银行坏债或资本外逃触发的经济危机，中华复兴的良好愿望有可能化为黄粱一梦。与此同时，在可以预料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欧美国家的债务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将遭遇全面失败，中国出口导向的战略形势极为严峻。2011 年 11 月份中国出口增速已降至 13%，考虑出口产品涨价因素，实际增速接近零。2011 年 1—11 月出口退税额接近同期外贸顺差，实际顺差也接近零。出口的 50% 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虽有利于就业，但却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

因此，必须要改变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国际经济战略必须要进行重大调整。清人陈澹然在其文集《寤言》卷二的《迁都建藩议》中写道："惟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综合实力不外乎取决于两点：其一是战略经济实力，其二是战略安全。战略经济实力的提高要求拓宽全球市场，利用全球自然资源，以全球技术来支持本国的科技进步；战略安全则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手段来保证国家或地区的生存和稳定。

西方跨国公司已经在世界产业竞争中处于寡头垄断地位，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尤其明显。尽管中国的国企在政府扶持下实力上升较快，但在运营效率和技术水平等核心环节，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差距依然很大。中国的企业存在被西方跨国公司压制并被全面置于国际分工底层的可能。要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要向高端产业升级，扩大中国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的层级。

（二）欧债危机给中国对外投资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中国应扩大对外投资，而不是将经常项目顺差用来增加外汇储备。产业升级需要将国内的自主研发与国外科技资源结合起来。只有通过对外投资才能充分利用国外科技资源，加速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调整产业分工并整合资源，形成新的战略增长点。而欧债危机给中国的对外投资提供了极佳的机会。在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欧洲的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现金流捉襟见肘。中国企业可以趁此机会，选择投资有助于国家战略实现的欧洲企业与品牌。

目前，中国企业对欧洲的投资方兴未艾。2012 年初，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三一重工与中信产业投资基金顾问公司共同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股份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收购价格 3.6 亿欧元。普茨迈斯特是全球最知名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之一，尤其在混凝土泵车制造领域，该企业市场占有率长期居于世界首位。三一重工通过合并拥有了普茨迈斯特的全球销售网络和德国制造的标签。

以潍柴动力控股集团作为主体的山东重工集团虽然在国内柴油发动机市场占据一定地位，但旗下产品都集中在低端、小功率发动机领域。2009 年 2 月，山东重工以 299 万欧元的低价收购法国博杜安股份有限公

司,并投入500万欧元恢复生产能力。博杜安公司以生产16升及以上高端、大功率柴油发动机为主。通过并购博杜安,山东重工填补了技术研发空白,并从单纯出口产品,到逐步搭建营销网络,发展到海外直接投资建厂。2012年1月,山东重工宣布,将提供1.78亿欧元的股权投资,同时提供1.96亿欧元的贷款额度,总投资3.74亿欧元。债务重组程序完成后,山东重工潍柴集团将获得意大利法拉帝公司75%的控股权。法拉帝是欧洲最大的豪华游艇制造公司,旗下拥有九大游艇品牌,并在世界十大顶级游艇品牌中占有4个。

为应对债务危机,葡萄牙政府于2011年开始进行其国企私有化改革,葡萄牙电力公司股份的出售是这次私有化计划中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项目。除了葡萄牙本土的发电、配电业务外,葡萄牙电力业务范围覆盖美国、欧洲、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年收入约占葡萄牙GDP的9%,其下属新能源公司的风电业务规模列全球第四。2011年12月,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以26.9亿欧元的价格购得葡萄牙电力公司21.35%的股权,成为葡萄牙电力的第一大股东。中国企业参与葡萄牙政府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项目,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企业自身的跨国经营,也符合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互利共赢之举。这是中国大型国企在竞标国际大型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权中取得成功的第一例,同时也是葡萄牙政府按照紧缩计划展开的一系列国有资产私有化中的第一笔交易。

中国对欧洲企业的投资才刚刚拉开帷幕,欧洲大量优质企业与高端技术正等待着我们去合作、投资与整合。仅以意大利和法国两国为例。国家控股公司意大利芬梅卡尼卡集团是意大利航空航天、国防、能源、运输和自动化领域的核心企业,拥有大量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如直升机和垂直起落固定翼飞机制造技术和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技术,航空发动机

设计制造技术，飞机及飞机发动机结构部件的设计制造技术。意大利MERMEC机械制造公司在铁路机车制造、铁路安全控制系统和国际空间站机器人摄像系统技术上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意大利平尼法瑞那汽车公司的精密机械和精密模具技术独具特色。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曾以生产幻影战斗机闻名遐迩，目前是欧洲唯一的小型喷气式商务客机制造商，在业内分得世界市场的半壁江山。法国赛峰集团旗下的斯奈克玛公司为发动机专业制造商，产品包括民用发动机，军用发动机以及航天发动机。法国在民用核电领域位居世界领先地位，拥有从核原料供给和核电站整体设计建造到核废料处理等全过程系统技术。法国阿尔斯通运输公司自主开发第四代高速列车AGV堪称轮轨高速铁路业内的领头羊。阿尔斯通的超临界锅炉和循环硫化床锅炉技术具有最先进的技术。法国标致雪铁龙直喷型发动机和微粒过滤系统技术独步全球。

对外投资还可以贴近海外市场，有力地扩大世界市场以带动出口。此外，对外投资还能提高我国对海外自然资源的利用。众所周知，资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与命脉，资源的竞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国石油、森林、橡胶、铁矿、铜矿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大量资源长期需要进口。因此，要维持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利用全球的资源，只有通过海外投资才能在全球建立一批稳定的战略性资源供应基地。

（三）多管齐下，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全面复兴

目前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战略主要通过与跨国公司实行投资合作，帮助本国企业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使本国企业直接参与国际合作分工体系。掠走资源却将污染和失业留给当地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已

难以奏效,欧美国家现在都转而采用股权投资的方式控制海外资源。一般来说,采用股权投资控制的方式需要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资源的经济价值容易确定,二是当地市场体系尤其是资本市场体系较为完善,三是其法律体系健全。但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地区早已被欧美国家抢先占据。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将海外市场与自然资源整合为中国产业链的一部分,才能为我们的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活动空间。通过对欧洲企业的收购,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控股形式直接通过欧洲公司已有的资源进行海外市场的拓展与自然资源的开发。2011 年 8 月,中投公司与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展合作,中投公司将投资 31.5 亿美元收购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旗下从事油气勘探开发和生产业务的子公司 30% 的股权,还将投资 8.5 亿美元收购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亚特兰大液化天然气码头的权益。2012 年 1 月 20 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购买英国泰晤士水务公司 8.68% 的权益。

美国大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指出:亚洲各主要国家的经济生命力都毫无例外地依赖海上贸易能够自由出入两三个主要港口。只要用几颗磁性水雷挡住上海、横滨或者孟买港口的通道,就可以使中国、日本或印度的经济几乎陷入停顿。它们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船运货物,包括对这些国家来说极其重要的石油进口。国际商业铁路运输不仅对日本和印尼这样的岛国不适用,对中国和印度来说也意义不大。

仅石油来说,我们有超过一半的供应都需要进口,其中近 75% 来自中东和非洲。因此,在中国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需要采用政治、经济与外交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而军事则是最后的不可回避的保障手段。中国海军已经具备一定的远洋作战能力,但与美国全球兵力的快速

投送能力相比，我们还缺少足够的技术手段与技术设备。因此，中国需要大力发展大飞机、远程轰炸机与航母等军事高科技，以保障我们的海外利益。

一个国家是否要争取强国地位必须由它自己来决定，但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其他国家所作的反应。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然会改变已有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这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敌视，稍有不慎便会使得其他国家形成反对自己的联盟，使自己在崛起的道路上困难重重。19世纪末，普鲁士统一德国造成欧洲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战略大师俾斯麦在外交上纵横捭阖，用尽一切方法瓦解欧洲的反德同盟，让德意志帝国在安宁祥和的外部环境下快速发展，达到国力的全面增强。但俾斯麦继任者却无视他国对德国崛起的担忧，试图以武力扩张来打破其他国家对自己的遏制，结果导致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失去了争夺世界霸权的良机。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军事保障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军事称霸、侵略别国和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主义政策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更何况，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一向温和，天生带有和平的基因。正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2006年时曾讲的，如果没有中国相对廉价的商品进入欧洲，欧洲人可能无法保持富裕的生活品质，“对中国，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要做的是踏踏实实地干事……欧洲应该确定和中国合作的战略，否则将失去共同发展的机遇……如果欧洲人不能控制自己，我们只能陷于不利境地”。

但在极端的情况下，外部条件的变化不随我们的良好愿望与行为而变化。比如布热津斯基就认为，美国应自我更新，然后重新整合整个西方世界，把土耳其、俄罗斯并入欧盟，然后以土俄为支撑点南下中东，东进中

国。在必要的时候,美国还应联合欧盟组建“反华国际同盟”,在必要时强行推翻中国政府,让中国陷入动荡之中。要达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让欧洲在军事上依附于美国,这可以通过北约机制实现;二是防止欧元做大,通过打击欧元,削弱欧洲,让欧盟唯美国马首是瞻。

对于中国来说,要吸取欧洲和日本的经验与教训,保持政治和军事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障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与经济安全。要让企图以军事手段遏制我们的对手清楚地知道,发动战争所付出的成本将远大于其所获取的收益。要有效阻遏战争的发生,必须有捍卫国家利益的能力。这个能力需要我们拥有完备而健全的自主性经济体系和技术体系。要建立这样的体系反过来又需要我们改变现有的经济体系,大踏步地迈向海外,将自主创新与对外投资结合在一起,有力地推动产业升级,形成经济发展促进国防力量、国防力量保障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最终必然能一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全面复兴。而欧债危机的契机让这个良性循环正在快速启动。

主要参考文献

[1]余治国,著. 世界金融五百年(上、下册).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2]余治国,著. 巴菲特阴谋.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3](美国)赫德森,著. 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 嵇飞,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4](美国)克雷格,(美国)乔治,著. 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5](英国)戴维·马什,著. 欧元的故事:一个新全球货币的激荡岁月. 向松祚,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6](加拿大)考克斯,著.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7](美国)马丁·迈耶,著. 美元的命运. 海口:三环出版社,2000.

[8](美国)艾肯格林,著. 资本全球化:国际金融制度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美国)帕尔默,著. 现代世界史. 何兆武,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10](德国)明克勒,著. 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阎振

江,孟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11](美国)莱恩,著．和平的幻想:1940 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2](美国)肯尼迪,著．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13](意大利)莫斯卡,著．统治阶级．贾鹤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14](美国)罗宾逊,著．全球资本主义论．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5](美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III.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6](法国)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著．石油地缘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7](美国)迈克尔·赫德森,著．全球分裂．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18](美国)斯蒂芬·金泽,著．颠覆:从夏威夷到伊拉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9](英国)约翰·格雷,著．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0](美国)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著．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1](英国)约翰·梅森,著．冷战:1945—1991.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2](美国)丹尼尔·耶金,著．石油风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1992.

[23](美国)斯泰尔,(美国)利坦,著. 金融国策. 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24](日本)富田俊基,著. 国债的历史:凝结在利率中的过去与未来.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5](美国)廖子光,著. 中国出路:全球债务危机与中国应对策略.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26](美国)兰德·瑞,著. 解读现代货币.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27]陈元,谢平,钱颖一,著. 美债与欧债:拖累全球经济的孪生兄弟.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28]唐昊,著. 竞争与一致:利益集团政治影响下的美国霸权逻辑分析.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29]杜厚文,李小牧,王广中,著. 欧元: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矛盾与挑战.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30]王建,著. 大变革时代的思考.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1]余永定,著. 见证失衡. 北京:三联书店,2010.

[32]赵怀普,著. 当代美欧关系史.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33]梅新育,著. 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4]缪建民,著. 欧元的使命与挑战.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35]惠一鸣,著. 欧洲联盟发展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6]（法国）雅克·阿塔利，著．国家的破产．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

[37]（美国）巴切维奇，著．美国新军国主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8]（英国）福斯卡斯，（英国）格卡伊，著．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39]（美国）托尼·朱特唐敏，著．战后欧洲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40]（美国）杰弗里·弗里登，著．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1]（美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2]（美国）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43]（法国）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著．战后欧美关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44]（法国）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著．外交史（1914—1984）．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45]（美国）邓肯，著．美元危机：成因、后果与对策．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46]（美国）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47]（英国）约翰·乔恩，著．货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8]（日本）伊藤诚，（希腊）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著．货币金融

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49](美国)邓肯,著．美元危机:成因、后果与对策．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50](美国)斯泰尔,(美国)利坦,著．金融国策．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51](美国)斯蒂格利茨,著．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北京:中心出版社,2005.

[52](美国)约翰·G. 格利,(美国)爱德华·S. 肖,著．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3](美国)海曼·P. 明斯基,著．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一种金融不稳定视角．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54](英国)凯恩斯,著．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86.

[55](美国)彼得斯,著．资本市场的混沌与秩序:一个关于商业循环、价格和市场变动的新视点．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56]钟茂初,著．庞氏经济学与全球经济危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57]余治国．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明斯基—马克思模型．《西部论丛》,2010(3).

[58]徐弃郁,著．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59]汪波,著．欧盟中东政策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

[60](埃及)萨义德,著．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3.

[61] Alan Greenspan. 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The Penguin Press HC,2007.

[62] Eustace Mullins.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 1985.

[63] Habib, Irfan. , "Monetary system and prices.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Vol. I, c. 1200 – 1700, ed. Tapan Rayachaudhuri and Irfan Habi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64] Philipp Bagus, The Tragedy of the EURO,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65] Paradigm Lost, The Euro in Crisi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0.

[66] The Euro as Politics,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004.

[67] Gareth Harding, The Myth of Europe. Foreign Policy, January 2012. www. foreignpolicy. com/articles/2012/01/03/the_myth_of_europe

[68] 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 Basic Books, 2012.